

# 目

##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专辑•

总结二十年，迈向新世纪 ..... 于幼军 (5)

社会主义创新与社会主义命运

——广东改革开放 20 年的历史大突破 ..... 梁桂全 (8)

广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

.....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课题组 (17)

深圳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 沈宣理 (25)

农民定 天下定

——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

..... 秦兴洪 (32)

培植资源，保护环境，消除贫困

——广东造林绿化的启示 ..... 林 若 (38)

论广东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 董富胜 (42)

### •经济学•管理学•

国企经营者年薪制试行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李善民 (46)

规范企业破产，提高资产运行质量

——“完善破产法与推进产权改革研讨会”述要

..... 本刊记者 韦 前 (50)

福利经济学的批判性重建

——'9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学术贡献述评

..... 邓 翔 (53)

欧元产生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翟云玉 林 桦 (57)

欧盟单一货币与合同的连续性问题 ..... 黄 瑶 (60)

###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征文•

知识经济中知识的价值构成与价值转化 ... 郭 强 (66)

知识经济与综观经济效益 ..... 钟生坦 黄铁苗 (70)

1998 年第 12 期

# 录

## •历史学•

- 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整合…敖光旭 (74)  
张之洞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的言行评析  
…………… 钟康模 (79)  
从学术三民主义化到三民主义学术化  
——孙中山研究在台湾 50 年(1949—1998)……张军民(83)

## •文学•

- 从《无心眼集》谈到澳门文学形象 …… 黄修己 (92)  
读《爱情与小脚趾》 …… 郑炜明 (96)  
古代小说中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及民俗价值  
…………… 纪德君 (101)  
程贤章长篇小说与客家文化传统…… 陈利群 (106)

## •出版研究•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两个效益的统一…… 姜玉玲 (111)

## •书评•

- 综合与创新  
——读李翀的《新经济学》 …… 朱正国 (115)  
学问中国? 中国学问!  
——评《学问中国》 …… 曹念明 (117)  
角度的选定与嬗变的探寻  
——评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 …… 张智华 (119)

## •学术动态•

- 广东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  
召开 …… 朱春燕 (49)  
我省社科联系统举行“学习邓小平理论, 促进社科  
工作改革发展汇报交流会” …… 学 文 (121)  
“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研讨会”  
召开…………… 陈善光 (121)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珠海召开  
…………… 林有能 (41)  
《学术研究》1998 年总目录 …… 黄荣显整理 (122)

##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

A Look Back into the Last 20 Years for a Better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Century .....	Yu Youjun( 5 )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Last 20 Years' Reform and Open in Guangdong .....	Liang Guiquan( 8 )
On the Practice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A Research Group of the Guangzhou Committee, CPC(17)
A Ponderation on Shenzhen's Practice of Openess	Shen Xuanli(25)
Stablization of Peasant as a Critical Element of Socail Stablization	Qin Xinghong(32)
Enlightenment from the Afforestation in Guangdong	Lin Ruo(38)
How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Grain Circulation System	Dong Fusheng(42)
Problems and Their Settlement in the Trial System of Yearly Payment of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Managers	Li Shanmin(46)
Main Points from 'The Symposuim on Perfecting the Bankrupt Law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	Wei Qian(50)
An Introduction to Mr. Amatheason'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s the Winner of 1998's Economic Nobel Prize	Deng Xiang(53)
European Cash: International Backgroud of Its Origin and Influence over Chinese Economy	Zhai Yunyu and Lin Hua(57)
The Unitary Currency of the European Alliance and the Contract Continuality .....	Huang Yao(60)
Constit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Value in Knowledge Economy .....	Guo Qiang(66)
Knowledge Economy and Macro's economic Benefit .....	Zhong Shengtan and Huang Tiemiao(70)
Conformity of Modern Chinese Democracy and 'Mincuism'	Ao Guangxu(74)
Zhang Zhidong's (1837 - 1909) Speeches and Actions during the China - Russia Negotiation and Russia for Returning the Three Northeast Chinese Provinces to China .....	Zhong Kangmo(79)
From the Academic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to Its Academization	Zhang Junmin(83)
A Talk about the Features of Macao's Literature: Beginning from a Review over a Collection 'Wu Xin Yan Ji' by Mr. Wei Ming	Huang Xiuji(92)
Thinking from a Novel 'Love and Little Toe'	Zheng Weiming(96)
Literary Significance and Folkore Value of the Lantern Festivals Described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Ji Dejun(101)
Cheng Xianzhang's Novels and Hakkas' Cultural Tradiction	Chen Liqun(106)
On the Unity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Two Benefits	Jiang Yuling(111)
A Book Review on 'A New Economics' by Li Chong	Zhu Zhengguo(115)
A Comment on a Book 'Learning How to Query China'	Cao Nianming(117)
Review on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Storie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Zhang Zhihua(119)
A Meeting Hold in Guangzhou for Mr. Liu Shaoqi's Centennial Birth	Zhu Chunyan(49)
Branches of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Got Together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of Studying Deng's Theory to Improve Their Work	Xue Wen(121)
A Symposiam on "Rong Hong and China's Moder rization" Hold in Zhuhai .....	Lin Youneng(41)
A General Catalogue of Journal, 1998	worked out by Huang Rongxian(122)

# 总结二十年，迈向新世纪

□于幼军

20 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创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目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增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信念；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我省改革开放 20 年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深入研究探讨我省跨世纪改革开放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析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开拓新思路，为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阔步迈向 21 世纪提供及时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卓有成效地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的 20 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进步的 20 年，是指导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20 年。邓小平理论作为新时期全党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引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同时是指导这个实践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思想政治优势。”广东 20 年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说明了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理论创新是实践变革的先导和巨大动力。20 年来，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

20 年来，广东不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先行一步”，大胆开拓，敢为人先，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省由原来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在思想上、理论上自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胆冲破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和解决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各种理论问题，发挥思想理论的先导作用，为我省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材料。早在 80 年代初期，我省社科理论界就在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的影响和带动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在全国率先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对推动广东早期冲破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80 年代中后期，我省社科界又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思路，为我省率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广大社科理论

工作者更加精神振奋，紧密联系我省的实际，在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方面，在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研究我省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方面，在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组织的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专题调研活动，深入探讨我省当前改革建设和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创作了《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丛书》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对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服务。

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植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理论之树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只有投身到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科理论工作者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深入实践，研究实践，服务实践，指导实践，这是时代对理论的呼唤，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当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进而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转型期；处在改革开放已取得初步的、巨大的成功，正向新阶段发展的重要时期；处在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思想、观念交织碰撞的年代。这也是社会科学理论大发展，社科理论工作者大有作为的年代。在世纪之交，世界在第四次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正在出现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大变革、大发展。这场大变革是继工业革命后最为广泛、全面、深刻的知识革命，它涵盖经济、科技、社会、文化、思想、生态等各个方面，波及全球各个角落，并将引起人类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它从各个方面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挑战。譬如：知识经济的到来，人类生产力新的巨大发展，不仅向以货币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而且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

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崭新的前景；传统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向人类文明发展的传统价值取向提出质疑，创新现代文明已成为人类文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人类文明将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而向传统的文化精神提出挑战，高扬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将成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极为重要的文化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对跨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课题，需要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潜心研究，作出回答。

世纪之交的广东，既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严峻压力和挑战。从国际上看，在我国、我省刚刚走完工业化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世界又出现了知识革命和信息化的浪潮，发达国家开始步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种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动和优势的世界经济大格局，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和巨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在面临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需要全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又面临社会变革、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面改革的历史任务。广东是我国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既与世界经济联系交往频繁密切，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还面临着来自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和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如何进一步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和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优势，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增创开放新优势？如何在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总格局下，扬长避短，创造和把握后发优势，科学地选择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如何抓住机遇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形

成富有竞争活力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如何做到既充分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机遇发展自己，又能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国际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些都迫切需要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及时研究并给予科学回答。

从国内情况看，以党的十五大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以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提高改革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全面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标志。20年来我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进入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体制基础。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纲领、目标、任务，作出了改革发展新的战略部署以后，全国各地群雄并起，你追我赶，已形成全面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各地都出现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的新浪潮，兄弟省市在不少方面已走在我省的前面。而我省原有的一些相对优势已不复存在或正在减弱，20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也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种形势下，广东要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跨世纪的改革发展中争取继续走在全国前面，必须像江泽民同志期望的那样：“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通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千方百计发展经济，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去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去赢得发展的新机。广东如何“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

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抓住这个重大课题，发扬过去20年围绕改革发展实践开展理论研究的好传统，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对我省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要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研究，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自觉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建设和各项工作；要加强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的研究，全面把握十五大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指导我省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及推进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改革方面迈出新的步伐；要加强对广东改革开放20年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的研究，概括出一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性认识，指导人们继续解放思想，在总结20年的基础上超越20年；要加强对知识经济、金融危机、“两个根本性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职能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促进我省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更加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要加强对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和我省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前瞻性研究，为我省抢占新世纪发展的制高点，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注：本文摘自作者在广东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 社会主义创新与社会主义命运

## ——广东改革开放 20 年的历史大突破

□ 梁桂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有 20 年了。这 20 年，是风云变幻的 20 年：一方面，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孕育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社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另一方面，在东西方抗衡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既充满希望又包含巨大风险的改革之路。在资本主义的冷战压力下，苏联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如多米诺骨牌般倾复瓦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通过改革开放重焕发展新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起飞，追赶世界现代化大潮？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乃至 21 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悲壮、最沉重的挑战。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改革图强、开放发展的不归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广东人民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托起了新希望的太阳。

### 一、两位一体的重大历史课题

三百年前，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电光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激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田园诗的幽梦，开始了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伟大的历史变迁。

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现代生产力，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历史过程，成为近、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和进步的主题。西方先行了一步。从“工业革命”起，西方经过“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电子化时代”，正在迈入“信息化时代”。

在资本主义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飞跃的阶级冲突中，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创

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马克思主义缔造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孕育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按照先哲的设想，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和成长，而是首先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俄国、东欧、中国、越南等发生，并取得胜利。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形态，而是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另一条道路与资本主义并存。于是，就需要我们依据新的历史事实，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演进的新趋势和新格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显然，历史并非单线发展，而是多线发展。人类走向现代化有多条道路而不是一条道路。不仅有古典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社会主义这第二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这第三条道路，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在多元发展的世界中，与其他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发展竞赛。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历史任务不是马上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要在追赶现代化大潮的赛跑中取得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还说，“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



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和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是两位一体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代价更少地、更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时，在推进现代化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命运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人民就会抛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垮台。这已为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悲剧所不幸证明。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否避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厄运？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西方整整晚了近 300 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酝酿着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阻延了现代化的发生。中国革命胜利后，客观上有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前提。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也由于我们对世界局势判断的失误，特别是对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入歧途。（一）在取得国家政权后，没有及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上来，而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运动干扰经济工作，用政治挂帅代替科学决策；（二）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把现实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错误地视作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订和实行了基本脱离现实条件，特别是脱离了中国初级阶段实际国情的路线和政策，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分离；（三）片面地用社会主义的特殊要求和特殊形式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一般形式相对立，如用集权的计划管理否定市场经济，用“精神万能”代替经济利益动力，等等；（四）盲目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采取与资本主义只有对抗而合作的格局，

阻碍了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全面开放。结果，不仅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社会主义的命运到了最紧急的关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0 页）

解放思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关键的问题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并存，面临组织工业化，推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出发点。由此就产生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判断；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新的飞跃。

如何通过开放推动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在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现代化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新的伟大探索。前无古人的历史探索需要寻找突破口。

历史又一次把广东推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沿。

## 二、改革、开放、发展三重奏

1979 年，是广东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年的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广东可以展开改革、开放两个翅膀起飞了。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省，坚决地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起飞疏通了航道。

广东经济的起飞，可以分为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为高速滑行准备起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主要是依托第一产业的扩张而高速滑行。

第二阶段（1985—1989年）为升空起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形成的推动力起飞的。1985年第三产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是由全民经商引致的畸形现象。

第三阶段（1989—1992年）为调整期。这一阶段主要通过治理整顿高速经济结构。广东特别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为第四阶段的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到来作了基础准备。

第四阶段（1992—1997年）是高速发展阶段。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鼓舞下，广东人民又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

广东的经济起飞，既具有80年代国内经济成长的典型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把改革、开放、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形成和谐的三重奏：全面推进改革，使国民经济发展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实行对外开放，使国民经济运行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增强了经济发展实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单一收敛型转向多元扩张型，为加速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拓展广阔的发展空间。

80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起飞是在双重过剩和双重短缺的市场——产业格局中起动的。一是农业劳动力的潜在过剩与农副产品的短缺并存。由于农业管理旧体制的束缚，造成一方面农副产品供给全面匮乏，粮食不足，菜蔬短缺，肉鱼禽蛋凭票限量供应；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隐性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二是工业中基础工业相对过剩，消费资料工业品严重短缺并存。由于国家30年来基本上实行重生产资料工业，轻消费资料产业的产业倾斜方针，至70年代末形成一个

基础工业相对超前发展，消费资料加工工业相对滞后的状况。一方面造成消费资料市场供给匮乏，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积聚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另一方面积蓄了相对过剩的基础工业潜力，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前提。

这两个双重过剩双重短缺，构成了80年代广东经济起飞的两个“引爆点”。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注定它的发展成为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第一个“引爆点”和第一级推动力。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农产品市场的严重匮乏所形成的需求压力，使因旧体制束缚而形成的农业生产力强制性荒置与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并存这个“引爆点”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有机构成低，不像工业那样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起动，只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产业政策调整，就可以“引爆”，把积存起来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产业政策的调整，使农村生产力终于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形成了1980年至1984年农业生产发展高潮。1980年至1984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2%，比70年代的2.4%高出2.4倍。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供给。仅仅几年时间，便基本解决了农产品市场供给短缺问题，除粮油外，各种农副产品已基本取消凭票限量，实行敞开供应。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84年，全省农业净产值由54.06亿元增长到132.95亿元，增长了1.5倍，农业商品率由45.0%上升到58.7%。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3.25元增加到425.34元，增长了1.2倍。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在农村迅速积累起巨大的市场购买力，成为国内市场扩张的主力，为第二阶段全省的加工工业起飞创造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1978年至1984年，农村家庭用于建房支出增长了2.44倍，用于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了1.65倍；全省农村个人存款由6.7亿元增加到53.5亿元，增长了7

倍。

“六五”计划时期与“七五”计划时期之交，是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阶段转换期。各种情况表明，经济起飞的准备酝酿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腾飞阶段。第一，经过5年的高速增长，农产品供给陡增，农产品市场供给短缺压力已经基本消失，在原有结构下农业生产潜力已经释放完，农业增长在1985年开始转入缓速增长，作为经济起飞准备阶段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的农业，已不可能作为主力军继续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二，随着基本消费层次的满足，群众的生活消费开始转向以日用消费资料，特别是耐用品和新潮商品为主的高一级消费层次，形成了对消费资料加工工业的强大的市场牵引力。第三，经过“六五”计划时期的发展，全省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全省银行信贷存款由1978年的68.03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303.7亿元；全省预算内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39.46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65.46亿元。工业腾飞的资金积累已逐步形成。局势表明，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已结束，第二个“爆发点”已开始引爆，国民经济已逐步转入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腾飞阶段。事实上，以1984年底银行贷款体制调整，大量信贷资金涌入工业领域。以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为导火索，广东加工工业已结束1981年至1983年缓速增长的低谷期，从1984年开始爬升、加速，迅速进入高速增长轨道。1984年至198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由394.97亿元增加到1050.77亿元，4年增长了1.66倍，平均每年递增27.7%，比1979年至1983年的增长率高17.5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起飞。全省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由1984年的112.72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348.55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1%。比1979年至1984年的增长率高5.7个百分点。正是第二、第三产业的腾飞，使广东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国民经济成

长跨过工业化初级阶段，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加工业的快速扩张，经济高速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明显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矛盾成了广东经济起飞的第三个“引爆点”，并由国家的治理整顿政策所引爆。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广东以市场为取向，把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开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步伐。全省电力、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由1990年的9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497亿元，5年整整增加了4倍。在“八五”期间，全省新增发电机组容量1104万千瓦，新增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225万门。仅在1995年，全省就新建公路86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90公里），改建公路947公里，新建公路桥梁49座，新建码头泊位15个。“八五”期间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解除了基础产业滞后于整体经济发展的矛盾，为“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 三、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的历史飞跃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和再生。20年的实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教条的重大突破，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广东人民用自己的初步的成功实践，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

（一）社会主义能否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效率，成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的制度选择。

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即推进现代化，首先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基础上，依靠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形成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近300年中，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剑与火”实现的，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中心，以有产者阶级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的发展本质，一开始就暴露其历史局限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走了第三条道路，即北欧模式。他们通过议会道路执掌政权后，把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并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样，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种制度选择的社会主义，就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和历史挑战：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成功推进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就将为历史所淘汰。

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高于第一条道路，也高于其他道路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能力？

广东改革开放 20 年的发展，以骄人的成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在 20 年间，广东创造了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从 1979 年至 1997 年，广东跨越了发达国家用近 200 年时间走过的由初级阶段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阶段的历史性飞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 14.2%，人均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12%。创造了战后新兴工业国（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好成绩。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否与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从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转向以社会大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可替代的经济形式。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制度选择，就无法回避市场经济问题。即必须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取代市场经济，商品

和货币将随着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消失。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取消商品货币，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的计划管理。但是，实践很快就证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发生社会的大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大分工的条件下，既不能取缔市场经济，也不能取消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43 页）列宁很快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回到“新经济政策”。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后来逐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否定了列宁刚刚开始而没有最后完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作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教训，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由政权得而复失到最后陈尸丛林，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他在取得政权后马上消灭商品和货币，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在我国，从解放以来就在社会主义要不要保留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一批主张社会主义还必须搞市场经济的学者，还因为坚持己见而蒙受政治打击、批判、坐牢甚至牺牲生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泰斗孙冶方先生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为此他蹲了大牢。但他不够彻底，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商品经济。就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市场经济，也还需一番思想较量，冒一番政治风险。直到 80 年代后期，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实行市场经济的学术思想，仍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理论围剿。由此可知，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一件多么破天荒、多么艰难的事情。

广东人民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破解这道世纪性难题。一难难在来自自己营垒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束缚，它成了套在我们创新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一道紧箍咒；二难难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没有现成经验，

只能大胆创新；三难难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跨越历史大峡谷的“惊险的一跳”，她不是单纯的体制转换，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重组，处理不慎，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正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东欧的历史悲剧。

首先，广东人民从理论上破解这道题。广东经济学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泰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卓炯同志为旗帜，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顽强研究。早在1961年，卓炯就在《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一文中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不谋而合。而卓炯为此锲而不舍地钻研了几十年，贡献了他的后半生，并为此受尽了政治磨难。广东的整个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牧野、张元元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抗争，则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可以说，没有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上的突破。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直到1992年他的南方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为这一世纪性论争划上句号。

在实践上，广东人民毅然而坚决地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这得益于数百年来广东小商品经济发展所奠定的商业文化基础。从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和价格，到放开日用工业品市场和价格，从放开生产资料市场和价格，到放开粮食价格和市场，20年风雨，惊险一跳，跨越了社会主义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在改革中，广东特别注意把改革与发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稳定的良性互动的社会变革过程。改革的结果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驾驭市场经济，并

通过市场经济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

（三）社会主义能否向世界开放，把社会主义发展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

这无疑又是一道艰辛的难题。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世界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现代科技、经济发展的先进文明成果基本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都发生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应当为人类所共享；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对世界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就难以吸收和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就无法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广东人民遵循邓小平的开放思想，率先实践党中央的开放战略。兼容、开放、富于开拓精神的岭南文化，以及广东毗邻港澳的特点，使广东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的开放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沿海到山区，由单一经济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在对外开放中，广东集中破解了三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对外开放。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广东建设和发展的资金30%以上来自境外，国民生产总值中接近40%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广东国民经济高速起飞的巨大“引擎”。二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没有损害社会主义的主权，也没有冲击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相反，她强化了我们的发展实力和综合国力。三是对外开放是否会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广东在对外开放中，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经验和资金，也吸收了世界先进的精神文化成果，同时通过实践“排污不排外”的政策，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影响，保持了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主导地位。

（四）社会主义能否解决现代化的“文化代价”论问题，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社会文明的衰落。这就是典型的“文化代价”现象。社会主义能否在推进现代化，大规模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人类的人文价值精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呢？无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腐朽文明的冲击，如黄、赌、毒、颓废的精神价值观等等。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人民按照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伦理道德建设，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建设，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的培育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无疑，我们无法避免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消极腐朽的精神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成功地、有力地扼制了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高扬了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只要我们对照一下18、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和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明的退化、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化，对照一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们就不无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代价”问题，在实现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五）社会主义能否在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效率与公平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冤家”。人们能否在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高效率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地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提出的双重挑战，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双重挑战。

在古典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中，以利润为核心，以市场竞争为机制，资本主义创造了在以前不曾有的劳动生产率和

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困、堕落、不平等，其现代化的副产品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据最近材料披露，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产，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46个国家的财产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本身的异化性质：人不是发展的目的，而只是资产阶级积聚财富的工具；即使实行高效率、高消费，也没有改变这种发展的异化性质，它既导致发展对人的反动，也导致发展对环境的反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日益显现其对于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极限性质。

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实现发展的社会公正，致力于避免现代化发展对人的异化性质。但是，作为现代化的第二种制度选择，社会主义能否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公平——效率的关系，在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使全体人民逐步享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而不是相反，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和有产者聚敛财富的牺牲品呢？

遗憾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在片面强调公平的同时却失之于效率。我们曾经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效率没有了，创新没有了，发展没有了。社会主义陷入了“不发展”甚至“崩溃”的尴尬境地，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含义。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三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产力发展观统一起来。我们依靠三种机制突破这一世界性难题：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提供平等的发展权，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东改革开放2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4.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5%。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1980年至1996年，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由

70.4 下降到 42.6；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由 60.4 下降到 51.6。三是通过政府的宏观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发展的相对公平。根据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材料分析，从 1985 年至 1996 年，虽然最低收入户人均月收入由 80.81 元增加到 326.47 元，增长了 3.04 倍；最高收入户由 176.52 元增加到 1402.97 元，增长了 6.95 倍。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每人收入的差距由此及彼 2.2 比 1 上升到为 4.3 比 1。但是在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由 176.52 元增加到 1402.97 元的同时，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也由 80.81 元增加到 326.47 元，增长 3.04 倍，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贫困问题。四是坚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灌输社会主义精神和价值观。

在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上，广东特别注意通过党和政府的自觉的主导作用，解决三个现实问题：一是注意不同发展条件的地区间的平等发展权，努力创造相对平等的发展环境；二是注意给不同社会阶层提供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三是通过产业政策和平等的市场竞争创造不同行业的相对平等的发展条件和分配政策。正由于此，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欧美资本主义出现的激烈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特别是我们成功地使广大人民共享了发展的成果。现在，广东人民的生活普遍基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多数家庭已由贫困越过温饱进入了小康，有的已进入富足水平，20 年跳过了 3 个台阶。

#### 四、新的挑战与新的发展观

经过 20 年的发展，广东已完成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国民经济成长由以轻纺轻工业主导增长的工业化初级阶段跃升到以基础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中级阶段，并向以技术集约化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高级阶段迈进。人民生活已实现小康水平，正在向富足水平迈进。到 2010 年，广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 30000 元，即接近 4000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这是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阶段。创新

现代化文明，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挑战，她将决定我们在 21 世纪的现代化路向。

以物质文明增长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已日益显露其发展的极限性质。人口爆炸，正迅速超越地球的环境容量，导致人类文明的逆转；大工业文明的疯狂扩张，已经大规模污染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以及地球生物圈；地球资源相对于人类工业化文明的推进正加速趋于枯竭，人类经济文明面临崩溃的巨大威胁；人类社会的人文价值精神在物欲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正加速退化。

这种发展的极限性质是由三种历史因素造成的：

首先，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和价值观，导致现代化发展与人的本质规定的冲突。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展现为人的本质的发展和展开，而是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单纯的支配、掠夺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人在发展中的本体地位消失了。这就导致了西方式的畸形的物质文明浪潮。

第二，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作为铁的规律强制性地驱动人们不断地滥耗资源，扩大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积累规律，驱使人们“为生产而生产”。高效生产、高额消费成了资本积累的两个飞速转动的轮子，人成了资本财富积累的工具。

第三，以暴力文化和国际争霸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强制性地驱动各国扩张经济，强化国力，军备竞赛，狂耗地球资源。

显然，传统现代化文明这种强烈的反自然和反人类的性质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现代化文明也将是多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预示着人类新现代化文明的曙光。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对现代化的再选择权力。

创新现代化文明，我们拥有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平的文明竞赛，将为我们探索新的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和



动力；第四次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实践能力，并开创一个全新的知识文明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手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日益成为发展的主流，为我们探索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保存了社会主义价值精神，为探索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因此，广东的跨世纪发展，已面临一个全新的发展视野和发展路向。发挥后发优势和再选择权力，在必要的物质文明基础上，构建更符合人类发展本性的、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现代化文明，这是广东人民跨世纪发展的伟大使命。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是人类精神意志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新现代化文明的灵魂是，重新确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发展的人文价值精神，体现现代化对人的本质发展的充分肯定及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需要在对传统现代化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中重新确立人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重新理解和实现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使发展重新回归于人类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的回归，将为解决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提供根本的理性前提，从而使现代化进程更加有利于、更加符合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的才能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尊严的确立。劳动与享乐的统一，这是未来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

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只能以现代文明观的变革为先导。

现代化文明观的变革至少应包括：

变革发展价值观。由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物本发展价值观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发展价值观。由此，消灭传统现代化的反人类的异化性质，确立人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和本体意义，使现代化真正成为人类的本质发展和实现的过程。

变革自然伦理观。由人定胜天的哲学世界观转向自然——人本主义哲学世界观，消灭现代化的反自然的异化性质，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升华自然，使现代化进程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化、发展过程。

变革生活观。由追求物欲满足为中心的消费生活观转向以人格的完善和自主自觉的意志发展为中心的生活观，重建属于人的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现代化以新的属于人的全新内容。

变革代际伦理观。由只关心当代人的生存与幸福的满足转向既关心当代人的发展，又尊重后代生存发展权的代际伦理观。传统的现代化文明在追逐当代人的财富增长和幸福满足过程中，大规模地透支后代的资源和成本，导致人类文明的不可持续发展。今天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对后代发展不负责的发展模式，确立尊重后代发展权，重视资源永续利用的代际伦理。

变革社会技术观。传统工业化文明的一个巨大危险，是“技术万能论”，盲目信赖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思想误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也可能走向异化，成为可怕的异己力量，把人类文明推向崩溃。关键是用人类的科学理性掌握科学技术这把剑，把科学技术进步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起来，保障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价值精神的结合和统一，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上，显示了社会主义人文价值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地位。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保障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已经初步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广东，能否在迈向新世纪的发展中，在创新现代化文明方面先行一步？这是广东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挑战。中共广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增创新优势，迈向新世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三大战略。这就是外向带动战略、科教兴粤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广东人民将用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实践，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作者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广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课题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这当中，广州比较早地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后，广州又提出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积极稳妥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给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991年广州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386.67亿元，而到了1997年底就已达1642.83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3.25倍，年均递增率为19.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3000美元大关，综合实力跃居全国十大城市第三位。总结、剖析广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和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广州在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对我们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增创广州中心城市发展新优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广州实践的基本特征

1. 坚持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不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解放思想中逐步明确广州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

从1979年底开始，广州就在绢麻纺织厂、化工厂、南方大厦等10家企业进行试点，开始对打上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深深印记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十二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企业松绑，努力使企业的经营效益与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是广州企业改革的前奏曲，也是向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高度集中的计

划管理体制堡垒发起的第一轮冲锋。

广州人通过实践比较务实地认识到，要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前提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在解放思想中才能不断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州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飞跃：第一次是70年代末期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识到极左路线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表现和危害；第二次是198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第三次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到发展经济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第四次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①</sup>的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大大提高了广州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为广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广州进一步明确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广州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也都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2. 坚持邓小平关于运用市场、按价值规律办事的思想，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力推进广州的价格改革与流通体制改革

从1978年底开始，广州就率先放开了

部分水产品市场，在全国同行中办起了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这种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渠道众多的做法，不仅改革了过去长期实行的统购包销体制和僵死的价格体制，更重要的是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了动力，为市场注入了活力，为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前提。放开价格，搞活流通，建立市场体系，使广州这个古老商埠又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吸引力。

广州作为全国最早实行价格体制改革的城市，主要是从一般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到工业品价格放开；从消费资料价格放开到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放开；从一般商品价格放开到劳动服务价格放开。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经历了20年的艰苦探索，现在广州生活资料价格市场调节率已达98%；生产资料价格市场调节率也已达95%。与此同时，广州的政府部门则将调控的重点放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采取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粮油和副食品风险调节基金、菜篮子物价监控体系、国有商业价格协调制度等措施，以保证全面放开后的物价实现平稳的波幅。1994年以来连续几年，广州的物价升幅均低于全国水平。

与价格体制共同推进的流通体制改革，广州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广州在全国较早地打破国营商业的垄断，打开城门允许长途贩运，鼓励多种商业经济成分共同参与流通竞争，并大抓贸易集市、专业市场、批发市场的建设。现在，广州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少环节的开放型流通体系，并加快发育了具有区域性中心城市特色的劳动力、技术、信息、资金、投资等要素市场。1997年广州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802.6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44.6倍，年均递增22.27%，发展速度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

3. 坚持邓小平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大胆探索广州的所有制结构改革

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践中，广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胆探索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需要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改革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路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广州的实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sup>②</sup>

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广州的所有制改革实践，首先是紧紧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重要环节，大胆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微观形式，采取裂变重组、兼并控股、连环改制、拆股改造、联合注资、职工参股、中外嫁接等多种方式，把实施大集团大公司战略和放活中小企业战略结合起来，使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实体。1997年广州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达836.82亿元，消费品零售总额429.71亿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10.2倍和20.3倍；1996年广州工业企业实收资本798.32亿元中，国有和集体资本约占43.79%，比重虽然略低于非公有制经济，但却控制了钢铁、汽车、石化、造船、电子等主导产业，而退出的是一般加工业；同时广州的公有制经济还扩大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类型中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所以说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提高了、控制力增强了，更好地发挥了主导作用。

其次是广州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政策上、资源配置上和服务工作上一视同仁、积极扶持，使之成为广州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80年代初，广州就提出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到了90年代初，广州又首先明确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税收、财政、信贷、投资、进出口等方面，采取适度优惠的政策，鼓励和扶植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到1997年底，广州全市个体、私营企业达228567户，从业人员达577658人。同时，广州的

外资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兴办“三来一补”和“三资”加工制造企业、利用外资发展基础产业到引进跨国大财团大公司、发展国际资本经营等，极大地改变了广州的所有制结构，到1997年底，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已达8455户，注册资本达240.64亿美元。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广州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是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激活了市场竞争机制，同时又促进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广州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又反过来推动了广州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广州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共同发展，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主体条件和制度保障。

4. 坚持邓小平关于打破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中大力推动广州外向型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

邓小平强调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sup>③</sup>这说明，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世界市场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广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肩负的重要使命，不仅是要在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中先走一步，而且要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不断取得新鲜经验。

20年来，广州充分利用作为我国南方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和前沿的优势，在对外开放方面大做文章，党的十四大以来，对外开放更是得到全方位推进。如近几年来，广州及时出台了“关于改善我市投资环境10项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的若干意见”等，清理和规范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外收费，加强了海关、财税、外汇管理部门的协调和标准化服务，逐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积极发展外商服务中介机构，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高了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从

1979年至1998年6月，广州实际利用外资已累计达159.89亿美元，其中1997年为28.94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了293倍。总的看来，广州经济已呈现出“三个40%”的外向型特征，外贸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和外资经济税收占全市税收总额的比例都超过40%，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5. 坚持邓小平关于权力下放、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思想，在深化改革中努力探索广州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调控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原来按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步显现出来，正如邓小平尖锐指出的，“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sup>④</sup>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按照新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逐步实现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为主，从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为主，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为主的转变，并努力探索间接的政府经济调控机制。

广州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过程中，首先以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理顺经济管理权限为突破口。在加强社会综合管理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基础上，抓好经济管理局、行政性总公司的改制工作，对原有专业经济管理局、行政性总公司进行精简、撤并，结合部门的实际情况，先后撤销市级16个专业经济管理局、行政性总公司，组建成19个企业集团，并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规范和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在企业集团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把撤并的专业经济管理局、行政性总公司改制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通过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理顺经济管理权限等一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激发了各经济主体的活力。

同时，广州还重点抓好对全市社会经济的宏观管理、协调工作。一是强化政府“宏观管理、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监督检



查”，把技术性、辅助性、服务性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把国有资产经营职能通过国资委移交给各类授权资产经营公司；二是弱化计划指标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的监测、研究，以及对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制订，把计划引导和调节方式转向政策、信息、协调服务，初步建立起以“战略决策、市场调节、计划引导、总量控制、政策协调、综合平衡”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间接调控体系，在全国建立起首家中心城市国民经济预警系统；三是初步建立起计划、财政、金融三大部门相互配合和制约的调控运作方式，加强了对资金的合理调度和调剂，促进了社会资金平衡、协调、合理流动；四是逐步建立健全了社会保障体制，整体推进广州中心城市的综合配套改革。

6. 坚持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工作部署上，既立足当前，抓好近期工作计划，又着眼长远，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实施符合广州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围绕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这个根本目标，建设具有岭南都市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以人为本、重在建设原则，实行因势利导、兴利除弊的方针，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导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立足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抓点

带面的方法，典型引路，试点先行，示范带动；在工作机制上，坚持思想教育与管理、法制建设相结合，思想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健全“一把手”两手抓、在党委领导下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使精神文明建设虚实结合，虚功实做，务求实效，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经过20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实践和探索，广州已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基本形成；二是以资本为纽带，由“国资委——国有资产授权投资主体——生产经营企业”三层架构组成的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初步建立；三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企业制度创新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微观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四是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支柱、统一开放、内外兼容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五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融资方式多形式的投资融资体系初步形成；六是以贸易多元化、经济国际化为目标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七是以农业产业化、商品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带动农村、农村服务城市的城乡经济现代化体系逐步建立；八是以间接管理为主，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逐步建立；九是社会共济与社会保障相结合，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十是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和面向高收入家庭具有市场化性质的两种住房分配体系逐步建立。这些都标志着广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正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二、党的十五大精神与增创广州体制新优势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五大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和政策，为广州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指明了方向，使广州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又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行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改革策略，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逐步形成微观经济充满活力、宏观经济管理高效、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市场运作规范化、运行机制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迈向新世纪历史关头赋予广州增创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使命。

### 1. 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思想观念创新新优势

江泽民最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sup>⑤</sup>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才有不断的实践创新。广州是全国改革开放起步较早的城市，广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对推动广州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广州在思想观念上的前沿性已逐步减弱，广州人现行的思想观念，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甚至有些思想观念已成为我们迈向新世纪的障碍。比如，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生产思想，过于依赖天时、地利、人和及特殊政策的依赖思想，满足于广州先行一步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创造的经验的自满优越思想，人们的忧患意识不足，危机意识不足，迎接新挑战的心理准备不足，仍然习惯于80年代的发展模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如果不从这些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小生产形成的意识观念中解放出来，不创新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增创发展新优势就难以实现。

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认真总结过去20年的基本经验，认清形势，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必须着力克服在成绩面前盲目骄傲、固步自封和在困难面前丧失信心、无所作为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方

面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增强忧患意识，瞄准更高标准，变固步自封为锐意进取、开拓前进，另一方面敢于在困难中抢抓机遇，增强迎接挑战的勇气，变无所作为为勇于拼搏、敢为人先；着力克服粗放经营发展经济的传统观念和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小农意识，树立依靠科技进步、注重质量效益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着力克服只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进步，只重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等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树立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思想；着力克服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廉政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通过思想的再解放、观念的再更新，形成增创发展新优势的强大思想动力，推动广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 2. 加快所有制结构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新优势

所有制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程度，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度。随着广州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阶段性转变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所有制结构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一，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采取突出重点、退出一般的策略，使国有资本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行业中适当退出，集中到优势产业、行业和企业中去，从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资产的产业配置，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辐射力和主导性。当前，广州必须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抢占技术制高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建筑和房地产业、汽车、电子信息业三大支柱产业，进一步增强辐射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

第二，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外商投资经济。外向带动、利用外

资、吸纳创新是广州发展的优势。继续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在扩大穗港澳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不断拓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特别是欧、美、日等的合作，重点引进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力争境内外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分部迁来广州；调整外资结构，将第二产业吸引外资的取向，从一般加工型企业为主，转向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引导加工贸易向深加工和规模化发展；拓宽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领域，加强在交通通讯、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招商引资，进一步增强集聚能力，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吸纳创新作用。

第三，进一步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推进市场化进程有着积极作用。必须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经济通过购买、注资参股、租赁托管等形式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拓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空间，除了专营性行业，一般性竞争行业都应向个体、私营经济开放，重点扶持正在兴起的民营科技企业；引导私营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和发展，扶持一批有前途的大型私营企业集团，造就一批高素质的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

### 3.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企业制度创新新优势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党的十五大提出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这是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必须把企业制度创新作为体制改革的重点，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第一，加快实现国有企业向以现代企

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过渡。机制决定活力，竞争激发活力。把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大力推进企业改革，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新机制；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形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经营者的制约监督新机制；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逐步推行内部员工持股和年薪制，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分配新机制；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形成经营者能上能下、劳动者能进能出的竞争上岗新机制。通过制度创新，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富有活力的微观主体，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第二，把资产重组和实施大公司战略结合起来，加快大集团建设。当前，跨国公司的兼并、收购浪潮对企业“偏小缺大”结构形成较大的压力，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大集团。抓大要突出“优”，采取扶优扶强、注重经济效益、优化行业结构等政策，鼓励优势大型企业集团进行低成本扩张。广州应克服目前集团建设存在的“层次太低、规模太小、数量太多”的现象，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房地产集团、汽车集团、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商业集团、机械制造集团、医药集团、旅游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支柱。

第三，抓大并小、抓大带小、抓大促小，加大中小企业改革力度。放开搞活中小企业是促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从广州实际出发，通过兼并合并、优化组合，聚资经营、放开搞活，引进外资、嫁接改造，托管经营、带动发展，分利重组、局部搞活，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关停淘汰等多种方式加速改造中小企业。从融资、技术等方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与服务，逐步形成班子好、机制好、产品好、效益好的中小企业群。

4. 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形成现代化市

## 场体系新优势

市场体系建设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体系培育和发展不健全、不完善，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广州市场发展已由较浅层次、卖方市场、生产和流通容易脱节，转向较深层次、买方市场、生产和流通全面衔接的新阶段，要求充分发展各类中心市场，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发达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从而使广州成为沟通全国、面向世界的聚散能力较强的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劳力流、信息流的交汇中心。

第一，大力充实提高商品市场。要着力于发展大流通，培育大市场，促进大贸易，加快综合性的消费品市场和具有相当规模的专业性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突出搞好商品流通业，大力发展包括代理配送制、速销经营、货仓式自选商场、直销等在内的现代流通组织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批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重要消费品和广州优势产品的批发市场。

第二，大力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把建立完善监管严、手段新、功能全、辐射强的金融大市场作为要素市场建设的关键，加快建立竞争公平、调控得法、运行有序、服务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按照“放有度、管有法、活有序”的原则，发展和规范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规模大、成果多、开放性强的技术市场；大力开发信息资源，建立全方位的、先进的信息市场体系；大力发展产权市场，规范产权交易。

第三，加快市场体系的配套建设。加速建设先进适用的市场基础设施，改善市场环境；着力塑造健全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改善和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建立和健全市场法规体系，加速广州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 5. 加快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优势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

基础。目前，广州体制改革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创新阶段，各项改革若不配套协调，重点突破就无从谈起。必须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保障网络、强化集中统一管理为重点，加快建立起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为基本内容，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合理而又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深化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一，加快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积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增加财政资助和个人投入，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和确定基本医疗的范围，同步改革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和社会承担安置失业人员的比重，落实对低收入人群特别是社会贫困人群的保障政策，完善困难职工解困制度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提高个人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建立再就业工程专项资金；建立劳动预备和再就业培训制度，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和自主就业能力；拓宽就业门路，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结合，多渠道安置失业、待业职工，把城镇失业率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三，改革住房制度。逐步取消福利性分房制度，加快个人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加大力度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从而缓解住房改革中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压力，同时发挥各个方面的作用和积极性。

## 6.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政府高效管理新优势

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一，强化宏观调控，弱化微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广州中心城市的政府职能应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活动；确立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的方式，形成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监督机制；把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建立和完善政企分开的投资融资体制；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改变政府包揽社会事务的状况，形成打破部门界限成立各种社会协调组织，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系列化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宏观经济调控运行机制，以激活市场与政府互补效应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广州中心城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完善以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协调平衡市场需求；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创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环境；培育各类市场，形成多元、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引导技术升级；改善投资环境，不断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切实搞好中心城市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中心城市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综合性很强的动态实体，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启动机。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的作用出发，把创造一个高效、舒适、优美和安全的城市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来抓。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措施，切实解决城市脏乱、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社会治安等热点问题；加大以道路交通设施为重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推进新城区建设，坚持旧城区改造与新城区建设相结合；集中力量建设好标志性工程；抓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进一步简政放权，明确职责，调动市、区两级加强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第142页、第36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⑤《人民日报》1998年3月5日。

本课题组成员：

组长：周素勤 执笔：顾润清、曾伟玉、梁兴华

作者单位：广州市委宣传部（510046）

责任编辑：冯 生



# 深圳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沈宣理

## 一、“窗口”功能的定位与作用的发挥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根据邓小平的倡导，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对于一个长期封闭的大国，对外开放从何处启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sup>①</sup>重点突破，梯度推进，整体发展，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总体思路，而建立经济特区正是对外开放突破口的选择。

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作为“试验场”，显然是为了节省“学费”，降低改革开放的成本，减少乃至避免全局性的风险。1987年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时，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明确肯定“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sup>②</sup>作为“窗口”，主要是指特区毗邻国际市场，政策优惠，信息灵通，可以较快地直接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知识、资金和管理经验，从而加速自身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为内地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进而向国外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能力和成就。因此，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sup>③</sup>“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

响。”<sup>④</sup>通过这个“窗口”和“基地”，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观察和了解世界，也可使我们在这里与世界各国发生更为密切的经济技术交流，所谓“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可见，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不见于马列主义经典的创造性社会改革实践，西方评论家称其为“致力于现代化的大胆行动和创造性的决策”。

根据特区“窗口”功能的定位，经济特区建立初期，党中央和国务院赋予它的主要任务除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试验以外，就是更多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以加速特区和全国的现代化进程。18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深圳的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使经济特区的“窗口”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其对外开放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已远远超出中央最初的设想。对外开放不仅从技术层面，而且从观念和体制等诸多层面全面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是促进了改革。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技术层面的内涵，即如何开放；一是体制层面的内涵，即开放会给传统体制带来的变革。基于后一层面的深入思考，他提出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sup>⑤</sup>深圳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深刻性和正确性。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要利用国际市场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自己，而随着特区对外开放的推进，随着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尤其是管理经验的进入，特区原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显然无法适应，这就要求经济特区在实践上一步步进行经

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改革，而对外开放同时又为经济体制如何改革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这就是市场经济模式。从深圳的对外开放实践看，从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到借鉴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开放为改革起到了某种引路和带动作用，因而深圳的改革进程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步步向国际惯例接轨的过程；正是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一步步把改革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特区的对外开放，就不会有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开放促进了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最大的改革。

二是促进了观念的更新。长期以来，在极“左”路线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我们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视同资本主义，因而是万恶之源。正是受这种“左”倾思潮的影响，当着外资进入特区，当着资本家来到深圳投资办企业的时候，有人想不通，认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因此对外开放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正是对外开放，促进了深圳人的思想大解放。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深圳人开阔了视野，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终于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西方国家普遍运用的市场手段，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增加财富，因此特区改革的方向必须“以市场为取向”。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的需要，一系列新观念应运而生。正是基于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邓小平后来总结道：“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sup>⑥</sup>

三是促进了发展。对外开放有利于我们克服自己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等发展经济的困难，许多资源可以到国际大市场去解决，而深圳的对外开放，则使得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直接促进了深圳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还可通过观念的变革和体制的转轨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1997年与开放之初的1979年相比，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由0.1537亿美元提高到28.7亿美元，年均增长33.6%；国内生产总值由1.96亿元提高到1130亿元，年均增长33.2%；工业总产值由0.7亿元提高到1255亿元，年均增长5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0.5938亿元提高到390亿元，年均增长43.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13亿元提高到325亿元，年均增长36.9%；贸易出口额由0.093亿美元提高到254.99亿美元，年均增长46.8%；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由0.1721亿元提高到144.78亿元，年均增长45.3%。值得指出的是，1997年的出口总值中，远洋贸易出口值占12.3%，机电产品出口值占55.3%，反映了深圳经济的工业化和外向型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短短18年时间，就已将一个边陲小县建设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四是促进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的是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分层次、有步骤的梯度推进战略。建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第一个重大步骤，经济特区的开放度在整个对外开放布局中处于最高层次，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先行一步并探索成功，促成了沿海城市开放，沿江、沿边开放以及内陆省会城市的开放，从而形成了全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区的示范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上的推动，即特区的实践展示出对外开放的实际效果，从而使党

中央和国务院在总结试验区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表现为实践上的辐射，一些内联单位和内地来的人员，直接将在特区学习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移植到内地；将在特区结识的外商引入内地投资；内地企业通过与特区企业的合作，或共同开发生产产品，或将自产产品通过特区的桥梁作用走进国际市场。

## 二、深圳对外开放的历程与启示

深圳的对外开放实践已经走过了 18 年的路程。这 18 年的历史，不仅证明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而且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 and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深圳的对外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和转手贸易阶段（从特区创立到 80 年代中期）。深圳在创立经济特区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较差，技术力量薄弱，资金短缺，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首先发展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以便尽快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对于深圳来说，既可以收取工缴费，获得外汇收入，又可以安置大批劳动力就业，并使工人和管理人员在这类企业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对于外商来说，则可以利用深圳价格低廉的土地和劳力，较快地形成生产能力，并用利用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将产品随时运往香港，或在港就地销售或销往世界其他地区。由于生产成本较低，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大为增强。所以，“三来一补”企业的兴办，促进了投资外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深圳的转移，符合产业向成本低谷流动的经济规律，也是特区外向型工业初期发展的必由之路，加上当时转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为深圳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 发展“三资”企业和自产产品贸易阶段（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三来一补”企业的局限性很明显，如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下，劳动强度大，水电消耗多，有的甚至还污染环境。由于这类企业的产品开发、原材料进出、产品销售乃至经营管理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外商手中，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特区外向型经济的主体。从 1982 年开始，深圳从政策上努力推动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逐步向“三资”企业转型，并且严格控制新办“三来一补”企业。国务院 1986 年初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将“七五”期间特区经济发展的总方向确定为“努力建立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挥‘四个窗口’、‘两个扇面’的作用”，加速了这一转型的进程。相比之下，“三资”企业有助于学习、吸收国外科学管理经验，有助于利用外商的销售渠道扩大产品出口，因而成为深圳实现以工业为主，扩大自产产品贸易这一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由于政府的引导得力，“三资”企业发展很快，截至 1990 年底，深圳共有“三资”企业 3269 家，“三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63.8%，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

(3) 发展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和实施“三点一线”战略阶段（90 年代以来）。从 90 年代开始，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深圳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先引进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特区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迅速缩短经济特区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在大规模发展“三资”企业过程中，这一阶段对外资的利用更注重发挥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宏观调节作用，包括调整投资来源结构，增加跨国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的资本来源；调整投资规模和结构，适当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促进企业结构进行重组，增加资金、技术、市场能力等资源的投入，提高企业素质等。90年代以来，深圳市政府按行业制定了技术引进的中、长期规划，建立引进外资的协调评审机构，选定效益较好的重点项目，着重引进先进技术与关键设备，不再引进国内已有条件生产的技术设备，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外向型高科技企业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高科技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12%迅猛地上升到1997年的35%。在对外贸易方面，则把内外两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一线”、进料——加工——增值——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使深圳经济能够比较灵敏地适应国际市场的迅速变化，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深圳的对外开放实践提供的主要经验和启示是：

第一，对外开放的核心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全面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向型经济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因此邓小平在1985年曾经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sup>⑦</sup>深圳在18年对外开放过程中，及时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发挥政策、体制和区位的独特优势，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扩大出口，成为国际资本投向和产业转移可供选择的较好地区，也较成功地发展成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地。到1997年，全市出口总额已连续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深圳真正走向了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有效地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的作用。

第二，对外开放是内联与外引的有机统一。深圳的实践表明，“开放”应该是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机融合。深圳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内开放，将内联与外引的互相促进视作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18年来，深圳的内联呈现出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发展的态势，由特区创立初期自发的、零散的联合向“以科技联合为重点、第三产业联合合作、双向投资全面发展”的新格局转变；由单一的行业联合发展到工商农技的多边联合；由内向型联合向外向型联合转变，逐步创出了内地——深圳——外商的新型联合模式，使深圳成为联结国内外经济的纽带。实践告诉我们，成功的对外开放必须是一种双向开放，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对外开放应当是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深圳的实践说明，开放必须是一种全方位的大开放。所谓全方位，一是指对多国家或地区的开放，决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自我封闭；二是指在多领域的开放，不但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社会、科教、文化等方面；三是指多种形式的开放，如在利用外资方面，深圳就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既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和建立科技工业园，又采取了土地招标、拍卖、由外商连片开发和建立保税工业区等形式，还有利用国外贷款，向国外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其他形式。总之是按邓小平所说的，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交往中趋利避害就是。只有进行全方位的开放，才能真正形成一套开放的体制，构建一种开放的经济，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并且逐渐重塑开放的民族心理。

第四，对外开放要努力使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从深圳的实践看，实行对外开放，必须着眼于高起点、高质量和高层次，逐步使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促进本国或本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深圳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由开始时的利用本地劳动力等资源搞“三来一补”企业

出口初级产品，到由转口贸易带动进口替代工业，再着眼于增加本地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分工。到了90年代，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增创特区新优势，更是大规模地利用和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地介入国际市场，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特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第五，对外开放必须坚持扬弃原则。对外开放意味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和观念的交汇与碰撞。深圳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扬弃原则，一方面大胆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文明成果，充分借鉴他们在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方面的丰富经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和本地实际情况，在引进的具体内容上不全盘照抄照搬，更不为那些反动的、腐朽的东西流入中国而开方便之门。

### 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是深圳迈向新世纪的必然选择

90年代以来，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经济的全球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界经济日益显现几个特点：其一是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其二，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其三，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这三个突出特征综合起来就形成一种趋势：贸易、投资和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加速流动，促使了国际经济的融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被卷入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与国际资本的流动，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作用，但其传递作用的效应是双重的，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传递，也有引起经济衰退的作用在传递。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反映了前一种传递效应；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副作用已波及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则证明了后一种传递效应。

在80年代，深圳与世界市场的接触，

主要是资本、商品、技术的引进与输出，对外开放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上。进入90年代以来，深圳在对外开放中已大大拓展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触面，因而，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提高对外经济合作的档次，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加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是时间问题，必然要求我们的外资外贸从体制到操作上都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无疑意味着，今后深圳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在更高的操作技巧上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深圳正在进行第二次创业。第二次创业相对于第一次创业，优惠政策减少了，经济增长的基数大了，面临的内外环境改变了，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难度更大了。党的十五大要求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在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中，深圳需要立足于已有的基础，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坚定不移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首先，深圳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深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首先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结构的优化。这就要求深圳的产业和行业要有适应国际市场的供需变化结构，逐步使其产业结构能够较稳定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当前，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深圳必须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追踪国际产业分工的这种最新趋势，据此来调整、优化自身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使深圳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立于牢固的产业基础之上，加快转变的步伐并增强市场适应性。

其次，深圳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段差距。为了在体制创新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面，深圳就必须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培育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建成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统一开放、程序规范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和外向型经济运行要求的市场机制；创造城市管理现代化、保障体系社会化、法律制度完备、人口素质较高的市场环境。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在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交往中来寻找参照系并借鉴经验。

再次，深圳实施“三个一批”的发展战略，仍然离不开扩大开放。培育一批名牌产品，必须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运用现代技术和装备以及工艺，来提高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档次和附加值。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产业，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更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必然要促进这些企业走向世界，与跨国公司打交道。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圳在吸引国外跨国集团投资的同时，也要大力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增强自身参与国际竞争的實力。可见，要实施“三个一批”的战略，只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参与世界范围内更高层次的经济竞争，深圳才能赢得机遇，才能使第二次创业走向成功。

根据深圳对外开放的基础和经验，我们认为，深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近期比较可行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措施：

1. 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弥补优惠政策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对外商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够平等竞争，这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从过去主要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到

逐渐转向实行国民待遇，靠健全的法制和管理、广阔而有吸引力的市场以及良好的服务等来吸引外资，这是一大跨越，表明我们之所以取消某些优惠政策，是因为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作为后盾的。今年，深圳在审批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尽量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在硬环境方面，加大了水、电、气、交通、通讯、公共工程等方面的投资，并使基础设施做到超前和配套。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把深圳建设成花园式、园林式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对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对外开放肯定会发挥越来越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软环境方面，继续综合整治社会治安，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从法治环境上增强吸引力，是深圳的目标。

2. 积极创造条件，使深圳成为外资银行、大跨国公司进军中国的集结地。截止1997年底，深圳拥有营业性外资银行25家，有130多个国际财团、跨国公司投资深圳。今年7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继上海之后，成为全国第二家试办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城市，表明了中央对深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支持。外资银行、大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市场，进入中国，需要有一个信息灵通，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宽松，既能最快了解内地，又能最快了解国际市场的城市作为落脚点和桥头堡。深圳应当采取得力措施，在已有的运输和通讯、物资和仓储、咨询和信息、金融保险、零售商业以及旅游等优势的基础上，再创优势，为外资银行和大的跨国公司落户深圳、云集深圳创造条件。

3. 高质量地办好“深圳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使深圳成为国际高科技成果交流的“窗口”。最近，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从明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高新科技成果交易会，这是一件重要的创新工作，也是深圳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7年已达35%，深圳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用交易

会的形式，吸引国际国内的高新科技成果汇聚于深圳，让外商了解深圳以及整个中国的科技发展，让国内了解国际上的先进科技成果，相互交流、转让、交易，这不仅对于促进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深圳扩大对外开放，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有突破和创新。首先，要调整深圳引进外资的结构，适当提高利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降低间接投资的比例。引入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外商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渠道，带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段时期内将会扩大有效供给的质量和数量，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外贷款，会加大借债成本，形成债务负担。因此，我们应认真调节好外商直接投资与借外债在引进外资中的比例关系，适当扩大直接投资的比重。第二，要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从外延扩大转移到内涵增长上来。利用外资，重点应当放在质量而不应放在数量上。因此，积极利用外资，不仅仅是指大力引入，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已有外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把着重点从利用外资重外延扩大转移到重内涵增长上来。第三，优化外资投向，协调供需关系。引进外资在结构与使用方向上要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协调起来，就深圳而言，要从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考虑，把外资引向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高科技产业项目，统筹规划，提高外资利用的效益。第四，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单纯靠增加出口有时会受到某些国际贸易障碍的限制，而通过鼓励直接对外投资建厂、开拓产品市场，可有效地增加国际市场占有份额，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5. 积极稳妥地开展多元化的跨国经营。深圳已连续五年在进口、出口及进出口总额三项主要指标上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说明深圳的外向型经济优势已经形成。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除了要继续深化外资体制改革和落实推进外资发展的各项

政策措施外，还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多元化的跨国经营，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东南亚需求萎缩，但北美、西欧、非洲、东欧市场潜力很大。这为我们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多元化的跨国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深圳宜认真研究国际市场的新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降低产品出口成本，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全方位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6. 加强与内地及香港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经济共同繁荣。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与内地及香港的经济技术合作。与内地的合作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资产为纽带，以效益为中心，循序渐进，分层次推进。与香港的合作，深圳方面已提出，深圳有土地、人才、技术、劳动力的优势，要把这些优势与香港的信息、资金、自由港政策结合起来，在深港交界合办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香港方面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势头甚感兴趣。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大力度。同时，要抓紧深港西部通道、铜鼓航道、皇岗——落马洲过境通道接驳等重大基础设施衔接项目的建设，通过加强深港合作，来促进深港两地共同发展。

对外开放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邓小平曾经总结道：“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sup>⑧</sup>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的生命线。有了开放，才有深圳乃至全国的辉煌发展；只有进一步扩大开放，才会有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灿烂明天。

---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240页，第51—52页，第52页，第98页，第373、372页，第133页，第202页。

作者倪元轶、吴忠、李剑星、黄盛华，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518006）

责任编辑：罗苹

# 农民定 天下定

## ——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

□秦兴洪

一

在中国 3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不管哪个朝代，只要农民稳定，国家也就稳定。农民的饥荒与战乱、贫困与起义，成为中国历代历朝所面临的问题。到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开始萌动，国家的政治系于农村，系于农民，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农民领袖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于解决农民问题都给予了很大关注，他们无不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解决农民问题，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但由于他们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都始终未能改变农民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占国民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因而把农民问题作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并引导他们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早在 1923 年 2 月，彭湃就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造出来的米粒，我们的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sup>①</sup>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全部见解。他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sup>②</sup>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农民在政治上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实现了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成了土地的主人。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民的贫困与饥饿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熟谙国情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把

解决农民问题，引导农民向现代化转变，稳定农村政治，视为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还在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sup>③</sup>尽管在这中间党在指导思想出现过重大失误，导致广大农村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但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我国农村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期间，与一度失控和混乱的城市相比较，农村也相对稳定，农村经济还得以持续缓慢发展。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会议专门讨论了农业问题，拉开了我国改革的序幕。1984 年，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 80% 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 80% 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sup>④</sup>1987 年，邓小平又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 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sup>⑤</sup>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从农村开始的问题，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回答了农村改革的出发点问题，改革的战略目标问题，改革的主要内容问题，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地位作用问题，改革的依靠力量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等等，将农村改革一步一步引向深入，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当然，农民的变迁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出现过一些



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农村和农民的稳定，进而动摇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对此，党中央领导集体给予了高度重视。1990年，邓小平曾指出：“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sup>⑥</sup>

进入90年代，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深知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棘手，再三再四重申“一定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认为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和农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对此，党中央频频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不断发出稳农兴农的方针政策，连续颁布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问题的法规。据统计，仅从1990年至1994年的5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性的有关农村工作的会议25次，颁布了有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规、政策12个。这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没有的。

由于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放20年，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古老的农村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农民作为农村改革的主体和依靠力量，为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政局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农民的变迁也是罕见的。西方曾经有一种说法，叫做“农民第一”的观点，对于我国来说，更应该树立这种观点。农村兴，国运兴；农村衰，国运衰；农民定，天下定。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真理。

## 二

20年的农村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民和农村注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亿万农民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生了重大的变迁：

### （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上了新台阶

20年的农村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上上了几个大台阶。据统计，1997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在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获得丰收的基础上运行，农业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趋势，全年粮食产量达到4.925亿吨，比1978

年的3亿吨，增加了1.925亿吨，增长64.17%。乡镇企业增加值达18000亿元，农民收入增加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1997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在上年达到9%的基础上，又增长4.6%，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比1978年的133.57元，增加了1956.45元。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增加的大背景下，中国用了不到20年时间，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7年的5000万，<sup>⑦</sup>这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成就。全国广大农民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正从小康向更加富裕跨越。

### （二）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

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广大农民自主意识、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一部分农民成为全国及省、市、县、乡（镇）各级人民代表，直接参与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的管理和决策。二是绝大多数农民积极关心村、乡（镇）的公共事务，包括参与村干部及人民代表的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农民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自己满意和信赖的干部，上级机关的“长官意志”的作用明显淡化，特别是村级的直接选举，农民参政与民主意识更得到了充分发挥。三是农民懂得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现代媒介直至上访等手段反映问题，发表意见，表达意志和愿望，以便使政府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四是在农村基层生活中，农民的民主监督意识和监督作用明显增强，甚至有的农民对因政府的某些不合法行为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时，毅然依据《行政诉讼法》，状告国家机关，“民告官”，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三）农民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三中全会前，农村实行超越中国国情的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并把它绝对化、唯一化，而把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视为“异端”，在农村一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与此相适应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半自给自然经济。队长派工，集体劳动，统一经营。这种生产方式既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强化了农民的“均贫富”、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等传统小农意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并存。20年

来,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到适度经营,到股分合作制,再到产业化经营,农村经济向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转变,在中国广大农村呈现出市场化的新景象。过去农民是守着几分田,种田为业,以粮唯一。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洗脚上田基,穿鞋进城市,经商、办企业,向工商型转变,使农村经济从狭小的天地里走进广阔的大市场。随着农民个性的解放和自主意识的增强,一大批有胆识、善经营的农民率先打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和统一经营方式的束缚,带头承包集体土地、山林,带头办工厂、办农场,搞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在其他领域创新创造了重要条件,一是加速了农民经营商品化和农村市场发育的进程;二是促进农民由单一的种植业向多样化发展,进而推动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向市场化转变的进程中,农民作为这一转变的主体,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首先走向了市场。

#### (四) 农民阶级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分化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拓宽了农民致富之路,农村从单一的种养业向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多部门综合经营转变,形成了农工商综合发展的新格局。与此相适应,农民阶级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分化,农民由单一的农业劳动者向多种职业变迁。根据农民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这三个因素的组合,当前农民可分为八个阶层:一是靠承包集体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以农业劳动为主,收入的全部来自农业的农业劳动者。二是既从事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又兼顾农业生产劳动的兼业农民。三是脱离耕作的土地,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以非农业劳动为主,但户口仍在农村的农民工。四是拥有一定资金或某项专门技术或者经营能力,从农业生产劳动分离出来,使用自己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自主经营小型的工商服务等行业的个体工商业者。五是原来身分是农民或者居住在乡镇的居民,在乡镇企业里担任厂长、经理、企业管理人员的乡镇企业家,包括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六是具有一定的专门技能,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工作者。七是从事乡(镇)、村两级基层工作的农村管理干部。八

是以乞讨为聚敛财富的手段,达到发财致富目的的“要钱专业户”的职业乞讨者或“流氓”。

#### (五) 农民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农民有了钱不等于就现代化了,农村企业实行公司制,也不等于就实现了现代化,关键是农民自身的现代化。改革开放20年,中国农民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突破旧的传统,其自身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

第一,传统农民的数量逐步减少。所谓传统农民是指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90年代初,“9亿农民”中实际从事农业劳动的仅4.6亿人,其余在非农产业,或是未成年的儿童和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sup>⑧</sup>到1997年,仅乡镇企业职工总数已达1.35亿人,这一年新安排了400万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就业。<sup>⑨</sup>

第二,农民组织化水平逐步提高。三中全会前,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既控制着农村的政治大权,又控制着农村的经济大权,农民的组织化是以失去自主性为代价的。三中全会后,乡、镇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行政村、经济社取代了生产大队、生产队。行政村设村民委员会、村民议事会等,这些村民自治性组织的建立,表明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是以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积极参与本村的社会性事务为主要特征的。

第三,农民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农村劳动力为例,文盲半文盲从1985年占农村总人口的27.87%,下降到1993年的15.29%;初中文化程度从1985年的27.69%,上升到1993年的37.43%;高中文化程度从1985年的6.96%,上升到1993年的8.20%;中专文化程度从1985年的0.29%,上升到1993年的0.70%。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是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四,农民的生产活动从过去的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以前,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动往往都是凭经验。三中全会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广泛认同。农民日益注意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许多农村办起了各种文化补习学校,许多农民白天忙于干活,夜晚到各种补习学校学习进修,参加各种农业技术培训。仅从1986年到1993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

累计有超过 2.5 亿人次的农民先后参加了各种农业技术培训。许多农民从过去的“天命观”中走了出来，把对未来的期望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农民学科学、用科学、靠科学致富蔚然成风。

第五，农民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现代观念逐渐确立。农村现代化，关键是农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过去多年搞平均主义，富就一起富，穷就一起穷，几十年过去农民老是富不起来。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倡和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方针。短短 20 年，结束了农民的人均收入在低水平上停滞徘徊的状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新的贫富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农民走出家门，走进城市，走向世界，其固有的短视、保守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开放观念大大增强。广大农民积极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民的市场观念日益形成和强化。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冲击，使农民的竞争意识明显增强，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世世代代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怕担风险的旧式农民，变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勇于开拓前进的新式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过去那种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的比重上升，家长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不同辈分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日益被平等关系所取代。平等观念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使广大农民成为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自主自立意识取代了以前的盲从意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商品意识的增强，信息观念在中国当代农民中逐渐确立起来。到 1996 年，全国 95.7% 的乡镇和 53.5% 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在经济发达的农村，不少农民家里购置了电脑，有的甚至上了网，农民通过种种崭新的渠道了解和获取所需的国内外经济信息。

#### （六）农民生活方式走向文明化、市场化

过去农民生活方式是自给半自给的，带有封闭性、单调性和保守性。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方式向文明化转变。由于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也由于电子事业的发展，全国 90% 以上的农村告别了煤油灯时代，电灯、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先后进入了农民家庭，中国农民开始从“煤油灯”时代进入“电器化”时代。通电、通邮、通

路打破了一些偏僻山村的封闭状态，村里人走出去，村外人走进来，农民有了广泛的交往。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引导农民广泛走向市场，有的甚至走向国际市场，农民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从以前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单调的生活方式向多样化转变，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农民求知、求乐，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娱活动，正在取代封建迷信和赌博活动。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的吃、穿、住、用、行等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吃从填饱肚子，到讲营养，讲时令新鲜；穿从“一年四季一套衣”，到讲漂亮，向时装化、高档化转变；住从茅屋、泥瓦房，到讲宽敞，向砖木结构、框架结构、楼房转变；用从经久耐用，到讲质量美观；行从步行、肩挑背扛、马拉，向汽车、拖拉机转变，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已成为农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小汽车也已开始进入富裕农民的家庭。农民生活日益走向市场化，农民日益从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转变，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市场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 （七）农村的村风和民风出现了新的气象

改革开放 20 年，在农村尽管出现了一些早已绝迹的丑陋东西死灰复燃的现象，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和新型的道德风范正在形成。党的富民政策使部分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率先致富。他们致富不忘国家、集体和乡亲，出现了爱国家、爱集体、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和睦的社会新风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广大农村以村、户为载体，开展建设文明村、文明户活动，形成了富于时代气息的现代农村社区文化，文明村、文明户和和睦家庭大量涌现，从而促进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进步与提高。

### 三

20 年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呈现出许多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农民变迁的创造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早在 50 年代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期间，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曾两度纷纷试行包工包产。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给了第二代党



中央领导集体以启发和灵感；改革的突破口就选择在这里，中国的二次革命也从这里开始，一个大包干，便把农民中被长期禁锢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乡镇企业的崛起，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中国地少人多，过去亿万农民被牢牢锁定在这有限的土地上，无可奈何地守着贫穷的家当。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吃大锅饭时代掩盖起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揭开了。致富的愿望，推动着他们向土地以外去开发资源，寻找出路。于是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一部分人集资办起了乡镇企业，集体的、个体的、私营的几个轮子一起转。经过20年的摸爬滚打，乡镇企业在我国经济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并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雄厚经济实力。乡镇企业的崛起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民脱贫致富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面貌一新，主要得力于乡镇企业异军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农村改革的发明权属于农民，20年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迁主要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而这两条正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 （二）农民变迁的不平衡性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大国，各地自然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风情迥异，加之农村人口众多且居住分散，因而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农民，在变迁的性质、内容、变化的速度与方向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虽然从农村开始，但由于地区间的差异比较大，先是东南沿海地区启动，然后向中部地区推进，再向西部地区辐射。这主要是因为战略部署上要求有先有后，以及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同，各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参差不齐等因素造成的。

首先，不同地区经济总量差别扩大。1980年，东部与中部和西部的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为1:0.67:0.348，到1992年变为1:0.40:0.20。在全国农村工业总产值中，东部占75.4%，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7.5%和7.0%。

其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异突出。以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为例，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率为51.30%，其中东部地区有6个省区增长率高于50%，最快的广西高达129.79%。中部地区仅有江西和安徽两省的增速

超过50%，黑龙江省仅有19.6%。西部地区仅四川超过50%，青海、云南两省分别为17.68%和17.73%。<sup>⑩</sup>中国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还处于“偏安东南”的不平衡格局，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更为缓慢，这就需要中部“东引西进”，西部打开山门，打破封闭，大力发展。

第三，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80年东部与西部农民人均收入相差47元，其中最高与最低省分相差200元。到1992年，东西部差距扩大到395元，其中最高与最低省分8万人口相差1700多元。1994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东中部有所缩小。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617元，中部地区1087元，西部地区仅有856元。最高的上海市农民人均收入3437元，最低的甘肃省仅为724元，两地相差由上年的4.9:1扩大为5.1:1。<sup>⑪</sup>

此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只占9%至10%左右，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纯农户数量占80%以上。与农民职业分化相联系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正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蓬勃兴起，而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却迟迟不能启动。

以上仅从有形方面显示中国农民20年变迁的不平衡性，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但至今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在不断加剧。

## （三）农民变迁的承传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历史文明积淀成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意识结构之中。这些传统因素在中国农民变迁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总是顽强地表现出来。当代中国农民与以前相比，变化是巨大的，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变化更为显著。但是，中国农民传统要素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并未随着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而弱化，甚至有的传统因素还不同程度强化了。农村传统文化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削弱了，平均主义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平均主义这种道德意识并没有绝迹。农民的宗法家庭观念总体上说是淡化了，但在有些地区的农村，家族制度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表现出减弱的趋势，有些

地方，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村民财富的增加，家族凝聚力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宗法血缘家族观念、传宗接代观念等还很有市场，他们通过续家谱、修宗祠、联宗祭祖等活动，培育农民对家族的忠诚感。有的甚至以族代党、以族代政、以族代法，族权凌驾于党的组织和国家法律之上。农村基层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中枢机构，本应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但有的地方却变成了家族垄断制和世袭制。这种政治行为是封建主义价值规范的沉渣泛起。传统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但是，农民中的家族个人主义观念的复苏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集体主义意识，使农村社会中建立在集体主义观念上的“权威象征”发生动摇。在农村文化生活方面，出现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健康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存在农村固有的传统的落后文化和陋习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复归的现象，如迷信神灵、求神算命、建庙修坟，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农民有增无减；神汉巫婆、“阴阳”风水先生重操旧业，使得封建迷信活动在当今农村死灰复燃。

农民变迁中的承传性，这是中国农民从传统走向现代所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特别在改革开放、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出现这种变迁中的承传

性是正常的。只要我们正视它，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因势利导，就能化解变迁中这种对落后文化遗产的“承传性”，克服消极落后的传统因素。

---

①《彭湃文集》，第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73页。

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第237页，第355页。

⑦⑨参考马洪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32页，第24页。

⑧《中国信息报》1994年1月11日。

⑩经济绿皮书《1993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4年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⑪马洪等：经济白皮书《1994—1995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作者秦兴洪，广东工业大学教授（510090）

责任编辑：罗 苹

# 培植资源，保护环境，消除贫困

## ——广东造林绿化的启示

□林 若

1985年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五年消灭宜林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决定，并随之掀起造林绿化高潮。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广东大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什么问题值得回顾和思考，我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或许对人们有些启示。

### 广东造林绿化的成就是显著的

(一)如期消灭荒山，初步实现绿化达标。自从1985年开始，在五年时间里，全省完成荒山造林5080万亩，种果1000万亩，封山育林1000万亩，如期消灭了宜林荒山，摘掉了广东“荒山大户”的帽子。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广东“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称号。至1993年底，全省各市县基本达到了省级绿化标准，提前两年实现了“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宏伟目标。现在全省有林面积已从1985年的7055.5万亩增至1.3326亿亩，森林覆盖率从27.7%上升到54.7%。

(二)生态环境和自然面貌明显改善。广东经过十年的造林绿化，如今，放眼南粤山区，随处可见苍葱的林海，逶迤的山岭，丛林尽染。全省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4207平方公里面积已得到较好的治理，69万亩农田得到复耕，十多条主要河流的河床不同程度地下降，旱涝灾害逐年减少。全省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31.8%，人均公共绿地8.6平方米。

(三)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长。现在全省有林面积达到1.3亿多亩，活立木蓄积量达到2.5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54.7%，森林年生长量增加到1681万立方米，森林消耗量则下降到789万立方米，年纯增892万立方米。

(四)发挥屏障作用，调节小气候，粮食增

产，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现在广东的沿海、平原地区正在建设多林种的防护林带。大多数宜林海岸线营造了防护林带；沿海部分农田营造了农田林网。在粤北和西江走廊，已建成500多万亩以杉树、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基地。西江、韩江和东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治理。在中部丘陵山区，已建成750多万亩以湿地松、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和松脂基地。珠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岛500多万亩桉树用材林基地更是生机勃勃。所有这些，对抗台风，御海潮，改善农田小气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造林绿化，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减轻了洪涝灾害，保护了农田，改善了耕作条件。韩江、北江上游，东江中上游实行造林绿化、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后，保护农田150多万亩，使近百万亩农田免遭黄泥水危害，每年可增产粮食5000多万公斤。此外，造林绿化，对净化空气，减轻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等都发生了重要作用。

(五)绿化达标后，掀起综合开发山地经济的热潮。绿化达标后，林业工作的重点已开始转移向“三高”林业。现在全省各地把林业划分为生态公益林、用材林、经济林、丰产林、沿海防护林，以及各种水果基地的布局，由此产生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老百姓的话讲，现在是山变绿，水变清，人变富了。1985年以前，全省大片荒山、荒坡年复一年在沉睡，且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老百姓形容为“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便是当时的真切写照。过去，全省山地年亩产值，高的20多元，低的只有6—7元。现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像茂名市的山地年均亩产值已达200多元，高州市（县级）高达300多元。典型的山区怀集县也达到120多元。通过十年造林绿化，触发了人们的灵性和智慧，潜力在山，希望在山，致富在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综合开发，治山致富的热潮方兴未艾。只

要驱车离开市区，成片的果园到处可见。当逢水果收获季节，各种岭南佳果尽映眼帘，不少村庄农户用种果赚来的钱盖起的楼房被人们称为“香蕉楼”、“荔枝楼”、“龙眼楼”等等，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有的利用缓坡地和改造残次林，大种名、特、优水果，积极推进区域化、大规模的水果生产基地建设。有的发展小庄园，做到“山上一片林，山坡一园果，果下一群鸡”或“山脚一塘鱼，塘面一群鸭，塘头一栏猪，山上一园果”。各地采取各种形式的开发方法：有机关与农户联合开发，有合伙开发，有外商投资开发，有公司加农户开发等等。使开发性农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有的农民感慨地说：“十年造林绿化是共产党又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有的说：“没有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壮举，哪来今天的大地锦绣富饶。”

## 广东造林绿化的启示与思考

对广东造林绿化的实践，我感触良多。

一、毁林开荒，砍伐水源林，盲目掠夺自然的行为应坚决制止。森林是陆地生态的主体，它早在3亿年前就在地球上出现，而人类出现只是在100万年前的事。由于朝代更替、战争以及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大量砍伐森林，开垦土地，超载放牧，毁坏草原，使森林逐年大面积减少。再加上现代城镇建设迅猛扩展，林地被侵占，绿洲被围歼。工业发展，大气飘烟，环境严重污染，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熟悉历史地理的人们不会忘记，我国唐代繁荣一时的丝绸之路，由于生态环境受破坏，昔日的西部绿洲变成了今天的一片荒漠。由于森林被毁，昔日土地肥沃的黄土高原，如今变得干旱少雨，多风沙，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也是由于森林被毁，黄河的历史文明昌盛地位早已结束，中国的文明中心，早已向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转移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茂盛的森林，发达的林业，才能使我们繁荣富足。森林凋敝，则会灾害频仍，生命窒息。破坏了森林和生态环境，就等于毁了家园，也等于毁了人类自己。这是当今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此认识不足，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不断地毁林开荒，大面积砍伐森林，过度耕作，任意索取，掠夺自然，这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殷鉴不远，我们应

该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坚决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二、广东的实践证明，根据现在的领导体制，要搞好造林绿化，振兴林业，最关键的是取决于各级决策者对林业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过去广东的林业排不上队，林业部门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作出“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决策后，各级党政领导亲自过问林业，亲自抓林业，大会小会讲林业，一下子就把林业提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决策者重视了，就能把“绿化祖国”的一般号召变成具体的行动。要搞好造林绿化，光有一般号召不行，只进行一般的思想发动也不行。必须把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思想发动和办点的实践结合起来。决策者重视了，就会狠抓落实，以身作则，深入检查，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困难，具体指导工作，做到奖罚分明。决策者重视了，就会有造林资金。我省造一亩林，种苗费大约需要20元，一年造林1000万亩，就需要2亿元，完全靠国家有困难，领导重视，采取群策群力的办法集资，实行“国家投一点，省财政拨一点，银行贷一点，市县财政拿一点，部门支持一点，乡镇挤一点，群众出一点”的办法。“七个一点”就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决策者重视了，就能排除一切误解、责难和干扰，把工作进行到底。回顾造林绿化工作，开始时不少人的认识是多么不一致，有的没有信心，有的抱怀疑态度，有的认为由部门去抓就可以了，主要领导不必劳师动众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稍一放松就会走过场，变为讲“空话”。决策者重视了，就能下定决心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工作，使造林绿化最终获得成功。

三、大规模的造林绿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加强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大会小会都强调造林绿化的重要性。省委、省政府还每年召开一次山区工作会议。每年的山区工作会议，都根据造林种果和山区建设的实际提出具体的指导方针。如1985年我们提出“优势在山，潜力在山，希望在山，致富在山”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立足山区，造林种果，开发致富的思想基础。1987年提出培育森林资源要一手抓开源（即绿化），一手抓节流（即改燃节柴），使造林绿化工作“造、封、管、节”四管齐下，富有成效。1988年提出山区建设要实行分类

指导，上好“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造林种果、消灭荒山；第二个台阶是把造林种果引向集约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建设各有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第三个台阶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走资源、技术、市场相结合的路子）。1989年提出造林绿化“五个为主”（即以绿化达标为主；以改造疏残林为主；以营造阔叶林、经济林和速生丰产林为主；以护林为主；以集约经营，发展绿色企业为主）的方针。“五个为主”实际上就是分类指导，根据五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各自抓住一个为主去开展工作，以此指导造林种果和山区建设，一年迈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上好每个台阶。在具体的方法上，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际中探索。往往是造林绿化中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又想办法解决。可以说经验和办法都是随着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而形成的。如1985年我们发出“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号召后，各地反响不大，造林工作推不开，我们就探索出实行领导办点的办法，以点带面，促使全省造林绿化掀起高潮。1986年我们抓了一年造林后，发现森林资源并没有增加，反而还在下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又摸索出开源与节流结合，“造、封、管、节”四管齐下结合治理的办法。针对造林绿化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我们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办法，把造林与种果结合起来，把造林与农、牧、副、渔结合起来，加快林农脱贫致富。为了使山头能取得最佳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探索出“山顶松杂戴帽，山腰松竹混交，山裙果林药茶，山脚农牧副渔”的新布局。我省造林绿化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和创造出来的。

四、要抓好造林绿化，必须改变对林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我们刚开始抓造林绿化时，有的人认为造林绿化不是经济工作，抓造林绿化偏离经济中心；有的人则认为林业生产周期长、效益低，靠抓造林绿化的办法来使山区致富太慢，时间太长，“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有一些人，对造林绿化不是一点认识也没有，而是眼光短视，急功近利，能够在表面上马上看到“成绩”的事就抢着干，对于一时不容易看到成效的事就不大愿意干。这差不多已经成为目前存在于各方面工作的一种通病。如此种种，都形成对造林绿化、改造自然

的思想障碍。不排除这些思想障碍，造林绿化则无从谈起。从我省造林绿化的实践证明，造林绿化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显著的，其效益回报并不慢，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要十几年、几十年才能见效。我省造林绿化搞得好的地方，每亩山地收入上百元，有的甚至好几百元，一般三五年就见成效。不少山区通过造林绿化，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摘掉贫困帽子。

五、山林所有制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绝对不能轻易变动。确定一项政策，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科学的论证。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应轻易改变，因为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据这个政策布局。朝令夕改，必然造成损失。领导人可以更换，政策不宜多变，经济建设才能持续稳定发展。政策跟着领导来，政策随着领导走，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政策，看起来任任领导都有新招数，年年都有新套套，弄不好哪项政策和工作也贯彻不彻底，徒然浪费许多人力和财力。建国以来我们吃过不少的亏。不时改变所有制，变动山地权益，使农民对经营山林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是造成年年造林不见林，已有的森林也经常受到乱砍滥伐破坏的根本原因。现在要搞好造林绿化，必须保持体制的稳定性，不能经常变动政策。为了增强群众造林绿化的信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山林政策，规定山林承包期30年不变，30年后可继续承包，允许子女有继承权等，使群众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放心经营。政策真正落实了，群众就有积极性，造林绿化就能形成群众的积极行动。

六、造林绿化，符合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精神，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举措。造林绿化为广东提供了54.7%的森林覆盖率，1.3亿亩的林地面积，2.55亿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量，年产500万立方米的商品材，促使林业生产从传统、粗放、低效向现代化、集约型、高效率转变，激发起农民立体开发种养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我们设想，广东有1亿多亩的山地，只要每亩山地提高几十元的产值，那么就是几十亿元。现在茂名市的山地亩产值就已经从过去的100多元提高到200多元，说明这个设想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造林绿化，完全符合中央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精神，务必长抓不



懈，推而广之。

从另一方面看，目前被人们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质就是在尽快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综合考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消除贫困，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而造林绿化，其目的就在于培植资源，保护环境，消除贫

困。造林绿化，能够保障农牧副业稳定、高产、持续发展；为工业提供环境和资源；是振兴山区经济的根本之路。同时又是创建优美清洁生态环境，满足人类对健康和精神享受的需求。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战略缺此不可啊！

作者林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510080）

责任编辑：童 轩

·学术动态·

---

##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珠海召开

由珠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11月27日至29日在珠海市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鉴于过去因资料的缺乏和其他原因而对容闳研究未能给予重视表示遗憾，一致认为，像容闳这样一个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均有关联的人是不多的，因而必须重视和重新审视容闳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和贡献，给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学者们通过对容闳这位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的近代化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容闳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的作用和影响、容闳与近代中国名人的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分析和研讨，认为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这次研讨会无疑是容闳研究的新起点和推动力，但如何深化和拓展容闳研究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又一热点，尽管这次研讨会在资料发掘、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学者们认为，进一步收集、整理和出版有关容闳的资料是今后的重要工作，而组织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举办研讨活动仍是推动容闳研究的有效形式。（林有能）

# 论广东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董富胜

## 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5年，冲破传统的统购统销模式，试图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在这个阶段里，广东省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基本与全国改革同步，对粮食逐步缩小统购统销范围，调减统购计划，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实行“双轨”制：提高统购价格，对农村返销粮实行购销同价，对工业、饮食业、饲料等用粮放开销价；中央对省、省对各地实行粮食购、销、调和财务一定几年包干管理；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多渠道经营；粮食企业实行“本业为主，多种经营，多元发展”。同时，1984年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放开粮食经营的试验。

第二阶段，1986年至1991年，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以价格调整为中心进行改革。1986年以后，广东改革步伐较兄弟省份加快，实行粮食购销价格联动；逐步取消各项奖售粮；1988年食油放开经营；1991年实行购销同价，并略有顺差，使多年来被扭曲的粮食价格逐步向市场形成价格靠拢。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按照“计划指导，放开价格，加强调控，搞活经营”的原则，率先于全国放开粮食价格，并建立地方粮食储备制度；1994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实行粮食工作责任制考评制度和收购定购粮最低保护价及销售最高限价；

1995年，根据国务院规定，实行“两线运行”和“米袋子”各级政府负责制，建立各级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健全完善粮食管理机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践，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全局，务必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是稳民心、安天下的重要战略物资，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调整无不与粮食问题密切相关。有关专家指出，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产量如果保持在750—770斤左右，大体上可以做到偏紧的平衡，超过800斤才略有节余，低于750斤就有市场波动的危险。而我国人均粮食产量都在750斤左右，最高年份也不到780斤，过的是紧日子。广东的粮情更为严峻，以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纪录的1997年计，人均粮食产量才540斤，商品粮供需缺口达75%以上，而且量大面广。全省以县（区）为单位，略有余粮的仅14个，其余90%都是缺粮县（区）。因此，粮食在任何时候都决不可掉以轻心。

（二）全面走向市场，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粮食既是战略物资，又是特殊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必定要走向市场，按市场法则运行。但现行的粮食流通已极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企职责不清，亏损严重，已到了不改革国家不堪重负，企业无法发展的地步。因此，必须面向市场，属政府管的事由政府负责，企业一律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三）完善形成价格机制，正确处理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处理好上述

“四者”关系，已集中反映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粮食购销价格，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定在合理的水平上，购价要保护农民利益，销价既要使经营者有合理利润，又要考虑消费者和国家的承受能力，以确保政策性亏损补贴及时足额到位。

（四）发展粮食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实践证明，加强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一是要管住收购、批发，掌握足够的粮源。二是要健全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三是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和一定规模的粮食风险基金。四是要有强有力的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和服务体系。

（五）要充分利用省内外、国内外市场配置粮食资源。广东人多地少，粮食增产潜力有限，产不足需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缺口将越来越大，70%以上的粮食商品需求量既依靠省外、国外两个市场调剂来解决，也受两个市场的严重制约。因此，做好外采和进口工作，对稳定广东粮食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二、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围绕“一个根本转变”，建立“六个机制”。“一个根本转变”就是改革的实质从过去侧重于政策措施的调整，向立足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和机制转变。建立“六个机制”是：

### （一）转换粮食企业经营机制。

政企合一我国国有粮食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次改革明确规定要把政府的行政职能与企业彻底脱钩，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这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关键所在。与此相对应，所有国有粮食企业都要面向市场，实行独立核算，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不承担粮食行政职能。这就触及到了粮食流通体制最具本质性的弊端，为粮食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广东的改革方案突出强调政企分开，企业要全面走向市场。县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是代表政府对全社会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的职能部门，必须与企业是分离的，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其中执行政策性业务的储备企业，政府给费用，实行代理制。粮管所经过近年的改革，队伍已经大大缩小，分流后留下少数人员主要承担收储业务，因此不是“一刀”把队伍切成两半，而是通过县组建收储公司的办法实现附营业务与收储业务分开。

### （二）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这次改革，在粮食价格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规定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购销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粮食企业按市场价格经营粮食。对定购价、保护价的定价权也下放到省，不再规定全国统一价。政府对价格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实施最低收购保护价、最高销售限价和储备粮吞吐等手段调节市场。广东省规定，省政府制定最低收购保护价和销售最高限价的原则和调控指导目标，市政府根据当地粮食生产成本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必要时省政府直接制定收购最低保护价或销售最高限价。实行政府定价所产生的差价和亏损，由政府负责。这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价格，完善了价格机制。

### （三）建立合理的粮食责任机制。

这次改革明确规定，建立责任机制的总原则是：实行在国务院宏观调控下地方政府对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的体制。国务院主要制定中长期粮食发展规划，搞好全国粮食总量平衡，确定全国粮食购销政策和价格政策等。各省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省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粮食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做好粮食收购工作，定购粮由政府委托地方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合同并组织收购；保证军需民食；消化新老挂帐，管好用好收购资金；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搞好粮食流通设施的规划、建设、维修和改造；搞好省间调剂等。这样，粮食工作的责任主体就由过去较多地依赖中

央解决总量平衡调整为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这样一种责任机制。

#### （四）完善粮食储备调控机制。

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油储备制度，是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主要手段。过去各级储备粮油都委托粮食企业代管，今后中央储备粮油由国家粮食储备局直接管理，按照经济区域成立若干个储备公司。同时，上收 200 亿斤仓容粮库作为中央的直属库。广东省的地方粮食储备制度，是从 1992 年率先全国建立的，现在已经达到 30 多亿斤规模，其中省级计划 10 亿斤，已落实 6 亿斤。对省级储备粮，也要参照中央的办法加强管理：把过于分散的省级储备粮集并到县以上储备库，不设立直属管理机构，但对业务实行垂直管理，费用、利息直接拨补到粮库。市县储备粮管理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储备规模，广州、深圳等地级以上市政府所在城市和自给率达不到 70% 的县（市），按照 6 个月销量建立，其它县（市）按照 3 个月销量建立。按照这一原则，对各市的地方储备粮指标作了调整，作为各市近年应达到的目标，而今年仍然按照已下达的任务进行考核。各级储备粮的费用和利息补贴要足额到位。

#### （五）建立收储资金运行管理机制。

按照新老帐目分开的原则，对粮食企业在两个时段的粮食财务挂帐明确规定了消化办法和期限：1992 年 3 月 31 日前的财务挂帐，继续由地方政府在责任书规定的日期内消化；对 1992 年 4 月 1 日至 1998 年 5 月 31 日的新增财务挂帐和不合理占用贷款资金，经审核确认纳入消化的亏损挂帐，从 1998 年 7 月 1 日起由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企业实行停息。粮食企业在 1998 年 6 月份应支付的上述贷款利息，纳入消化计划。广东省挂帐本金和利息，从 1998 年 7 月 1 日开始在 3 年内消化完。为此，广东省政府确定，粮食企业在这一期间里新增财务挂帐，要按中央的要求，分三年由政府全部解决，原则上由市县层层负责，自己消化。各市要做出计划，各级财政都要压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对困难的市，省财政将参照中央的作法，垫付一部分资金，以后由这些市逐年归还。

#### （六）规范市场管理机制。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经济。规范粮食市场管理，是建立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当前，规范粮食市场管理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管住收购。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粮食收购坚持以国有粮食企业为主，不得随意放开。除国有粮食部门外，严禁私商和其他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二是要对粮食批发实施有效的管理。实行粮食批发准入制度，企业经营粮食批发业务必须有规定数量的自有经营资金和可靠的资信，有必要的经营设施，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执行丰年最低储存量和歉年最高储存量的规定。三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省、市、县三级粮食批发、交易市场要抓紧建设，并建立规范的交易规则，粮食集贸市场常年放开。四是要加强粮食立法工作。

### 三、扎实工作，确保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前，粮食系统应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统一思想，积极参与和推动深化改革。

这次改革利国利民，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一是政企分开，政府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作为独立法人，企业可以按市场经济规律开展经营活动。二是对新增挂帐和不合理占用资金明确了解决办法，并明确企业不再承担政策性亏损，政府要及时拨补政策性费用、利息。这样，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与其他企业处于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三是政府仍然保留了过去扶持粮食企业好的政策。四是明确了企业的改革方向，把企业推向市场，有利于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观念的束缚，促使我们彻底走向市场，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二) 粮食企业必须全面走向市场, 在市场中谋求新的发展。

要下大力气抓好企业自身的改革。广东现有粮食企业, 普遍存在人员多、效益低、管理水平差等问题, 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务院、广东省政府提出要加快企业自身改革, 实行“抓大放小”, 改革产权制度, 推动资产重组。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 实行股份制改造。对一些中小型企业, 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改革措施。国有粮食企业要培植一批规模大、实力强、跨地区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通过兼并、联合等形式, 实现优势互补, 壮大实力, 并带动一批中小型粮食企业的发展。对一些长期没有效益的企业, 该关停的要坚决关停, 要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程。一手抓减员, 一手抓再就业。要通过广开就业门路, 妥善安置好下岗职工, 决不能简单地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同时, 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 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切实将粮食部门的下岗职工纳入当地的再就业工程计划。

(三) 粮食部门要在粮食宏观调控中充分发挥作用。

广东是缺粮省, 粮食缺口很大, 更不能放松粮食工作。放管必须结合, 只管不放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只放不管不符合省情粮情, 在这个问题上, 广东是走过弯路的,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各级粮食行政机构健全起来。因此, 越是改革, 越是要强化政府粮食行政部门的行政职能, 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动摇。要抓好收购、采购, 管好储备粮, 搞好批发业务。

(四) 做好财务挂帐清理和消化工作, 切实加强资金管理。

根据国务院决定精神, 广东省决定从1998年6月份起, 用3个月时间, 由审计厅牵头, 财政、粮食、农发行等部门参加, 对1992年4月1日起至1998年5月31日的全省粮食新增财务挂帐及占用农发行贷款进行全面清理审计。这是关系到粮食企业能否实行政企分开, 转入新机制的关键

问题。各级粮食部门要密切配合, 切实做好财务挂帐确认和消化帐户划转工作。今后, 政策性收储业务的财务结算, 由县级粮食收储业务结算中心承担; 对基层粮食企业实行委托代理制, 绝不允许产生新的挂帐。

(五) 继续抓好粮食流通设施的建设。

搞好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是实现改革目标乃至完成整个粮食流通工作任务的物质基础。“九五”期间广东省计划新建30亿斤仓容粮库, 其中9亿斤仓容争取中央安排建设, 目前已安排4亿斤。地方负责投资的21亿斤仓容粮库, 到1998年4月, 已铺开建设规模18.7亿斤仓容, 占考核规模的89%; 已建成7.6亿斤仓容, 占考核规模的36%; 已完成投资8.2亿元, 占总投资计划的67%。总体上, 地方库建设进展比较顺利, 基本上符合省政府对建设进度的要求。但广东两年多来的粮库建设工作也存在不足之处, 主要是市直属粮库建设滞后, 部分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落实, 个别市开工规模仅占任务的10%, 今后各地应抓紧完善粮库的建设规模和质量。

(六) 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粮食职工队伍。

目前, 我们的职工队伍普遍存在人员偏多、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高的问题。各地粮食部门要以这次改革为契机, 狠抓队伍建设。要加强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搞好精神文明教育, 通过多种途径, 努力塑造粮食干部职工的新形象。要坚决调整人员结构, 坚定不移地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同时, 要突出重点抓好经营队伍建设, 培养经营人才。要在全系统内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 尽量把一些有经营头脑、素质好的同志挑选出来, 给他们位子, 让他们挑担子, 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为整个粮食工作作出贡献。

作者董富胜, 广东省粮食管理储备局局长(510050)

责任编辑: 谭湛明



# 国企经营者年薪制试行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 李善民

在我国，从1992年6月上海轻工局首次选定英雄金笔厂、上海油墨厂、上海纸箱厂作为试点单位开始，经过近6年的时间，现在年薪制已在上海、广东、江苏、北京、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福建、云南等十多个省市的众多行业中推行。试行的结果表明，年薪制有利于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企业家的经营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也存在激励不足，经营者的合理收入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试行年薪制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以便国有企业年薪制的推广，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

## 一、年薪制试行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国有企业试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效果是明显的，它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据调查，深圳首批6家试点企业1995年实现利润8.95亿元，比1994年的7.50亿元，增长19.3%，1996年实现利润10.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7%；1995年净资产为44.65亿元，比1994年的37.41亿元增长19.4%，1996年净资产为54.02亿元，比上年增长21.0%。新增的3家试点企业1996年实现的利润3.25亿元，比1995年增长18.0%，1996年净资产为18.34亿元，比上年增长24.9%。<sup>①</sup>虽然促进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的因素很多，但这无疑与年薪制改革激励经营者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国有企业的年薪制改革的目的，是将

经营者的利益与其经营业绩挂钩，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经营者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适当分开，使经营者与员工相互制衡；将经营者的年薪收入公开化、规范化，有利于减少经营者的职位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在国有企业的年薪制改革的试点中，我们发现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

1、确定的年薪水平太低，不能有效地激励企业的经营者

国有企业的年薪制改革要真正见效，必须使所确定的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水平有利于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目前各地在年薪制改革中大多规定了年薪的最高标准，对此笔者并无疑义，但规定的年薪标准缺乏弹性，不利于企业经营者积极性的发挥。如北京市规定，经营者的基本薪金收入不得超过北京市和本企业职工综合平均工资的3倍，风险收入不得超过的基本薪金收入的一倍；劳动部也明文规定企业经营者年薪收入不得超过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4倍；上海市还规定超出这个范围即为违法。<sup>②</sup>这样的规定使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收入完全取决于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根本不能发挥。根据深圳市劳动局工资处提供的资料，1996年深圳市人均收入为14508元，试点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收入最低的也只有3万元，最高的也不过12万元，<sup>③</sup>而深圳一般的白领工薪阶层也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一些保险推销员、在外

资公司工作的销售员的收入还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高，一些民营、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和三资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有的更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会流动到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工作。第二，企业经营者年薪不高，导致企业经营者职位消费。一方面，规定企业经营者不能拥有令人眼红的高薪收入，另一方面，却缺乏对经营者职位消费的约束，企业经营者消费、享受只要名义上为公，则消费多少都名正言顺，经营者的私人开支可采用很多的变通办法用公款报销。可想而知，企业经营者如果将精力用于在职消费和通过各种途径寻租，企业的经营绩效会不会提高。第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收入既然取决于本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经营者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年薪收入，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增加本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假如经营者通过加强管理、改善经营、提高企业效益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年薪收入，这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但假如经营者是通过少提折旧、加快机器设备的磨损等短期行为，来达到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从而提高自己年薪收入的目的，这就会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后劲。

## 2、经营者收益与责任不对称，经营者不能真正对企业经营绩效负责

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设计的本意是想让企业经营者在既负盈也负亏的情况下，搞好国有企业。但在国有企业的年薪制改革的试点过程中，普遍出现企业经营者只负盈不负亏的现象。具体表现在：第一，企业经营者的基本薪金收入必须保证的作法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如深圳市 1998 年改变了风险收入可取负值的做法，保障国有企业经营者有稳定的基本收入。这种做法的确能保障经营者的基本生活，但是如果企业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仍能拿到工资，而不必为亏损负责，而在企业盈利时又可取得风险收入，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普遍没有建立风险抵押金制

度和风险基金制度。年薪制中的风险收入应当是厂长经理将个人财产或资金作抵押所获得的收益，这部分收入的最低界限是，不应低于其财产价值或资金相当的银行利息。风险抵押不仅能增加企业所有者和职工对经营者的信任程度，而且还是经营者个人收入高于企业科技人员和一般职工的重要依据。现在不少的企业在试行年薪制时，并没有进行风险抵押，原因是厂长经理拿不出风险抵押金。对此我认为，风险抵押金必须交纳，交多交少可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假如想作企业经营者，又交不出风险抵押金，这样的人只能作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当他有一定财产积累时，再来竞争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 3、外部条件不理想

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是资本所有者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和约束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体现的是企业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制度安排需要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产品市场。就资本市场而言，企业经营的好坏可以通过股票的价格反映出来，如果企业经营不好，就会有被接管、被兼并的可能，从而对经营者形成压力。就完善的经理市场而言，指的是由市场来选拔配置厂长经理，形成经营者的合理流动机制。厂长经理作为一种商品和资源，其准确的价格只有在市场的流通中自然形成。在完善的经理市场上，如果企业的经营者经营不好，被解聘或辞退，他就很难找到比现在更高年薪甚至一样年薪的工作，这也被称为经理市场的“声誉”机制。而完善的产品市场，是指产品的价格合理、价格体系没有扭曲，企业的经营绩效可以客观地得到反映。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前两个条件还不具备，在资本市场上，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资本市场规模太小，另一方面股市投机现象严重，股票的价格在人们投机心理的作用下有时高得离奇，有时低得不可思议，根本不能反映企业经营

的好坏。在经理市场方面，缺乏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淘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还没有经理人市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仍然采用行政干部任免制。在产品市场方面，国家对产品价格控制仍然较多，产品价格扭曲现象仍较严重，原材料行业与加工行业的价格关系极不合理，企业经营的好坏不能完全客观地在产品市场上得到反映。

## 二、解决现存问题的思路选择

国有企业试行年薪制是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一个大胆尝试，虽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但我们可通过建立健全内部考核和分配制度，创造适合年薪制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年薪制的积极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 1、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年薪制

长期以来，我们将企业经营者与一般的劳动者等同对待，把经营者的收益与一般劳动者的收益混在一起，采取支付低工资的方式对待经营者，从而造成企业收入的增长与经营者的收入增长不一致，致使工资对经营者失去了激励作用。采用年薪制，使经营者的收益与劳动者的收益脱钩，使经营者的收益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更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采用年薪制有利于企业的经营者规范企业行为。作为代理人必须考虑出资人的利益，他不能不顾实际而加大职工的工资总额，损害出资人的利益，也不能不考虑职工的收入，否则难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在年薪制问题上，我们要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年薪制上拉开经营者与一般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差距。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年薪标准的制定要考虑到广大职工的利益得失和心理因素，经营者的收入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不宜过大。我主张应允许企业经营者与一般职工有10倍以上差距的收入，而不应限制在目前的4倍范围之内。只有真正拉开差距，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将经营企业作为自己唯一的长期的职业，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从事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为中国培养一批企业家。

在基本薪金收入和风险收入的结构比例方面。我主张缩小基本薪金收入比例，加大风险收入所占的比例。

当然，在实行年薪制时，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核算体系。考核一个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成果是一项系统工程，原来只考核净利润和净资产的指标体系还不够，应加上行业因素、净资产利润率、市场营业收入等因素的考核指标。还应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因素，制定相应的调节系数。此外，还应该严格执行先考核后兑现制度，真正发挥年薪制的激励作用。

### 2、建立风险抵押金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

企业经营者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经营期间，如果没有风险抵押，就不可能对企业的所有者和企业的职工提供任何保险。企业盈利，经营者当然可以获得他应得的高年薪收入，但一旦企业亏损，经营者因为没有交纳风险抵押金，不能在抵押金中扣出，事实上是负盈不负亏。因此，在实行年薪制时，经营者必须有能力交纳风险抵押金，并必须以自有的财产或资金交纳风险抵押金。年终考核，如果企业未完成规定的指标，经营者不仅要减少年薪，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也要按不同比例扣减。在实行经营者年薪制的过程中，还应当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经营者与企业效益相联系的年度奖金的一部分应转入风险基金，以增强经营者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和信心。

### 3、不断改善实行年薪制的外部条件

不论是从国有企业的市场环境，还是从国有企业的法律环境来看，我国实行年薪制的外部条件都不够，没有健全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这使经营者人力资本的甄别和经营绩效的客观评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失真。第一，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发展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较为成熟的基础上推出股票期权。在股票期权下，如果公司经营好，公司股票的价格就能够不断地上涨，经营者就可以通过行使股票期权所赋予的权利，而获得可观

的收益。反之，如果公司经营不善，股票价格就不会上涨，甚至还会下跌，经营者就可以放弃股票期权所赋予的特权以免造成损失。股票期权激励经营者不断努力改善公司经营管理来实现公司资产的不断增值从而实现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这样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利用股票期权通过报酬机制将经营者的行为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要发育和培养经理人市场。缺乏高素质的企业经营者是我国企业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预测能力，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市场经营能力。只有较多的企业经营者进行竞争，才有高素质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才能推行。第三，

要进一步发展产品市场。要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产品价格，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规律惩罚不合市场需求的生产行为。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如个人破产制度和赔偿制度，形成有利于年薪制的外部环境。

---

①范红军，《转轨经济中国国有企业经理激励机制设计》，打印稿，第60—61页，1998年。

②高良谋，《施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4期，第58页。

③贾柳华，《让经营者收入公开化、规范化》，《企业管理》1998年第6期，第16页。

作者李善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学术动态·

---

## 广东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 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社科院和广东省社科联于1998年11月20日在广州联合召开了“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省委领导和老同志杨应彬、陈越平、张汉青、郑群以及专家学者70多人，收到论文30多篇。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研讨会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指出开展对刘少奇思想的研究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习、研究刘少奇的思想，关键是要学习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今改革开放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第二，要把学习研究刘少奇的思想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把它作为当前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三，要把学习、研究刘少奇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同深入研究当前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结合起来。要围绕“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个总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把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朱春燕）

# 规范企业破产，提高资产运行质量

——“完善破产法与推进产权改革研讨会”述要

□本刊记者 韦 前

“规范企业破产，优化国有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行质量”，这是1998年10月11-12日“完善破产法与推进产权改革研讨会”上有关专家的看法。会议由广州市体改委与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在广州联合举办。来自人民法院、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其它经济法律工作部门的4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规模不大，但气氛热烈。现将会议讨论的内容作简要的综述。

## 一、东南亚金融风暴背后的问题实质

当前世界经济最为令人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一年前最先发难于泰国，其后迅即席卷包括韩国、日本的东南亚地区，接着冲击俄罗斯，几个月前又扩散到拉美地区，时下正直逼美欧经济，金融危机快速传递背后反映出来的经济质量问题自然成了本次研讨会的破题点。与会专家警告，尽管危机对中国目前影响不大，中国金融体系也因之而赢得世界一片赞美之声，但导致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经济质量恶化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存在着，不可掉以轻心。与会者对此表示普遍的赞同。有专家进一步强调指出，经济质量问题并不仅仅是金融监管体系问题，而首先或关键在于企业体制。我国当前的企业问题一方面是要上规模、上效益、上质量，但另一方面是，企业体制僵化，既然竞争不能劣汰，也就无所谓优胜，也就很难谈得上规模效益和质量。

## 二、一串数字引出破产法在中国的特殊意义

我国的企业经济质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有关专家列举出一系列统计数据，尽管数字比较枯燥，但很能说明问题。（1）1996年国有企业亏损总额大于盈利总额，出现了国有经济的总体亏损，仅预算内国有企业盈亏相抵之后的净亏损就达18亿元，到1997年盈亏相抵的净亏损数攀升至293亿，而据1998年9月28日《经济日报》公布的统计数字，1998年仅1-8月盈亏相抵净亏损就高达702亿元。这个大窟窿不解决势必影响乃至恶化国家的金融财经环境。（2）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1996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企业占66.8%，非国有企业占33.2%；而在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只占28.5%，非国有企业则占71.5%。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部工业中，国有企业占有大约70%的资源，却只产出30%的产值；而非国有企业只占30%的资源，却产出了70%的产值。这种倒三七的比例关系，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连续多年的恶化情况，暴露了国有经济的效率普遍严重低下。专家指出，让亏损持续恶化、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还债，天经地义。（3）从1988年我国正式实施破产法算起，全国企业破产案件立案数1989年为98件，1990年为32件，1991年为117件，1992年为428件，1993年为710件，1994年为1625件，1995年为2348件，1996年为6222件，1997年有所下降，只有4526件，但



1998年1-9月破产立案又呈上升势头,不仅超过去年同期,而且超过前年同期,全年可能再创最高纪录。由此反映出我国企业破产的一些特殊性,第一,我国一些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中一些资产不良的部分正按破产程序进行重组,从全局看,这种重组的总量并非逐年上升,而是呈现出一种马鞍形特征。第二,我国企业破产数与国民经济景气周期并不一致,一些经济景气年份反而是企业破产数较多的年份,这可能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规定性有关。第三,专家指出,破产案件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如果说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必然现象,那么没有破产或破产太少都不是好事,都不利于优胜劣汰,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务必掌握好企业破产的“度”,这个“度”也就是“恰如其分”。根据国内外统计资料分析,恰如其分的“分”应当是占企业总数的1%左右。而我国至目前为止最高纪录的1996年破产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0.06%,因此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无规矩不足以成方圆”。要使资不抵债的企业得到合理的破产,真正保护债权人利益和国有资产不流失,就得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企业破产规范,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实施。在这里“规范”有三层意思:其一,主要是指法律规范,所有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做法都要统一到法律规范上来;其二,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维护破产法,从而为规范企业破产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与运行环境;其三,“规范”并非凝固不变,破产法经过一定时间检验后,要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作出适时的调整或修改,同时要做好破产法实施的经验积累工作,为今后有关法律法规条文的修订提供基础性依据。

### 三、要正确认识破产法在中国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自1988年11月1日正式实施(1986年12

月2日正式颁布)以来,历经10个春秋,走过来了。但道路并不顺畅,这与我们对破产法的作用认识不足有关,为此要进一步推进破产法在我国的有效实施,需对破产法在我国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或新的认识。

有学者从两个方面总结破产法实施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促进。一方面是使旧体制内在固有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让人们正确地、充分地了解、认识和掌握旧体制问题的属性与根源,从而为改革的设计者提供决策的依据。国有企业并非中国所独有,国外不乏好的典型案例,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中国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国也有其问题的特殊性。改革的设计者必须从这些特殊性出发,才有可能找到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及其实施路径。企业破产,是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问题的总暴露,实施企业破产法,让该破产的企业得到合理的破产,让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充分曝光,找到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达成共识,才可能找到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另一方面是为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引出一条现实的出路。不少人已经看到当前我国国有经济素质较差的根本弊病在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制企业占企业的比重太高,并提出逐步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出路选择。但应采取什么办法,依据什么路径来分步降低这一“历史悠久”的比重问题?对此,没有现成的模式,出路在于改革,但改革的要求是一回事,而改革的路径则是另一回事。实施破产法给人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让一部分落后的资质较差的企业宣告破产,使其资产通过拍卖市场转移到购买者手中,国有资产的数量比重可能会因之而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释放不良资产的国有资产比重下降,其背后揭示的正是我国优化产权结构的路径所在,或者说,正是解决我国所有制与占有权矛盾的突破口。

总结过去10年企业破产法在我国的实践,与会者形成一个共识,企业破产法在促进资产重组、提高国有资产质量方面功

不可没。资产重组是实现企业规模效益扩展与企业内涵增长的重要途径，又是提高资产质量的关键。专家对兼并与破产这两种企业资产重组方式展开分析道，兼并的过程是劣势企业的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的过程，优势企业通常以现金收购、股权置换或承担债务等方式来取得对劣势企业的资产控制权；但如果劣势企业的债务负担太重，或已经濒临破产，甚至早已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况，高于资产额的巨额债务就成为妨碍企业兼并的障碍。为此合理的办法只能是在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情况下进行兼并。即劣势企业作为债务人依法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在变卖破产财产时，兼并者出资收购。这样，依法破产还债不仅使原有的债权债务得到了合理的了结，而且减少了企业兼并的障碍，有利于资产重组。再说，企业破产还债让原先凝固的不良资产进入资本市场流动，通过流动，重新配置，找到其真正的“价值位置”，实现再增值，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件大好事。

#### 四、问题与建议

10 年来的正反两方面实践证明，企业破产法在维护债权人利益，促进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国有资产质量等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也是其它法规所不可能替代的。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深入，破产法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将进一步得到证明。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来自第一线的同志指出，现实的企业破产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正遇到种种的困难与问题，违背企业破产法的

做法时有发生，一些债务人的破产欺诈，手法主要是通过企业投资、企业分立等手段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使破产财产减少，侵犯债权人的利益等。就企业破产法本身而言，原定的企业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结果使经常发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破产案件无法可依；其后，1991 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专设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将破产还债的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法人，但全章总共只有 8 条，不足 800 字，不可能对企业破产问题作出应有的较为详细的规定；有些条文显得太简单、太笼统，不便于执法等。

有的代表从人文历史的层面上讨论了企业破产法在现实执行中阻力重重的原因。“破产”，至少对当事人是个“不利”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则更是个“不吉利”的人人避讳的字眼，这是我国企业破产法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人文原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商品经济发展先天不足的国情实际去实施这一要求有较好的市场经济基础的法规，正是其实施难度和曲折程度的最基本规定。

今天，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实施 10 周年，10 年不算久，但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正式实施后的 10 年，初试的经验特别宝贵，对后人的启示尤其深远，值得我们去总结、提升；而初期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亟待研究分析、解决。正是基于进一步完善现行企业破产法，促进改革深化和国有资产质量提高的目的，会议还就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要扩大，破产界限的规定要符合国际惯例，破产工作专业化、市场化等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 福利经济学的批判性重建

——'9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学术贡献述评

□ 邓 翔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 1998 年 10 月 14 日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国内知识界也许对阿马蒂亚·森的名字较为陌生，实际上，自 70 年代以来，他就已在西方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界声名显赫。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早在 1994 年就预言森必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森的主要贡献是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他对这一领域的重要的基础性命题作了新的诠释。我们知道，福利经济学中的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指出了市场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将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效率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这二个定理并没有解决分配问题，即经济的馅饼如何切割的问题。本世纪三四十年代，A·柏格森和 P·萨缪尔森，找到了将福利分配形式化的方法。他们提出了一个我们称之为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该函数可将个人的偏好加总成社会的偏好，其数学形式如下：

$$W = W(u_1(x_1), \dots, u_i(x_i), \dots, u_n(X_n))$$

其中  $n$  表示一个社会人体的个数， $x_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消费束， $u(x_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效用水平， $W$  表示社会福利函数；类似地， $W$  和  $u(x_i)$  也可表示社会和社会个体的伦理价值观。

我们从上式可以看出，社会福利函数就是各个个体效用函数的函数；如果  $n$  个

个体的效用可能性集合是个凸集，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使福利函数最大化的点。

但是，50 年代 K·阿罗证明了“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揭示出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福利理论存在着逻辑和哲学问题。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实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投票模型”看出来。假定有甲、乙、丙三个人，面对 X、Y、Z 三个备选方案的选择，他们的偏好由高到低的排列为：

甲	X	Y	Z
乙	Z	X	Y
丙	Y	Z	X

一种简单而常用的办法，是按多数人的偏好来决定。在本例中，大多数人认为 X 胜于 Y，同样大多数人认为 Y 胜于 Z。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的偏好应该是 X 胜于 Y，Y 胜于 Z。如果社会的偏好有传递性，则社会的偏好也应该是 X 胜于 Z。但事实上，多数人偏好 Z 胜于 X。由此看到，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作出的集体选择，将导致偏好循环 (preference cycle)。

为此，阿罗定理表明，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从个人的序数偏好，得出社会的偏好与选择，即不存在集体决策的理想方式。阿罗定理不仅在福利经济学，而且在政治学与实际民主规则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他的“不可能性定理”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并由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社会选择理论 (Social Choice)。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解释，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是把个人利益、个人

判断或个人福利汇总为社会福利、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的某种总合概念”。

毫无疑问，阿罗的结论像捅了马蜂窝，在福利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自70年代以来，森是这场争论的中心人物，其他重要人物还包括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在这场争论中，森逐渐对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性重建。

森首先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规范性命题作了基础性工作。在他1970年著作《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一书中，森将阿罗定理的4个公理性条件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这四个条件分别是：自由选择条件、帕累托一致性条件、独立性条件和非独裁性条件。森在此公理条件下也作出了不可能性证明。这一定理也被人们称之为“阿罗定理——森”的形式。

其次，森还为阿罗定理的变形与扩展作出了贡献。经济学家们都希望避免“不可能性定理”的符咒，找到理想的民主规则，唯一的出路是放弃上述4个公理性条件的一部分。森证明了，只要上述4个条件稍作合理的修改，即不要求社会对所有备选方案有全面和逻辑的偏好，而只要求社会从有关方案中选择一个，答案还是可能的。因此，这为阿罗定理找到了一条有希望的出路。

在这些贡献中，尤其应提及森在1970年提出的“帕累托自由定理”，该定理说明了当帕累托条件与自由选择条件应用于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时，将会出现矛盾。森的结论是：如果帕累托最优移动不能够通过一种自愿的、全体一致的权利交换协议来实现，那么在短期内要么帕累托一致性条件被违背，要么是自由选择条件将被迫放弃。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帕累托一致性条件应该让路，那些“好管闲事”的个人的偏好次序不应该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森还对以伯格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正统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不懈的批评。正统的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福利反看作个人福利的函数，也就是说，

社会福利依赖于、且只依赖于个人福利，森对此提出了批评，并认为除了个人福利，社会还需要考虑到诸如不允许虐待、剥削等道德规则。这些道德规则之所以必须遵从，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个人福利。

其次，森认为基数效用以及效用的个人之间的可比性对社会选择有很大帮助。森的“帕累托自由定理”就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了解决社会选择的两难困境，进行个人之间效用比较的必要性。而萨缪尔森一直坚持认为不需要在福利经济中采用基数效用，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只是个人的序数效用的函数。

森最为重要的批评是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太缺乏“信息基础”(informational base)，难以对社会福利作出令人信服的测定；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除了关注个人的显示性偏好外，还必须接受现实世界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人的基本的潜在能力的分布和需要的满足。

## 二

除了对正统的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重建，森还独辟蹊径，提出了“能力理论”(theory of capability)，其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个人能力的评价上，此处“能力”(capabilities)与“功用”(functionings)是森的能力理论的重要概念。“能力”的含义是个人实现有价值“功用”或获得生存状态的机会；而“功用”是生活(living)的一个方面，或者说生活可以看成由一个相关的“功用”集合组成。拥有充足的食物、长寿，感到幸福都是“功用”的实例。从而，功用的概念可以与“商品”的概念区分开来，也与“效用”的概念有区别。在古典效用理论中，效用是幸福的尺度。森认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可以理解为一个功用矢量，在选择何种生活方式时，他可以在这些矢量中作出抉择。任何人可行的矢量集也就是此人的能力集。我们可以看出，森有意识地回避效用概念，引入功用的概念作为衡量幸福、快乐的标

准。森明确指出，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福利时，我们须着重关注他的功用、能力或者两者都值得重视，这是因为功用、能力这些概念为规范经济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基础，能对社会福利作出较为满意的测度。

森正是利用他的“能力理论”的分析方法，对贫穷和不平等的测定问题作出了出色的分析。过去，人类的贫穷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们严重忽略，他们只关注一些粗略的指标，如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而森认为这种分析角度过于狭窄，因为森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人一贫如洗。我们必须注意事物的低层，而不仅是反映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况且，人均GNP与人民的生活福利之间缺乏相关性，例如森举例指出：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NP是1780美元，人均寿命为75岁，而美国的人均GNP是20910美元，人均寿命也才为76岁。所以森的视角关注于一些人类细小的基本活动（即功用），如拥有食品、房屋、健康等。森认为衡量人类贫困时应考虑收入分布和健康因素，他为此提出了被后来学者称之为“森贫困指数”（1976年）的公式。公式为：

$$S = HI + \frac{q}{q+1} (1 - I) G_p$$

其中  $q$  表示贫困人口数， $G_p$  为衡量穷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H$  为贫困人数与总人数比率， $I$  表示用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水平相比来表示的收入缺口比率。

森还概括了贫困指数的两个特征：（1）单调性，即任何一个穷人的收入减少应导致总的贫困水平上升；（2）传递性，即如果穷人发生净转移支出则会导致总贫困程度增强。森为此确定了衡量贫困的新的、更令人满意的指标，也为贫困研究作出了开创性工作。

森也用同样的微观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例如，他利用死亡率、发病率、允许住院率、体重、营养等数据得出了中国、印度和北部非洲等国家和地

区男女惊人不平等问题。在1998年第1期英国皇家《经济学杂志》上，森的论文提出用死亡率来衡量一国经济的成功与失败，同时认为死亡率也可以映射出社会不平等、性别和种族歧视问题。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森的不同寻常的研究方法。

### 三

森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对饥荒的经济机制的揭示。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曾不时遭受过饥荒的灾难性后果。最早有记录的饥荒是发生在古代埃及，时间在公元前4000年；最近的饥荒是1996—1998年在朝鲜发生的。长期以来，饥荒问题处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视线之外。森出生在贫穷的孟加拉湾，当他9岁时，家乡发生了饥荒，300万人死去，后来听人讲，当时粮食并不匮乏，他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在1977年的论文“饥饿与权利的交换”以及1981年的著作《贫困和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森对饥荒是由粮食短缺造成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饥荒不仅是由粮食短缺造成的，其背后还存在着其他的决定因素，突出的例子就是1943年发生在孟加拉的饥荒，当年粮食生产正常，甚至好于往年。森认为饥荒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些社会经济群体无法获得他们以前能够获得或有权利获得的食物，因此这些人的食品权利（food entitlements）减少了。

森对饥荒分析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即在一个社会中，由个人自由支配的，并受这个社会法律制约的所有资源中可以获取的商品束。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要素禀赋，这些禀赋包括工作能力、土地、资金、耐用品和金融资产等，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指生产、贸易、运输等经济活动）将其禀赋变换成食品，这一过程也称之为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s）。

森进一步用他的权利概念来分析饥荒，他将饥饿看作是一个人“权利的失效”



(entitlement failure), 意味着一个人权利集合中已没有足够的食品维持生存。而权利的失效是源于秉赋的丧失或改变, 例如工人失业、农民离乡都意味着秉赋的丧失或改变。如果民众大规模遭受权利失效, 饥荒就随之发生, 正如同发生在印度(1943年)、中国(1959—1961年)和埃塞俄比亚(1972—1974年)的大饥荒一样。

在他的《贫困和饥荒》一书中, 森仔细分析了孟加拉饥荒中食品权利减少乃至失效的主要原因: 加尔各答军方征粮, 导致食品价格突然上涨; 粮食流通渠道受阻; 由于战事人们无法正常从事生产等。森还发现饥荒期间, 只有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的人才死于饥饿, 地主和商人在饥荒期间反而发财, 与此同时, 农民、手工业者、理发师和洗衣工却成千上万地死去。

森还提出了如何防止饥荒和限制饥荒影响的途径, 他认为当饥荒发生时, 仅仅是发放救济食品, 迁徙饥民是不够的, 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购买力, 使得他们能买到食品; 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行动来恢复权利, 使灾民得到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这些行动包括政府应向灾民发放救济款、食品配给券, 以及迅速地有计划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

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 森的研究主线是资源如何分配的福利问题和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所以说森的福利经济学将大写的“人”这多年来被忽略的研究对象, 又重新站到了经济学家的面前, 并赋予经济学深刻的道德和伦理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他“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 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

尽管森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 但森不是一个坐而论道者, 他还长期

从事于实际问题研究。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写过人类发展报告, 当过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顾问。他还专门研究过印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我们应为森的获奖而高兴, 因他不仅给予了我们关于人类福祉、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全新的分析, 同时也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式的偏狭态度, 使得经济学重新找回了道德、伦理和哲学的根基。

#### 参考文献:

1. Sen, A. K.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North-Holland.
2. Sen, A. K. 1973,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Sen, A. K.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Sen, A. K. 1995, *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 AER, Mar.
5. Sen, A. K. 1985, *Social choice and justice: a review article*, JEL, Dec.
6. Sen, A. K. 1998, *Mortality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failure*, EJ, Jan.
7. Sugden, R. 1993, *Welfar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 review of inequality reexamined by Amartyan Sen*, JEL, Dec.
8. Ravallion, M. 1997, *Famines and Economics*, JEL, Dec.
9. 黄有光, 1991, 《福利经济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0. 伊特韦尔, J. 等, 1987,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邓翔, 四川大学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610064)

责任编辑: 韦前 谭湛明

# 欧元产生的国际背景

## 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翟云玉 林 桦

世人拭目以待的欧元将于 1999 年 1 月 1 日以不可逆转之势正式启动。众所周知，货币是一国经济实力与主权的象征，欧洲是民族主权国家的诞生地，若干欧洲货币如英镑、法郎、马克等都是重要的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然而，欧盟却决心发行欧元以取代各国货币。是什么力量推动它坚定地朝货币一体化这一终极目标迈进？欧元启动后又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一、欧元产生的多国一体化

二次大战后，欧洲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昔日的欧洲强国均被沦为“二等国”，政治地位急剧下降。欧洲国家为了维护主权与民族独立，摆脱苏、美的控制、威胁，保持自身的发展，均

意识到必须走联合统一的道路。1950 年 5 月 9 日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发表了历史性的“舒曼宣言”，提出了欧洲国家煤、钢资源的共同规划，并确立了创立一个欧洲联邦的目标。它不仅得到联邦德国的响应，还激起了意、比、荷、卢四国的兴趣。于是随着《巴黎条约》的签订（1951 年 4 月 18 日），欧洲煤钢联盟正式建立，它奠定了欧洲国家进行平等合作的基础。此后，欧洲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欧洲经济共同体（1958 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 年）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60 年）相继诞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欧共体步入了经济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拥有雄厚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此背景下，1969 年 12 月，欧共体在海牙的一个高层次首脑会议上决定把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欧共体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揭开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序幕。

1. 欧洲计帐单位的创立标志着共同货币的萌芽

70 年代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创立了欧洲计帐单位 EUA。EUA 由共同体 9 国的货币构成，是一种“篮子货币”。在这个篮子内，9 国的货币据各自的 GNP 和贸易在共同体 GNP 和内部贸易中占的比例而占相应的份额。EUA 成为了欧共体用来记帐、计价、承担共同费用、统计和结算的尺度，实质上是共同货币的萌芽。

2.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为欧元的产生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1977 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欧共体各国的汇率受到猛烈冲击。年底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詹金斯重新提起并敦促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目标，得到成员国的支持。1979 年 3 月 13 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共同体 9 国政府首脑第十三次理事会上，正式宣布“欧洲货币体系”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是：（1）创设欧洲货币单位“埃居”；（2）实行汇率双重管理机制，确定以欧洲货币单位为中心的货币平价体系；（3）建立欧洲货币基金，干预汇率和向成员国提供相应的贷款，以稳定市场、渡过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困难。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了共同体成员国的货币合作，促进了各国逐步用联合控制取代单独控制，稳定了成员国的汇率，对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标志着欧共体货币

一体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3、金融差距的拉大加速了欧元的形成

进入9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欧共体虽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之一,以GNP衡量的总体经济实力也超过了美国、日本,占世界总产出的30%以上(美、日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7%和18%),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5。在国际投资方面,欧共体也不在美国之下。但是,美元在国际金融业务中的综合份额达40%,大大高于欧共体各成员国的占有率,从而在金融领域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基于此,欧共体各成员国觉得有必要加速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于是,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会上签署了《关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参考了德洛尔计划,为欧洲货币联盟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和趋同标准,正式确定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将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即成为一个新名词和代表着一种即将横空出世的新货币。

## 二、欧元的启动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三大影响

欧元的发行无疑将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必将中欧经济合作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与欧盟国家经贸关系密切,据中国海关统计,1996年中国与欧盟15国的双方贸易总额达39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7%,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43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继美、日、瑞士后,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同时欧盟也成为仅次于日本、香港、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故此,本文认为欧元启动后将在贸易、投资、金融与外汇储备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1. 贸易方面:欧元将扩大中国商品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减少流通费用,欧盟对华出口也将增加。

由于欧元在欧洲共同市场内部取消了货币壁垒,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大市场,所有的商品以欧元标价使中国的产品可以先出口到某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再分销到欧盟各国,避免原先在不同的国家要针对不同的贸易制度制定不同的定价政策,费时耗力地开发营销渠道。原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中国产品就等同于出口到整个欧元区。质优价廉有竞争力的中国商品将随着欧

盟的发展和欧元区的扩大而不断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这也要求中国的出口商品改变原先在欧盟各国散兵作战的局面,联手在欧盟的重要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起高效运作的分销渠道,使中国的产品能够更顺利地进入欧盟市场。但是,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由于欧元的发行,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更加一体化,生产结构更专业化,经济协作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内部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互相调剂余缺,重新调配资源配置和分工,这势必使我国出口企业丧失部分竞争优势,如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遭到南欧国家更大的竞争。另外还将导致欧盟对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和排外性的上升,使中国产品更难打入欧盟市场。例如,欧盟规定自1998年起,所有出口到欧盟国家的货物都必须采用EDI报关,中国的出口商必须对上述情况密切关注并作好相应准备。

由于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欧盟对华的出口将会增加,但这要取决于汇率因素、中国的进口需求及进口管制。如果欧元走强,可能会抑制中国进口欧盟的产品。

2. 投资方面:欧元在中国吸引外资中的比重将有所提高,并为中国银行、企业的对外直接融资提供新的机会。

直接投资方面:由于中欧经济技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较大的互补性,合作前景广阔。近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各国利用外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巨大的中国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外国公司包括欧洲企业都希望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中国已成为它们全球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认为拓展亚洲须立足中国,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作亚洲战略的重要一环,并于1995年7月发表了“欧中关系长期政策”。基于这一战略,欧元的诞生及其稳定将有利于欧洲企业制定长期投资计划,开拓中国市场。与日本等其他国家企业相比,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已经显得相对落后。目前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9%,且直接投资流量的5%来自利润再投资。如果再不把握机会,它们将面临着被排斥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危险。此外,目前中国吸引外资的行业重点正转向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工业项目及高科技项目和农业项目,区域重点正转向中西部地区。这些都需

要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作长期的投资。启动后的欧元如能顺利运行，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欧洲跨国公司将能借助低利率低风险的欧元资本投资中国市场，它们比起擅长在沿海地区搞“短、平、快”投资项目的港、台和东南亚外商能更好地适应中国投资重点的转移。故此，欧元将在中国吸引外资中占重要的比重。

间接投资方面：欧元启动后，以欧元为面值的债券市场将占世界债券市场的20%~30%。就短期而言，如果欧元在启动后一段时间趋软，对美元呈相对弱势的话，那么，欧元货币市场将对我国短期债券发行者（如银行、金融机构和大企业集团）具有双重吸引力：一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致力于价格稳定和维持低利率，使货币市场上欧元的利率将呈趋同、稳定、走低的态势，金融交易成本降低。此外，规模巨大的市场内将拥有更多的流动资金，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出现更多的资本形态，市场容量将大大增加，使得债券发行价格维持低水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欧元对美元呈相对弱势使债券发行者不会因货币升值而增加偿债负担。从中长期来看，欧元的稳定和欧洲资本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将会为我国股票或中长期债券发行者带来新的低成本、低汇率风险的筹资渠道。

### 3. 对中国金融与外汇储备方面的影响。

第一，欧元将有利于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虽然主要是根据外汇市场行情而定，但由于外汇市场交易的主要是美元，央行又主要是参照美元占极大比重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在市场上进行干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成了变相盯住美元的汇率。欧元启动后，由于欧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的稳定币值、保持低通胀的货币政策，欧元的币值从长期来看将是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将可以充分考虑欧元汇率的变化及欧元的供求状况，改变目前主要盯住美元的状况，使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更趋合理、灵活。

第二，欧元将对我国现有的以欧盟国家货币记值的金融资产和债务的价值计算与管理带来潜在的风险。目前，在我国各类政府机构及金融机构的对外投资或债务（包括借款、债务发行及其他形式的债务）中，有一部分是以欧盟国家货币记值的，其中有些还可能跨越2002年。欧元发行

后，这部分资产或债务将被转换成欧元，这种转换有可能引起价值的损失。如原记值货币相对于欧元疲软或被低估，那么持有这种货币记值的资产，就可能有价值损失的风险；如原记值货币相对于欧元坚挺或被高估，则对持有这种货币的债务者就有价值损失的风险，因他要用更多的本币或其他货币来偿还债务。因此，持有这类资产和债务的机构，应密切关注原货币的汇率走向和预测欧元启动后该货币与欧元不可逆汇率的定值水平，要及早采取措施，与债权人债务人协商，妥善地解决货币转换问题，尽可能地减少因转换成欧元而引起的损失。

第三，欧元将促使我国调整外汇储备结构。199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1997年则达1399亿美元。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日元，欧洲货币仅占19%。近几年的历史证明美元和日元的汇率都不很稳定，有时波动幅度很大，对我国外汇管理带来很大的风险。欧元发行后，形成的新国际货币格局将改变目前美元独占鳌头的状况，美元与欧元两极抗衡的局面有可能形成。据汇丰控股集团的估计，未来美元、欧元、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将是40:40:20。由于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欧洲企业对华投资也将逐渐增多，无论是作为贸易结算货币还是计价或投资货币，使用欧元将不可避免。因此，我国外汇储备需要作出调整，增加欧元的份额，并通过有效的测算手段，对我国今后在国际收支（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中对欧元的实际需求作出较准确的估算；加强对美元、欧元走势研究，适时合理地调整我国的外汇储备，改善外汇储备的管理，减少我国外汇储备因汇率变动引起的意外损失。从中、长期来看，稳定的欧元将可能成为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的新选择。欧洲债券市场也将为我国储备外汇投资提供新机会并带来良好的收益。

综上所述，欧元的启动尽管为中欧经济合作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它使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远远大于不利的因素，中欧经济贸易关系将由此得到更大的发展。

作者翟云玉、林桦，暨南大学副教授（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欧盟单一货币与合同的连续性问题

□黄 瑶

1998年5月2日,欧洲联盟15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首脑会议,正式批准了5月1日欧盟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提交的有关首批实施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计划的11个成员国的建议名单,①并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及其领导成员的人选作出了一致的政治决定。欧洲中央银行也于1998年6月30日正式成立。至此,人们似乎已确信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将能够于1999年1月1日如期启动欧元,顺利实施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简称经货联盟)。欧元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事,它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论述于经货联盟的过渡期内有关欧元的启用、合同的连续性问题及其有关立法。

## 一、欧元的启用

在欧洲推行单一货币是实施《欧洲经货联盟条约》第三阶段的一项重要目标。1991年12月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城举行的欧共体12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该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马约》规定,经货联盟分三个阶段实施,②其第三阶段自1997年1月1日开始,其目标为建立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和最迟于1999年1月1日推出单一货币,流通于欧共体国家。至此,经货联盟正式形成。《马约》还规定了各国为实施单一货币而在利率、通胀、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和货币稳定等方面必须达到的5项经济趋同标准。

1995年2月马德里欧洲理事会为欧洲

未来的单一货币取名为“欧元”(Euro)。“欧元”启用时间为1999年1月1日。而所谓的“过渡期”,指的是始于1999年1月1日而终于2001年12月31日这一段时间。③

在讨论欧元的法律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来谈谈欧元的前身即目前的“欧洲货币单位”(ECU,又称“埃居”)。欧洲货币单位是1979年7月建立起来的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它取代了1975年设立的欧洲记帐单位(EUA),类似于特别提款权(SDR)。它由欧共体成员国的12种货币定值,是一个货币篮子。每种货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比重是由各国在欧共体内部贸易总额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加权平均计算的。以此方式计算出来的ECU具有价值比较稳定的特点。但ECU还是一种完全的货币,因其没有纸币流通,也没有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故有人称它为“准货币”(quasi-currency)。尽管如此,ECU却发挥了国际货币的某些职能:作为欧洲共同体④成员国通货的定值标准,欧共体财政预算及成员国之间的结算工具,作为国际储备手段(据统计,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ECU已成为世界上排在美元和德国马克之后的第三位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ECU的用途不断扩大,它被用作债券、大面额存单以及票据的计算单位,它还是欧洲债券市场的重要货币。

将要取代ECU的欧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根据《马约》的规定,欧元将由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发行,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将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分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将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负



责制定和实施。有关欧元的纸币和硬币的流通情况，欧盟理事会作出了如下规定：

1、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应发行以欧元为单位的纸币，这些纸币在所有这些成员国境内应是唯一具有合法货币地位的纸币。⑤

2、欧元参加国应发行以欧元或分为单位的且符合理事会根据《马约》第 105a (2) 条第二句的规定所制定的名称与技术规格之硬币。这些硬币在所有这些成员国境内应是唯一具有合法货币地位的硬币。⑥

在此需补充说明的是，根据 1997 年欧共体《关于启用欧元的理事会条例草案》第 6 (1) 条，依确定的兑换率，欧元也将被分成各成员国货币单位；依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欧元参加国的货币法将继续适用。而以参照该条例规定的一国货币单位命名的纸币和硬币在这些国家领土境内将仍然是合法货币，直到不超过过渡期届满后的 6 个月。该时期可由国内法予以缩短。⑦

3、欧元参加国应规定充分的制裁措施来保护欧元纸币和硬币免受伪造和仿造。⑧

由以上规定可见，欧元参加国通过欧盟的立法形式（如条约、规章等），将本国的货币主权转移到欧洲中央银行，使欧元成为了第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区域性货币，此乃一创举。

根据欧共体条约第 109L (4) 条，在过渡期开始之时，欧元将成为一种“依仗它本身权利的货币”（currency in its own right），欧元参加国的货币与欧元之间的兑换率将不可变更地固定下来，并且欧元将以此不可变更的固定兑换率取代这些国家的货币。欧元将以 1: 1 之比率取代 ECU。欧元将成为欧元参加国的共同货币，欧元参加国的货币将作为欧元的辅助货币而仍继续流通至 2002 年 6 月 30 日。2002 年 7 月 1 日起，欧元将成为欧元区内的唯一法定货币，各欧元参加国的货币将被欧元纸币和硬币完全取代而退出流通。

过渡期开始后，在采用欧元问题上，可归结为公与私两个方面的情况。在公方面，银行、资本市场和税收等部门的货币

标定将用欧元。银行间的支付划拨均以欧元进行，如涉及原各国货币的交易，银行可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将欧元折算成原币贷记受益人帐户。欧元区各资本市场的结算和计值都将使用欧元。各参加国的所有上市股票和非上市股票均须折算成欧元计值，其流通债务也将转换成欧元，而新发行的债券都将使用欧元。此外，欧元将取代 ECU 而成为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参加国中央银行的记帐单位。在私人或民间领域，欧元实行“非强制性和非禁止性”原则，即对个人和企业来说，在三年过渡期内，欧元的使用既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被禁止的。任何人无权强制使用欧元，任何合同、贸易和买卖可使用欧元，也可使用原所在国货币。

## 二、合同的连续性问题

如上所述，由于欧元在过渡期的启用，欧元与欧元参加国货币同时流通，欧洲货币单位将消失，参加国货币也将逐渐被欧元取代而退出流通，再加上过渡期内利率可能上升或下降，现有合同尤其是那些以参加国货币或 ECU 表示的长期合同和租赁、抵押、人寿保险、债权债务关系及债券等所有种类合同，它们是否需重新谈判订立抑或归于终止？这些合同的当事人能否以国内法有关债之规定为由来单方修改合同的条款？这便是过渡期合同的连续性问题。合同的连续性内涵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货币名称的变更即有关国家货币或 ECU 向欧元的转换而引起的主债务的连续性；二是有关合同的条款尤其是利率条款的连续性。本部分将从法理角度讨论该问题。

在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人们首先强调的，是一项世界各国公认的原则——“合同必须遵守”。该原则源自古代罗马法的概念“约定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意即契约和诺言必须得到遵守。根据“合同必须遵守”原则，合同一旦有效缔结，则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善

意履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所享受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得变更或解除。据此，尽管欧元的实施引起合同货币名称的改变，合同的主债务应予以继续履行而不能进行单方面的修改，而且合同的所有条款仍应保持不变。在合同条款的连续性上，另有学者以“唯名论”原则（principle of nominalism 或 nominalistic principle 名义原则）加以论证。<sup>⑨</sup>该观点认为，唯名论原则是一项几乎得到世界范围内普遍承认的原则。根据该原则，一项以一国货币表示的债务，不管依该国法律在支付发生时的合法货币是什么，均应按合同订定的名义数额进行支付。所以，如果该国货币发生改变，重要的是确认清楚该旧币与新币之间的经常性联系（recurrent link）。因此，合同的所有条款，包括既已约定的利率，均不得因欧元的实施而发生变更。

当然，合同的遵守不是绝对的，尚有例外存在，如情事变迁或合同落空等则可成为例外的理由。那么，上述原则能否适用于在过渡期内出现的货币变化情形下的合同关系中呢？答案应是否定的。

情事变迁是一个古老的原则，其原义是“情事不变”（rebus sic stantibus），指签订合同时存在一个假设，即以当事人签约时所能预见的情况不变为合同有效的前提，一旦情事发生变化，当事人便有权变更合同内容或者终止合同。根据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中的共同规定，只有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当事人方可援引该原则作为变更或终止合同的理由：（1）已发生的影响合同之经济情事的变更必须是根本性的；（2）发生变更的情事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所未能预见到的。关于第一个条件，在建立经货联盟过程中，已经和将要出现的经济情事的变更，可以说并不属于根本性的。具体而言，首先，欧共体条约第 109J（1）条所规定的几项经济趋同标准，只有达到这些标准的欧盟成员国才有资格参加单一货币，而这些标准提供了足够的确定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和利率方面。根据条约第

109K（2）条，这些标准也适用于不参加经货联盟的成员国，而不论他们何时加入单一货币。而且还有依欧共体条约第 103 条设立的多边监督程序，致力于减少所有成员国经济之间的偏离。其次，进入过渡期可能发生的任何利率涨落，应看作是完全正常的事件，因为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可能基于何种原因都会发生。再次，过渡期并不涉及任何货币的消失，而是由一种新的共同货币以有秩序的方式来取代参加国的货币。过渡期开始之时，参加国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即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决策权移交到欧洲央行。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即以往的国家货币单位的最后逐步退出与取而代之的以欧元为单位的货币的出现，这在经济上同纸钞和硬币上的设计图案之简单变化并无二致。<sup>⑩</sup>至于情事变更原则所要求的第二个条件——不可预见性，就经货联盟之建立而言，应该说是早已预见之中的事情。早在 1969 年 12 月，欧共体在海牙举行首脑会议，首次作出建立经货联盟的决定。1991 年《马约》的缔结及其于 1993 年的生效，经货联盟之建立已大势所趋，合同当事人若说不能预见此事之发生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总之，就经货联盟的建立而言，构成情事变更原则的两个必备条件中没有一个是得到满足，故合同当事人不能援引该原则以主张合同的变更或终止。

情事变更一词通常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英美法上解决情事变更问题的法律原则称为“合同落空”<sup>⑪</sup>（frustration of contract，又译“合同的不可能履行”）。根据该原则，如果某一意外事件的发生毁坏了合同规定的重要义务之性质或者致使该合同的根本履行更加昂贵，那么该合同自动终止。<sup>⑫</sup>基于同上述相似的分析，由于经货联盟的建立并未改变合同双方所承担的义务之性质，换言之，合同义务并无发生重大改变而致使与原来双方所承担的义务完全不同，故不能适用合同落空原则。

当然，一般情况下，合同自由原则应优先，因合同的精髓在于当事人自由意志

之汇合。根据该原则，一切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都必须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据此，合同当事人无疑具有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在合同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如下行事：在过渡期之前签订的、合同所涉货币金额以成员国的货币单位表示之合同，在过渡期开始后可以更改；以 ECU 为货币单位的合同，在进入过渡期后当事人仍可继续使用，或者改为使用别的篮子货币，如果他们也不想使用欧元的话；合同的条款，包括既定利率，可以进行修改。另有学者提出，合同当事人的意志，应高于要求一致性的公共秩序原则。<sup>⑬</sup>简而言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能够对非连续性的解决方法作出商定。

### 三、有关合同连续性的立法

为消除人们，尤其是金融市场和企业界关于欧元实施对合同连续性的影响问题的疑虑，澄清经货联盟过渡期开始后可能产生的一些不确定性，有必要制定相关立法予以确认。与欧元实施有关的债权债务关系，要么由欧共同体成员国的法律调整，要么受第三国即非欧共同体成员国的法律约束，抑或兼受上述两种法律的支配。在欧共同体成员国法律方面，成员国为建立欧盟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如《欧共同体条约》、《马约》等，均构成成员国法律的一部分；此外，欧共同体内部立法形式之一的规章（regulation），在成员国中普遍适用，对所有的成员国来说，其每一个部分都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且规章一经公布，立刻具有法律效力，不需成员国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国内法与规章冲突者无效。<sup>⑭</sup>鉴于此，本文以欧共同体立法来取代个别成员国立法予以阐述。欧共同体与第三国关于过渡期内合同连续性问题的立法，分述如下：

#### 1. 欧共体的立法<sup>⑮</sup>

为消除人们对过渡时期合同连续性问题的疑虑，1995 年 12 月的欧盟首脑马德里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引进立法以确保金融合同的利率和其它条款不受有关

国家货币和 ECU 转换为欧元的影响。该声明指出：“对于固定利率的证券和贷款来说，欧元取代国内货币本身将不改变债务人应付的名义利率，除非合同另有规定。”<sup>⑯</sup>该声明也清楚地确认了合同的连续性：“欧元取代国内货币本身不应该改变合同的连续性，除非合同另有规定。”<sup>⑰</sup>而在此之前，1995 年 5 月，欧洲委员会在其关于采用单一货币的实际安排的一份绿皮书中，就已明示确认了合同的连续性，其声明道：“经货联盟的运行，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都将不构成一种根本性的破坏。所以，由于增加货币稳定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在价格上的变化不引起连续性问题。此结论有几个理由支持。与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有关的利率方面的变化在许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并构成了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正常的不确定性。参加欧洲货币联盟，以经济措词来说，可被视为是一项可预见到的长期承付款项。有关长期利率的趋同标准确保了各参加国的利率在欧洲货币联盟开始时期，将紧密地一起运行。”<sup>⑱</sup>可见，委员会希望，利率的先前趋同应能确保单一货币的转换是连续的和平稳的。同时，此段正式声明也对能否适用情事变迁原则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依据欧共同体条约第 235 条，欧盟理事会在 1997 年 6 月 17 日的《关于采用欧元的某些规定的理事会规章》中，重申并从法律上确定了过渡期合同连续性的原则：<sup>⑲</sup>（1）欧元的采用不影响合同和其它法律文件<sup>⑳</sup>的连续性，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2）合同自由原则必须得到尊重。（3）连续性原则应该与合同当事人对欧元的采用所做的任何约定一致。（4）合同与其它法律文件的连续性原则将适用于以往的国家货币和欧元之间以及 ECU 和欧元之间。（5）对于固定利率的证券来说，欧元的采用不改变债务人应支的名义利率。（6）欧元的采用构成对每个欧元参加国货币法之更改；对一国货币法的承认是一项公认的原则；对连续性原则的明示确认应该导致对在第三国管辖区内的

合同和其它法律文件连续性的承认。此外，该《规章》第3条最后一句的规定，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具体体现。该条指出：“欧元的采用不应该对修改任何法律文件的条款或解除法律文件产生作用，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任何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欧元的采用也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当事人获得单方面修改或终止某个法律文件的权利。本规定从属于双方当事人所做的任何约定。”<sup>②1</sup>

## 2. 第三国的立法

欧共体的立法只对欧共体成员国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约束第三国。然而，世界上有相当部分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可能由第三国货币转换成欧元。例如，据报道，有多达1万亿美元的证券可能由美元变成欧元。<sup>②2</sup>此外，有些债务依合同规定应受第三国法律调整。因而，有关第三国似有必要对那些将因跨越欧元过渡期而须转换成欧元的本国债务作出有关的立法规定。在此列举一个较为典型的第三国——美国的立法。

作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纽约，于1997年7月率先通过了一个有关欧盟单一货币和合同的连续性并修改一般债法的法案。<sup>②3</sup>根据该法，纽约州的一般债法第5条被新增加的一个有关合同连续性的“标题16”所修改。该法的第5—1602节对合同的连续性作了详细的规定：1. 如果一个合同或证券的支付手段或对象是一种已被欧元取代的货币或者ECU，欧元将是一种商业上合理的代替物 and 实际等价物，该代替物和等价物可被用来确定那种货币或ECU的价值，或者，可按已规定的兑换率进行清偿，以及根据欧盟理事会通过的规章另外进行计算。债务的履行可用该合同或证券原先指定的那种或那些货币来进行（只要那种或那些货币仍是合法货币）；或者用欧元来履行债务，但不能用任何其它货币来履行债务，无论这其它货币是否已被欧元所取代，抑或它被认为是欧元的一种货币单位并同欧元有固定兑换率。2. 以下四种情况中没

有任何一种将对解除合同产生作用，也不能以它们中的任一者为理由拒绝履行合同或证券规定的义务，以下任一情况也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当事人获得单方面修改或终止任何合同或证券的权利：（1）欧元的采用；（2）依前述偿付与债务有关的欧元；（3）依前述确定债务的价值；（4）根据一个已被取代的利率或被认为是商业上合理的代替物和实际等价物的其它基础，计算或确定合同或证券的支付手段或对象。接着，该法第5—1603节对当事人协议的效果作出了规定，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图的原则。“本标题下的各项规定不应修改或损害、而是应服从于双方当事人对欧元的采用所做出的任何协议。”由此可见，纽约州法律对过渡期合同连续性的规定，与欧共体法律的有关规定大体相同。

紧接着纽约州的上述立法，美国伊利诺斯州也颁布了一项“欧元兑换法”。<sup>②4</sup>该法的第10节、第15节和第20节以同前述纽约法的第5—1602节和第5—1603节大致相同的措词，对合同的连续性问题作了相似的规定，在此就不重复。

## 四、结束语

1999年1月1日即将诞生的欧元，将成为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的统一货币。欧元是个具有独特法律地位的货币，它不同于历史上出现过的依仗武力或强权推行使用的跨国货币，它是依靠国际条约形式强制规定使用的一种通货。欧元也有别于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就其性质而言，欧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它有欧盟这个特殊的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盾。而最具特色的，是欧元将成为第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区域性货币，欧盟成员国竟然将本国的货币主权让渡出来，上交于欧洲中央银行。这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人们对它的关注恐怕会随着过渡期的开始而继续下去。

欧元的启用并不对跨越过渡期的合同之连续性产生影响，人们不能以欧元的采

用为借口来解除或拒不履行合同既定的义务，欧元的采用也不应使任何当事人获得单方修改或终止合同的权利。但是，有一例外：合同自由原则优先，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当事人可以另外制定非连续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有关合同连续性的原则，不仅有其法理根据，而且亦已得到欧共同体立法和一些第三国法律的确认。

①愿意和能够实施欧元的欧盟成员国，必须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趋同标准。首批符合该标准的有11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葡萄牙、奥地利、芬兰和爱尔兰。将留在欧元之外的4个欧盟国家是：英国、丹麦和瑞典（由于政治原因暂不进入欧元区）、希腊（由于经济原因而暂时落选）。

②经货联盟的前两个阶段为：第一阶段始于1990年7月1日，各成员国协调经济政策，使本国货币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第二阶段始于1994年1月1日，设立欧洲货币机构，监管货币统一进程。

③见 Draft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Part 1, Article 1, published in OJ, 1997, No C 236/10, 该规章草案已于1997年7月7日由欧洲理事会在题为《关于启用欧元的法律框架之欧洲理事会的决议》中予以通过，见 OJ, 1997, No C 236/7。

④欧洲共同体是欧洲联盟的前身。欧盟随着《马约》于1993年生效而成立，这标志着欧共同体从经济实体向着经济政治实体的过渡。根据《马约》规定，欧共同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依然存在。《马约》生效以来，欧共同体未就其称谓的变更作出决定，故现在“欧共同体”和“欧盟”两种称谓皆可使用。

⑤同注③引文，Part IV, Article 10, in JO, 1997, No C 236/12。

⑥⑦⑧同注⑤引文，第11条，第15条，第12条。

⑨See U. Wolker, The Continuity of Contracts in the Transition to the Third Stag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33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1996), P. 1122, P. 1129.

⑩同注⑨引文，第1124页。

⑪但合同落空所适用的范围比大陆法系的情事变更更广泛。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97页，注②。

⑫D. Dunnett, Some Legal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the Transition to the Single Currency, 33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1996), P. 1140, Note 17.

⑬同注⑫引文，第1143、1156页。

⑭参见[英]弗兰西斯·斯奈德著，宋英编译：《欧洲联盟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43页；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45页。

⑮欧共体的立法发表在《欧洲共同体公报》(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J)的L系列上。见上引书《欧洲联盟法概论》，第6页。

⑯ Presidency Conclusions, Part B, annex I, point 10.

⑰ Presidency Conclusions, Part A, I, A. I. 6.

⑱ Com (95) 333 final, of 31. 5. 1995, point 130.

⑲ OJ, 1997, No L 162/2.

⑳根据该《理事会规章》第1条，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s)意指立法和法律规定、行政行为、司法判决、合同、单方法律行为、除了钞票和硬币以外的支付工具，以及其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同⑲。

㉑ OJ, 1997, No L 162/3.

㉒参见《应为国际货币体系变更做好准备》，载《参考消息》1998年5月25日，第4版。

㉓ New York Law: Chapter 311, S. 5049 - A (July 29, 1997).

㉔ Illinois Law: Euro Conversion Act of July 30, 1997.

作者黄瑶，中山大学法律系讲师(510275)

责任编辑：罗 苹



# 知识经济中知识的价值构成与价值转化

□ 郭 强

科学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是我们确切把握知识经济内涵的一把钥匙。可以说知识经济的提出与形成正是基于在经济活动中知识巨大价值的转化和知识伟大作用的发挥。因此科学考察知识经济中知识的价值构成与价值转化对正确理解知识经济, 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是有意义的。

## 一、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价值

1986年我国学者项浙学、王光铸、李宝泰在其《论知识劳动的价值观》一文中较早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段纪宪于1984年提出)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 知识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体。”该文指出: “所谓知识经济, 是指主要依靠知识去生产物质消耗很低质量又很高的产品, 并依靠知识实现高效率的管理。”<sup>①</sup>10年之后(1996年10月8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sup>②</sup>并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如何理解知识经济, 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认为, 知识经济包括两部分内容: 其一是知识产业经济或称“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其二是知识产业经济以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OECD所提出的“知识经济”实际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简称, 是知识经济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评价关键取决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或贡献率。而知识对经济发展(增长)的贡献率关键取决

于知识中所蕴含价值的大小和知识价值的转化程度或实现度。黄锦奎先生认为, 知识经济中讲的“知识”, 就是把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价值高的物质的“窍门”, 实质上就是价值转化工程。这里“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价值高的物质”, 除了包含有“改造”所花费劳动创造(转移)的价值外, 还包括知识本身的价值, 这些价值转化至新的产品中去就使新的产品具有较高的价值。但是知识价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

的呢?

## 二、知识经济中知识的价值构成

J. Curry认为知识就是价值, 价值就是知识, 这种说法并没有解决知识价值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知识价值不仅仅是知识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 因为知识的经济价值不是知识内在的价值实体, 而仅是知识使用价值表现的一种形式。知识价值也不仅仅是知识的学术价值, 因为知识的学术价值仅仅是知识在某个领域中的使用性、创造性和耗费智能多少的表现, 它只能作为衡量知识中所包含的创造性劳动价值高低的一个尺度。知识价值只能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人的劳动。劳动是衡量知识价值的自然量度。在知识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有不同的形式, 因而知识价值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1、知识价值构成的静态考察

根据知识价值在知识运动中所表现的形式, 可以把知识价值分为知识的静态价值与动态价值。知识的静态价值包括知识被生产出来尚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时的价值

构成表现。目前理论界所描述的知识价值构成多从静态构成出发，认为知识价值是“知识产品中所包含的物化劳动价值”和“知识产品中包含的活劳动价值。”<sup>③</sup>也有人认为知识价值构成有三：一是前人和他人积累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二是创新者的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三是所耗费的物质材料（如科研设施、材料）即物化劳动所转移的价值。还有人认为知识价值由“活载体知识的价值”、“硬载体知识的价值”和“软载体知识的价值”等三部分价值构成。<sup>④</sup>

我认为从静态上考察，知识的价值由主体价值、载体价值和转移价值等三大部分构成。知识生产者的活劳动是知识价值的决定者。我把知识生产过程直接投入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称为知识价值中的主体价值。这部分价值在知识价值结构中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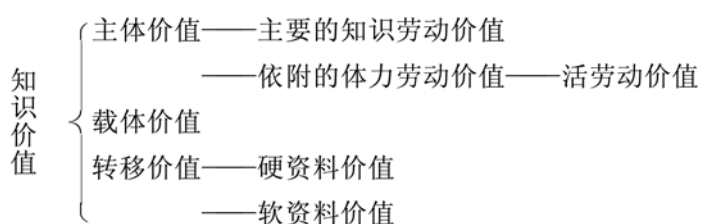


图1 知识价值的静态构成

有突出的位置，离开这部分价值，其他部分的价值则无所依存。知识的主体价值制约和影响其他方面的价值。作为知识主体价值创造者的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劳动又分为两个方面即主体的知识（脑力）劳动和依附的体力劳动。由于这两种劳动在知识价值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产生出来的价值量也就不同。一般说来，以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知识劳动）在形成知识价值方面起主导作用，但一定的体力劳动也是决定知识价值的劳动，因为知识生产活动并非不需要体力劳动。总之，知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它本身是由劳动创造的，离开劳动知识便不存在。知识之所以能提供经济增长高的贡献率就在于知识具有巨大的价值，而知识价值之所以是巨大的是因为它凝结了人类最高级的

复杂劳动。

在静态的知识价值结构中，主体价值、载体价值、转化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知识价值的形成与存在以及知识价值量的大小决不取决于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各种资料的价值，更不取决于载体具有的价值，而在于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活劳动（或知识劳动或科学劳动）。因此，活劳动是衡量知识价值的自然量度，是知识形成交换价值的内在依据。在此方面不少学者陷入了唯心主义，比如日本学者界握太一就认为知识价值是“通过社会上具有一定范围的人的主观意识即社会的主观意识产生的”，因而知识价值便是“由社会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流动性较大的价值”。<sup>⑤</sup>载体价值是知识总体价值的重要构成要素，因为载体成为知识流通的承担者，只有通过它，知识总体价值才得以现实地表现出来。转化（移）价值一部分是物化劳动的价值，另一部分是知识生产所利用的原有知识、信息转化过来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与为获取知识所耗费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以及转化原有知识价值的劳动成正比例关系。

## 2、知识价值结构的动态分析

知识不遵守“不灭”定律，它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正是通过知识的运动（流通），其巨大价值才得以表现出来并逐步得到转化或实现。任何类型的知识，无论是否经过“滞期”都要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的阶段上进行不同规模的流通与转化。这是知识的一种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所以我们考察知识价值结构或构成，也要关注知识价值在运动中的表现与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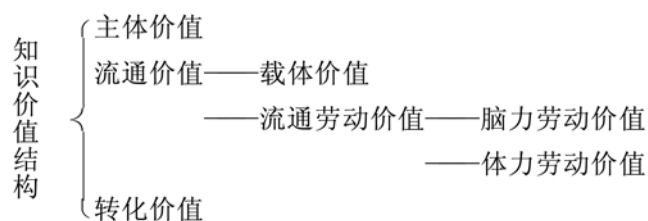


图2 动态知识价值结构

知识在流通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及其构

成，我们称之为动态的知识价值结构。流通中的知识价值较静态的知识价值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流通价值独立出来成为知识价值的重要构成要素。

考察动态的知识价值结构，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知识流通（动）的重大意义。在动态的知识价值结构中，知识的流通劳动价值是比较活跃的因素。如果知识价值结构中的主体价值、载体价值和转化（移）价值一定时，那么知识的流通劳动价值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知识总体价值量的大小。可见要减少知识价值总体构成中的劳动量，提高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效率，就必须疏通知识流通渠道，减少知识流通环节，这样才可以加速知识向应用领域的流通。

### 三、知识价值转化（实现）探析

知识产品的价值同物质产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实现和转化的。

#### 1、知识价值实现（转化）的特征

知识价值是在其交换过程中实现的。一般说来，物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在交换过程中让渡其使用价值而完成的。但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在实现其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失去对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物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次性的。知识产品价值实现尽管也是按照物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但二者又有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表现在知识价值实现的特征方面。

知识价值实现的特征是指知识价值实现的阶段性与持久性在知识价值运动中的统一。在知识的交换过程中，知识生产者虽然让买方获得其产品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是完全让渡其使用价值，因为知识生产者在使对方拥有其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自己仍然占有其产品的使用价值。知识的共享性使得允许他人使用知识并不影响自己对知识的使用。因此知识价值实现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久性的。一般说来，在一次交换中实现的价值并非知识价值的全部，知识价值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换中逐渐实现的。知识价值实现的持久性并不

意味着知识价值永远不会消失。相反由于知识交换次数的增多和知识陈旧速度的加快，知识价值是可以完全实现的。知识价值实现的持久性是物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次性相比较而得出的性质。知识价值实现还具有阶段性特征。我认为，知识价值的实现实际上是两种补偿的完成即知识生产的独立个体劳动价值补偿和公众社会劳动价值补偿。在知识价值实现过程中首先是个体劳动价值补偿的完成，它是通过向知识生产者支付工资、津贴、酬劳金、稿费、奖金等形式而进行的。这是知识价值实现的第一个阶段。当个体劳动价值实现完成之后，知识价值的实现就开始了社会劳动价值的补偿即国家政府及社会为知识生产者提供的教育费用、生产设施、生产费用、社会资料、公共知识等进行的补偿。持久性和阶段性是知识价值实现的基本特征。

#### 2、知识使用价值转移（化）的特征

知识的使用是指知识满足人们及其需要的属性。知识价值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使用价值的合理“转移（化）”过程。首先，知识使用价值转移是多次性的且知识使用价值转移（化）的次数或交换次数的多少往往不取决于知识价值量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知识的陈旧速度和使用价值转移（化）区域范围的大小。相反，物态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让渡是一次性的。其次，物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在消费中逐渐消失，其价值也随之消亡或转移（化）到新产品中去，但转移（化）的价值绝不会超出其自身的价值。但是知识产品在使用（消费）过程中，不仅可以把自身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新品中去，而且知识价值和使用价值转移的过程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劳动过程，即通过复杂高级的知识劳动才可把知识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由于知识价值转化是个劳动过程（也是知识同其他经济因素结合的过程），故知识价值转化可以产生新的价值，这时所转化的价值要超过知识自身的价值。

知识产品使用价值转移（化）的多次

性是由于知识占有与使用的矛盾关系及知识本质特征所规定的。知识生产者对其产品同时具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在使用自己所生产的知识之同时，又可以多次地放射性地转移其使用价值给众多的对象。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这种使用权又可以被对方所占有，这样对方就可以像知识生产者一样转移该知识的使用价值。知识使用价值转移的次数同知识陈旧的速度呈负相关关系，知识陈旧的速度越快，知识使用价值转移的次数也就越少。

### 3、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价值转化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生产、流通与传播、应用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生产是知识经济基础的基础。因此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大力发展和推进知识经济，必须生产出支撑知识经济发展的大量优质知识。而要进行高效率的知识生产，提高知识生产力又必须充分重视知识价值的实现。而知识价值的实现又要求我们重视知识生产者个体劳动价值的补偿。由于多种原因，知识生产者个体活劳动价值的补偿是不足的，余下的部分又融进社会为知识生产提供的社会劳动价值补偿之中了。对社会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知态劳动进行经济补偿是合理的，但对知识生产者为知识生产所提供的劳动进行充分的经济补偿是更为迫切和重要的，因此提高知识生产者的待遇，改善知识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对提高知识生产力、发展知识经济是大有裨益的。

知识巨大的价值只有当知识在交换中让更多的人所掌握时才能实现，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此解决好知识私有与公有、私用和公用之间的矛盾，加快知识的

流通与传播，促进知识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快速转化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本来之义。

知识应用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知识价值的转化则是知识应用的前提和内容。由于知识在其流通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放大效应，知识在其本身巨大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流通、转化等过程而使原价值产生追加或放大，从而产生出更加巨大的知识价值。这些巨大的知识价值只有转化到经济活动中去才能发挥其重大的作用。知识价值转化作为一种知识劳动过程其后果有多种形式，比如知识价值可以转化为生产能力也可以物化为一种高知识含量的具体商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价值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它是原有的知识价值增值的知识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增值后的知识的物化过程，因此，知识价值转化工程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而又有效的智力工具。

#### 参考文献：

- ①项浙学、王光铸、李宝泰：《论知识劳动的价值观》，《光明日报》，1986年5月17日。
- ②OECD：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OECD/GD：1996年10月8日。
- ③王鹏程：《知识价值论初议》，《经济学动态》，1985年2月。
- ④司佺：《论知识的价值》，《光明日报》，1985年4月10日。
- ⑤界握太一：《知识价值革命》，金相泰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217页。

作者郭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15006）

责任编辑：韦前 谭湛明

# 知识经济与综观经济效益

□钟生坦  
黄铁苗

聪明才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对比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如下特征。

## （一）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理智性

在知识经济形态以前的经济时代，人类虽然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知识，但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体能。人类积累的知识主要不是用于生产活动，而是用于统治阶级维护他们的统治。

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状况将得到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国领导人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智商、丰富的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现代化武器的强大杀伤力，会使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明白，如果运用武力对他国进行掠夺，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幸免于难；同时，智力资源也难以通过战争进行掠夺。所以，科技特别发达的国家与其将科技运用于战争，倒不如将科技运用于经济，他们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了解他国的信息，制造廉价的商品去获取他国的财富。因此，和平与发展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题，大规模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将不太可能。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的象征将发生根本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象征是浓烟滚滚的工厂、轰隆作响的机器、患难成灾的工厂排泄物以及公路上的不绝的车流，这是由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以及科技欠发达，从而对科技的盲用和误用造成的。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的应用必将告别旧的技术象征。很多新技术将代替旧技术，如用热核聚变清洁能源代替石油和煤，通过使用光纤上的电子或光子，将免除物质和能量在运输中由于泄漏带来的损失和对环境的污染。即使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还必不可少地保留着旧技术，但高科技也将使它们变废为宝。最后，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会发现，高科技的应用，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极大提高，单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已经十分容易，只要掌握了一定的科技手段，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就用不着担心挨饿受冻，所以人们只要有一定积累就行了，用不着去无限地追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都希望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即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人们追求的将不再是传统的、狭隘的、自私的经济效益，而是广义的、全方位的、综合的经济效益，即综观经济效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 一

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实质或灵魂是人类的聪明才智，即人类的智能，故知识经济又称为智能经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又包括社会科学知识。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主要通过运用



求物质财富。这样，人们既可以不必盲目地贪婪地去向自然索取，同时还可以大大减少物质财富的生产时间，增加精神财富的生产时间，使人类的文明程度得到极大提高。

## （二）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加速性

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最为明显的作用是它能加速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知识经济时代会更加突出。首先，科学技术发明的速度更快。这主要是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科研手段更加先进，科学家进行科研的状况得到了根本转变。正像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拉里·斯马尔所说的：“这种相互连结的网络基本上是时空的破坏者，把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这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都坐在一间屋里，这对科研方式是一种很大的冲击。”（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第4页）这是对于孤立的传统的科研方式的冲击。互联网的信息共享，手段共用，方法切磋，对于科研成果的产生，会起到极大的催发作用。其次，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如同产品的供需双方通过互联网会迅速成交一样，科技成果同样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快地进入推广和应用阶段。同时，由于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使科研成果能够更快得到应用。如从1831年发现发电机原理到1872年发明发电机，用了41年时间。而从1972年提出无线移动通讯原理，到1978年出现手提电话只用了4年时间。这里关键在于后者的发明和应用在一个人手中完成，而前者不能。最后，高科技的应用，会使生产得到加速发展。在农业生产中，高科技的应用，会使生产领域扩大，动植物的品种更优良，产量更高；在加工业生产中，信息的共享性以及产品生产的手段的先进，会使生产的占用减少，产品日益轻型化、多功能化，从而单位产品的成本能够降到最低限度；在运输业中，通过互联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物质运输，加速必要的运输。这些都会使经济效益更高，经济加速发展。

## （三）人们的经济活动更加具有规律性

人类知识中的精华部分是人们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它既包括自然发展规律，又包括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规律中，主要部分是社会经济规律的规律。人类对于规律的认识与人们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都具有较高的社会知识水平，对事物的认识会比较深刻，因此，能够认识规律，遵循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不仅会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去获取物质财富，同时，人们还会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们的需要，不仅在数量上得到满足，而且在质量上得到提高。在社会科学方面，人们会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认识运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去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经济行为将更符合规律，更具有规律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经济行为的上述特征使得人们的经济活动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劳动成果与劳动耗费的对比关系，而是取得良好的综观经济效益。

## 二

什么是综观经济效益？与工业经济时期人们一般认为的经济效益就是劳动成果与劳动耗费的比较，综观经济效益反映了建立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文明性、理智性、经济性、社会性、节约性、有效性、近期性、长期性、局部性、整体性以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的有机统一，它综合反映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关系。综观经济效益只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才能全面实现，换言之，只有知识经济才能真正达到提高综观经济效益的目的。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造成的结果与综观经济效益的要求相距太远，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环境破坏严重。现在我国600

多个设市的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一级要求的不到1%，有的城市在卫星从空中拍摄下来的照片中已经消失，水污染已经危及全国381座城市，不少地方酸雨成灾。由于环境受到破坏，经济效益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地方的鱼、虾绝迹，果树不挂果，例如，广东省每年因酸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亿元。有些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已被强行关闭；有的地方由于生态受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环境受到破坏，人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地方多年征不到身体合格的士兵，不少城市的肺病发病率上升，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第二，自然资源浪费惊人。我国耕地、水、森林资源被加速消耗，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沙化加剧。近十多年来，我国每年减少耕地36万公顷。仅就广东来看，最近10余年来，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60万亩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浪费惊人，地下水过量采取，造成了地下水资源严重失衡。森林、矿产资源的浪费同样十分严重，许多物种濒临灭绝。

第三，盲目投资问题十分突出。到目前为止，全国商品房已积压7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库存积压商品已逾3万亿元。还有就是棉、毛纺生产发展过快，设备利用率只有75%，电视机、电冰箱、卷烟、普通机械等生产能力闲置30—50%。与此同时，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生产能力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仍然十分不足。

第四，产品质量差。90年代，我国有关部门对部分城市的调查表明，我国工业产品的抽样合格率约为75%，优质产品产值率为27%，市场抽查商品合格率为55%，与工业发达国家98%的产品合格率相差43个百分点。近几年来，产品合格率仅为60%多，加上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产品，每年损失达几千亿元。

第五，劳动占用高。在研究经济效益问题时，人们往往只看到我国产品的劳动

耗费高，没有看到我国的劳动占用同样是很高的。例如，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占用固定资本，比其它发展中国家高出4倍，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净产值仅仅比其它发展中国家高出50%，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

第六，能源消耗高。我国每吨标准煤所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为710美元，而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值为2165—6388美元。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美元，耗能比日本高7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倍。世界银行有一个估计，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平均高1倍以上，能源利用率之低，举世公认。

第七，劳动耗费高。单位产品中的劳动耗费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活劳动耗费一般以劳动生产率来表示。据有关专家测算，就绝对水平来看，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比我国全民独立核算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6—10倍，其中美国比我们高9.29倍，日本高6.27倍，意大利高7.77倍，澳大利亚高7.78倍。有的行业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例如日本生产一辆小汽车只要20小时，我国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相差40倍。我国生产不仅活劳动耗费高，而且物化劳动也高，我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耗是发达国家的3倍。经对国内12种主要原材料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耗强度比较，我国原材料消耗强度比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高5—10倍以上，比印度也高2—3倍，最高的也达到了上百倍。我国产品物耗存在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64.9%上升到1995年的67.4%。

上述问题的存在，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有生产力方面的原因，还有人的素质方面的原因。我国人口多，整体文化素质低，人们的经济行为常常带有自私、贪婪、愚昧、短视性，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常常不惜破坏环境，向自然进行疯狂掠夺，不惜以粗野、粗放的方式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这是造成综观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总之，无论哪一方面原因，都必须

通过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

### 三

怎样发展知识经济，提高综观经济效益？

(一) 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科教兴国战略  
党中央制订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振兴中华民族。这一战略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坚决执行。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以较高的社会知识化水平为基础，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讲知识经济只能是一种奢谈。我国有关代表团对世界有的国家发展知识经济时的社会知识化水平最低要求情况作过考察，结论是全国成人的文盲率不超过14%，受高等教育者占同龄人的30%。当年美国硅谷知识经济萌芽时已高于这一标准。而在1995年，我国成人文盲率为19%，受高等教育者占同龄人的比率不到4%，因此，普遍提高我国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是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首要任务。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加大教育的投入，改革由财政出资、政府办学的体制，逐步转向民间办学为主、政府办学为辅的体制，但更重要的是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谁富有创新性，谁就能够富有。知识经济的发动机和聚宝盆是人的创造力。知识的价值发生了新的变化，重复现成知识无价值，应用已知的知识价值较低，创新知识才有较高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创新知识的新资本论。一个国家、民族拥有大量的创新人才，才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因此，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把培养创新能力作为教育的目标之一。

#### (二)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指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做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智力及其发展是无限的。因此，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充

分运用人类智力形成的高新技术，解决由于过去对技术的盲用、误用所带来的问题，做到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富有自然资源来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贯穿了节约的要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要建立重效益、节能、节约原材料的工业体系，建立提高单产、节地、节水、节能的农业体系；建立节能、节时、重效益的综合运输体系；建立适当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服务体系。这些体系的建立就是知识经济的运用，这样，人们的经济活动就能获得良好的综观经济效益，就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 (三) 要转变思想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有一系列观念要发生转变，单从运用知识经济获取综观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转变的观念就有：一是要将视自然为征服、改造对象的敌对自然观念，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发展的生态观念。二是要将依靠资源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观念，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为主的经济增长观念。三是要将只重视眼前利益、注重经济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观念，转变为重视经济质量、注重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四是要将主要依靠人的体能的力量观念，转变为主要依靠人的智能的力量观念。五是要将农业经济时期的土地就是财富和工业经济时期的资本就是财富的观念，转变为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六是要将商品经营的占领市场空间为主的市场经营观念，转变为占领市场时间为主的市场经营观念。七是要将工业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效益就是劳动成果与劳动耗费或劳动成果与劳动占用和劳动耗费关系的经济效益观念，转为前已述及的综观经济效益观念。

作者钟生坦、黄铁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510053)

责任编辑：谭湛明

# 略论近代中国民主主义 与民粹主义的整合

□敖光旭

面对近代以来强行楔入的西洋文明，曾经创造了无数东方神话的中华民族保持了一个文明古国应有的自持和谦逊，也由此引发了来自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产生的民粹主义的关联问题和矛盾纠葛。与西方资本主义溃瘍的同时，从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杀出一支劲旅——民粹主义，它企图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而直接通往社会主义或大同社会的神奇峡谷。民粹主义的天才设想和精神遗产，尤其是为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或实现社会主义（尽管不是完全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至今仍充溢着活力与魅力。

## 一

严格地说，界定民粹主义应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本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民粹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逆反和对抗，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抗体而存在的；二是它对资本主义的抗拒已进入自觉的并有较为系统的理论阶段。

正规来说，民粹主义起源于俄国。它是在19世纪中后期因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产生的一种既要推翻农奴制又要阻止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它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是一种发展不起来的偶然现象，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农民”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农村村社则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和基础”，俄国应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而避免资本主义。<sup>①</sup>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俄国民粹主义的消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较之于俄国民粹派，中国的民粹主义从整体来看则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和正面意义。中国的民粹主义倾向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几乎是同时产生并同时获得发展的（而与俄国民粹主义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互为存在的前提，又互相排斥、互相制约，由此造成“西学东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以民族主义为本质背景的民粹主义的碰撞、交汇、融合和贯通。

## 二

这种矛盾运动及其特点首先体现在历史人物的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的二元意识对抗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人格分裂。

从西学泰斗到国学大师，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国粹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从风云人物到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士子，在他们接受西方民主主义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但却是共同的“民粹情结”。这种情结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深层心理抗拒和伦理上的不认同，表现在他们为阻止资本主义或避免其“祸害”而作的种种设想和探索。

譬如康有为，在他鼓吹进行资本主义政治变革的同时甚至之前，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终极思考。这集中体现于他的传世之作——《大同书》中。（1884年起草，1903年完篇，去世后8年出版）它以中国以往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和大同思想为构架，以现实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思维材料，以天才的想象为纽带而构筑了一座金碧辉煌、完美无瑕的人类社会的终极大厦。在书中他毫不掩饰对资本主义的防范和鄙夷。<sup>②</sup>他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因而只能“倾人身家，坏人心术”。<sup>③</sup>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价值取向上的民粹主义的“精神分裂”，这正是《大同书》“秘不示人”的缘由。

在这个问题上，维新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启超与乃师大致相同。虽然他曾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其欲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sup>④</sup>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肯定与道德评判的无情否定同样出现了鲜明的意识对抗。

虽然章太炎的民粹主义带有更多的“农民气派”和空想色彩，但却包含着强烈的民主主义因素。大体在1903年，他转化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他服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随着对西方了解的逐渐增多，他的民粹主义情绪也与日俱增。这不但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也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的极端厌恶。在痛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时他说：“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他设计了充满丰富想象的“抑富强，振贫弱”的社会方案以“恢廓民权”，把资产阶级完全排斥在政权之外。<sup>⑤</sup>这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民粹主义情愫。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以吴稚晖、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

（孙中山称之为共产社会主义）思潮则以更为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他们大唱高调，要求泯灭分工，均等分配，反对任何政府，认为“社会解放重于政治斗争”。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强调在政治上与孙中山的革命派保持一致。<sup>⑥</sup>

如果说在民主——民粹的纠葛中章太炎表现出偏狭和保守的话，那么，孙中山则表现出作为世纪伟人的成熟和开阔视野。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社会主义始终是他“极思不能须臾忘者”。<sup>⑦</sup>他指责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垄断财富，压制贫民，流毒世界，甚至认为资本家的压迫尤甚于封建君主。<sup>⑧</sup>基于此，他将其民生主义称为“排斥少数资本家”的主义，<sup>⑨</sup>并断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sup>⑩</sup>可以说寻找一条能真正造福人民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耗尽了他毕生心血。而从另一方面看，他所认为的“得社会主义真髓”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仍然是一个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方案。

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矛盾运动不仅表现在二元意识对抗及政治人格的分裂，还表现于历史人物对待传统文化所走过的由离异到回归的艰难心路历程。

被誉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所走过的路就颇富戏剧性和典型意义。他曾经是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后来不但反对革命，极力主张“天下仍需定于专制”，<sup>⑪</sup>（这与他早年主张的解决中国问题“非用西洋之术”不可大相径庭）甚至参与筹安会丑剧。晚年则放弃进化论，完全回到孔孟，沉浸于庄周虚无哲学之中，对西学也大加怀疑和否定。他说：西方300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sup>⑫</sup>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接受民主主义之后很快就走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对“委心向西”，提倡宗教、道德、国粹。梁



启超在出访欧美返国之后即致力于以“万能的”东方道德来拯救“堕落的”西方文明，并慨叹“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sup>⑬</sup>康有为在回归的路上走得更有失水准，不仅对封建伦理纲常推崇备至，而且参与张勋复辟的闹剧，几乎毁掉一世英名。刘师培则从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变成了国粹主义的干将。

孙中山承认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sup>⑭</sup>其实这种“因袭”，愈到晚年成分愈多，色彩愈浓。早年他只是在外国读过英文版的四书五经，中学在其思想中所占份额并不多。后来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欧洲驾乎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物质文明。<sup>⑮</sup>并痛切指出中国已失掉了民族精神，还应将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中国固有之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sup>⑯</sup>但总而言之，孙中山的文化观还是持之有度的。

### 三

由民主——民粹的二元意识对抗到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认同，实际上构成了由离异到回归的完整认识过程。离异的指向是民主主义，更多地体现了民主——民粹二元意识的斗争性；回归的指向是民族传统，更多地体现了民主——民粹二元意识的同一性。这个过程也同时标志着中国人对中西交汇的文化景观的认识已由粗糙的感性阶段上升到了渐趋成熟的理性阶段。

虽然以上历史人物的思想都颇为丰富也极其复杂；也尽管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的政治倾向不同，出现的时间不一，非资本主义化的程度和方式有异，甚至有时相互之间还存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但在这些表象的下面却存在着着一股内在的也是巨大的潜流——这就是相互关联、转承扬弃的潜流。即便颓废如严复，也增强了对资本主义陷阱的洞悉能力和警戒；即便偏狭如章太炎，也包含着通向人民民主主义的若干因素；即便流质善变如梁启

超，他的“惊心动魄，一字千钧”<sup>⑰</sup>的篇章却成了几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食粮。唯其如此，二元意识对抗才不是无谓的排斥；唯其如此，回归才不是简单的重复，其中有沉沦，但主流精神却是升华和超越。

也毫无疑问，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激荡化合对近现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塑造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影响。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输入和增进才使伦理本位的民族主义激发出合乎潮流的时代风采；也正是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叛逆和否定，才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痼疾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救治。孙中山的“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sup>⑱</sup>的民粹主义思想体系正是这种升华和超越的总代表和集大成者。它的形成和确立宣告了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式微和阶段性终结，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民族复古主义说不。“他所反对的只是：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固步自封；在纷至沓来的新事物面前抱残守缺。”<sup>⑲</sup>他坚持开放和面向世界，又从不全盘接受和盲目崇拜外来事物，而是力求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相结合。他认识到“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sup>⑳</sup>在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即开始筹划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他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使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驱宣传家、思想家和拓荒者。

### 四

几十年要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的路，几代人要完成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思想观念的一次最大变革。历史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出现政治伟人和思想巨匠的机遇，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磨难。

中国是个“超稳态”的异常庞大的文化集合体。它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也是登峰造极的文明形态——封建农业文明。这不仅造就了异常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行政控制系统，也造就了包括道德规范、价值体系、思维定式和

民族心理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欧美近代的海洋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之间既存在时代的差距也存在质的分野，从以农立国的经济基础到耻于言利的士林风气都难于容忍“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被淹没在资本主义“公开的、无耻的、露骨的”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器物”层面取得了摧枯拉朽的进展，但中国学习西方也必然以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为本位来筛选西学的内容，因而不大可能达到整体超越的程度。即便在效仿的同时，东方道德也毫不掩饰它对西方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鄙视。这正是近代中国民粹主义高扬的深厚历史文化土壤。

目的与手段，大概是关于中国学习西方的永恒话题。“保国、保种、保教”与借法西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评判与现实选择、显意识与潜意识、学理与政治主张的种种矛盾，注定了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民族精英要经受加倍的精神困惑和心灵磨难。这使得他们时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时而又成为落伍的“封建余孽”，时而歇斯底里地呼号呐喊，时而又捶胸顿足地忏悔，时而气宇轩昂时而又心止如水或匿迹佛门。

或许只有将他们的精神磨难置于整个民族悲剧的高度——而不是机械地寻找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的蛛丝马迹——我们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忽视中西阶级状况的根本特点，背离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规定性而人为地指定他们作某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捉襟见肘，甚至自欺欺人。应该承认，以上这些历史人物继承了传统士人的优秀品质或学人品格，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格规范，讲求自身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具有相对超然的独立人格。他们往往能超越一己之私利，发散出对道义和社稷的终极关怀。<sup>②</sup>因而他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都关乎中国的全局、前途和命运，带

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尤其是当西方“那里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则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真诚地希望借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摧毁中国的封建制度并把它与防止资本主义的流毒结合起来，从而显露出令人振奋的思辩才华和首创精神。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他们的思想纷繁驳杂，但都不约而同地给我们打出了同一张警示牌：中国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

## 五

勿庸讳言，中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的漏洞和不足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不成熟的理论总是和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掩盖了自身的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限制了思想家的视野；科技水平的低劣，局限了思想家的思维；模糊的阶级关系，增加了分析问题的难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使思想家得不到强有力的阶级支持。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掩盖其宝贵而合理的思想内核。正如恩格斯在评价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时所指出的：“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sup>③</sup>

所不同的是，中国“战斗的”民粹主义绝不仅仅是突破了“幻想的外壳”。比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构想非资本主义道路稍早，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得出属于东方社会类型的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sup>④</sup>虽然两者不宜等量齐观，中俄两国国情也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即任何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论都不应是也不会是绝对的。对中国民粹主义简单地论之以“空想”，斥之以“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步骤”，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轻率的作法。

在我们再次走向世界并回眸历史的时

候，我们不能不震慑于近代中国民族脊梁他们昔日的风采和远见卓识。

①参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

②尽管《大同书》中一些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言论为戊戌之后所增补，但在非增补的内容中反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参看林克光：《论大同书》，《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③见康有为《大同书》，转引自拙文《浅谈中国民粹主义》（未刊稿）。

④梁在《新大陆游记》中说：“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42页；在《杂答某报中》也说社会主义应该在将来实现，见《新民丛报》第86号，第48页。胡绳也认为孙梁二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其实是近似的，分歧在于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立即实施，见《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⑤参看李时岳：《论章炳麟和光复会》，《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参见李泽厚：《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有关部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⑧⑨⑩《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3、339、520页。

⑪⑫严复：《与熊纯如书》第15函，59函，转引自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55、284页。

⑬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讲》，《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⑭《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页。

⑮⑯《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6页。

⑰黄遵宪语，见《梁启超文集》前言。

⑱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⑲张磊：《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社会科学家》（桂林）1997年第6期。

⑳《宋庆龄选集》，第371页。

㉑参见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㉒参看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有关“士”的章节，天津出版社1995年版。

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9页。

㉔这个观点集中反映在马克思1877年11月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3月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复信的三个草稿中，详细内容参见冯祖贻：《从马克思的“超越论”看孙中山的“避免论”》，《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作者敖光旭，湖北襄樊市委党校科研处（441000）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张之洞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的言行评析

□ 钟康模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晚清许多重大的涉外事件中，他的态度令人瞩目。一般观点认为，张之洞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前期和中期都不乏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壮举，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从他和刘坤一等人勾结外敌，演出“东南互保”的丑剧后，便被指斥为叛国分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在庚辛年间，张之洞出于民族责任感，对清廷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曾逐一提出异议；当沙俄用恫吓欺骗的手段胁迫清政府承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霸占我国东北的严重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力主拒签俄约，捍卫民族权益，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拒俄逼约斗争。因此，如何评价张之洞后期的表现，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一

沙俄欲吞并我国东北地区蓄谋已久。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沙俄除乘机伙同其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入我国京津地区外，还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单独调集十多万侵略军，兵分七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为了使其武装占领一事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并通过法律手续把其抢夺到的土地和权益固定下来，其侵略军总头目阿列克谢耶夫于10月5日命令俄军在新民厅（今辽宁省新民县）劫持了弃城逃跑的盛京将军增祺，强令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为代表去旅顺进行谈判。阿列克谢耶夫强迫周冕在事先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划押，后由增祺划押盖印。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章程。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签订的消息传出

后，国内舆论大哗。清政府亦表示“殊深骇诧”，以“擅立约章”的罪名，将增祺“革职”，“交部严加议处”，并责成参加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的全权代表杨儒立即与沙俄政府谈判废除《暂且章程》。沙俄则于1901年1月17日由俄户部大臣维持口头提出一个比《暂且章程》更为苛刻的约款十三条，2月16日由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正式提出谈判约稿十二条，妄图攫取我东北以及西北广大疆土和主权。这一凶暴的帝国主义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通国士夫君焉力阻”，各地士绅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纷纷要求“严拒以救危亡”。在这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关头，张之洞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出发，坚决反对这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痛论俄约对国家民族的严重祸害，指出：“增祺与俄国擅立暂约事荒谬万状，果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矣，兵权、利权、政权全失，所谓交还有名无实”。<sup>①</sup>至于“约稿十二款，虽略有删节，大致仍与相仿”，如一旦答应沙俄要求，中国就会陷于被瓜分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因屡向清廷上奏，“力陈此约万不可允”。<sup>②</sup>他还主动出面联络刘坤一等各省督抚，一致行动，敦请清廷“坚持力拒，断勿轻许”。这些意见得到刘坤一等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他们纷纷致电清廷，要求清政府“万勿画押，以贻大患”。与此同时，张之洞看出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和其他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矛盾很大，因此，他分别向中国驻英、日、德、美等国公使发出急电，请向各本国外交部要求干预俄约，“劝俄勿要挟中国”。由于张之洞等大多数督抚及清

驻外使节的交涉劝阻，加上列强相约，“凡通商各国宜设法阻止俄人横行于满洲”，反对沙俄独占东北，清政府遂向奕劻、李鸿章发出旨电：“俄约切勿签押”，“务须电告杨儒与俄外部力争删改”。在交收东三省谈判中尽量做到使沙俄“勿占据我土地，勿垄断我利权”，以期“吏治、兵权均不失我自主”，“以保全大局，保全利权为要”。③

杨儒在谈判之初，处在内无定见、强敌外逼的情况下，处境非常困难。张之洞对此十分关切，他接连给杨儒去电，指出：“东三省因增祺擅立单约，致启贪求”，但增祺并非钦命全权大臣，其越权所签《暂且章程》，“究与国家何涉？”从万国公法的法理上看，这个条约也是无效的。因此，他希望杨儒在与沙俄订立正约之前，必须废除《暂且章程》，不容沙俄觊觎。他切望杨儒“详审利害，坚持力拒，万不宜贸然定约”。④他还诚恳指出：国难当头，作为朝廷大臣理应为国分忧，勿畏艰难，不辱使命。考虑杨儒势单力薄，各方煎迫，张之洞多次致电杨儒，提出：“鄙人及刘岷帅（刘坤一）此时有何策可为公助力之处，祈速密示”。深表自己于公义私情都不敢缄默，当竭尽微薄之力，戮力一心，共筹补救之策。

与张之洞的态度相反，李鸿章却为虎作伥，极力敦促清政府签订沙俄所提出的约款十二条，认为“无甚纒缪”。惟恐“激俄廷之怒，致即决裂”。他还斥责张之洞的有关议论是“书生习气”，一派“狂言谬论”。⑤对此，张之洞十分痛心和忧愤，他针对李鸿章所谓俄约“无甚纒缪”的怪论，痛陈俄约十二款对中国的严重危害。指出：“俄约责我以东三省吏治而尽将兵权、利权、政权夺去，专令我压制华民以供俄人之役而已，利则归俄，害则属我，名为俄还东三省于我之约，实则我让东三省于俄之约也”。⑥若照俄约第八款，“北省沿边蒙古、新疆皆不准中国及他国人开矿造路，矿路权益全属俄人，北边数万里已非我有。假如各国效尤，英于长江，德于山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

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⑦他沉痛地说：对于这样祸国殃民的卖国条约，“中国稍有忠君爱国之心者亦皆痛心疾首，请勿画押”，唯独“李相一人偏执己见，心欲成之而后快”，⑧开门揖盗，要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俄人。张之洞敦请清廷“事关重大，孰谬孰是，深望朝廷格外留意慎重，体察情形，勿信一面之词，免误大局”。⑨鉴于李鸿章亲俄畏俄殊深，始终迎合沙俄的需求，清政府又深怕开罪沙俄政府，在拒绝俄约问题上迟疑瞻顾，张之洞有针对性地指出：“俄约祸害，洞若观火”，此时沙俄占据东三省土地，加紧勒逼我画押，无非是取一纸条约，变非法为合法化，作为自行掩饰之计。如此阴谋诡计，“路人皆知”。因此，张之洞诘问李鸿章“岂能始终为俄所愚耶？抑或别有成见耶？不顾国家之安危而专与同僚为水火，大臣举动不当如此”。⑩他以国事为重，要求朝廷“坚持定见，乾断勿疑”，“分谕全权杨使，此约万勿遽行定议”。同时，他又屡电杨儒说：“此事关系大局甚重，务必孰权利害轻重，以定画押”，无论俄人如何恫吓，务须极力拒约，“免贻巨祸是为至要。”⑪清政府虽然也感到“现在事局万紧，势难再行延宕”，但是考虑到朝野一片反对声浪，英、日、美等国又不甘坐视沙俄独吞东北这块肥肉，迫于国内外压力，明令盛宣怀转电杨儒，拒签俄约。

## 二

为了勒逼签约，沙俄撕下了“友谊”的假面具，对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杨儒极尽威胁诱骗之能事。杨儒毫不动摇，拒不画押，使沙俄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只好变换手法，于1901年3月12日抛出略加删减过的最后约稿十一条，限令清政府在3月26日签字，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并蛮横地宣布：清廷在14天内如不签字，就“拟将满洲改作俄国行省，永不归还”，以此来胁迫清政府承认占领事实。对此，清廷一



片惊慌，不知所措。在慈禧授意下，西安行在军机处电令杨儒“全权主计，朝廷不为遥制”。李鸿章更是吓破了胆，认为新约十一条“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后患”，并危言耸听地声称：“已改之约不能再商，已定之限若再迟逾，祸患甚大”，并与庆亲王奕劻联名急电杨儒：“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sup>⑫</sup>张之洞见事机紧迫，万分焦虑，立即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李相电催画押，务望朝廷勿许”，<sup>⑬</sup>“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如果照允，后患无穷，“万不可因前约略为删改即令画押，又中俄人圈套，自蹈危机”，并对沙俄交出的最后约稿逐条进行批驳：“俄人甘言欺我，勒逼画押，此约一允，满洲已全为俄有，直与英得印度，法得越南无异”。<sup>⑭</sup>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一旦画押，“各国断不肯独令俄人吞噬，势必种种抵制，利益均沾，群起效尤，瓜分中国”，这样，“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sup>⑮</sup>时促势迫，存亡所系，仰恳朝廷“洞察利害，坚韧持之，万勿画押”。他又斥责李鸿章“袒俄心切”，“意涉偏重”，委曲求和，“以决裂为辞，迫求定约”，不敢存一丝挽救之念。李鸿章负气相争，指责张之洞沽名钓誉，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往往徒托空言，责人无已。张之洞非常愤慨地指出：作为朝廷重臣，时局艰危至此，不顾东北三省的解体，不顾西北边疆的危机，不思妥善善策，反而一味偏执己见，畏俄如虎，配合俄廷催逼签约，甚至不惜为此与同僚自相水火，实在令人伤心。他建议朝廷“切饬李相遵旨而行，免贻无穷之祸。”

鉴于沙俄催迫画押紧急，清政府又犹豫不决，张之洞向清廷提出纾祸救急的三种方法：一，速发电旨，令英、日、美、德各驻使切恳各国外部出面，电请俄国放宽画押期限，争取时间，“方能内筹抵制之策，外采各国之谋”；二，即与各国相商，如能力助中国拒俄，愿将东三省全行开放，准许各国利益均沾，开矿通商，“与其为俄独占其利，受无穷之害，不如借各国通商，

以为牵制之策，不独目前可以拒俄，亦从此可免俄国侵吞满洲之患”；<sup>⑯</sup>三，于北洋一带水路，山海关、奉天等处陆路，聘请英、日将弁训练水陆各军，“抵制沙俄欲筑路驻兵直抵长城之举”。<sup>⑰</sup>张之洞提出的办法，自然不是救国良策，他仍然迷恋于“以夷制夷”的老套路，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误认为只要列强答应帮忙，“合力劝阻”，中国就会平安无事，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持各国牵制”，“除借资各国外，再无纾祸之策”，把中国的命运交给列强摆布。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说明张之洞在此问题上的昏懦无知。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他能提出的计策也只能是“以夷制夷”。

为了争取列强的支持，“为我切实助力”，张之洞不厌其烦地建议：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但国家主权不能放弃，各项权益的所有权属中国，“我收其税”。之所以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一，利用列强与帝俄之矛盾，力驳俄约“满洲不允他国均沾矿路工商利益之条”；二，东三省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凡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才料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sup>⑱</sup>总之，张之洞认为，此时东三省开门通商，引进外资，是力保满洲上策，“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sup>⑲</sup>尽管在半殖民地社会，企图依靠外资来开发地利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但作为封建官僚，在当时能作这样的思考，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属难能可贵，简单地指责他不过想“前门拒狼，后门揖虎”，显然是不够公允的。

张之洞除向朝廷迭次上奏，危言苦谏，敦请清廷统筹全局，拒签俄约外，还挂念杨儒左右为难的处境，尤其对杨儒接到李鸿章催逼签押的电报后，是否会做出违心的决定不胜焦虑。所以，他联合刘坤一等人电告杨儒，布以公诚，陈以利害，指出“画押与否，乃中华全局存亡所关”，目前朝廷尚未决断，廷议尚在踌躇，“合肥意涉偏重”，“成见太深，办法太谬”。<sup>⑳</sup>他告诫

杨儒，毋忘当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定要以国事为重，折冲樽俎，万勿辱命强邻，一误再误。他还深刻指出：“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行在亦无成见，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矢集，窃为公危，请统筹全局格外慎重”。<sup>①</sup>杨儒坚决表示：“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sup>②</sup>

清廷在全国抗俄怒潮的冲击下，又迫于列强“群起效尤”的压力，遂决定拒绝在沙俄所改定的最后约稿上签字。旨电奕劻、李鸿章“俄约朝廷决意不画，就使触俄之怒，较之撻各国之怒，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并电令杨儒“婉转俄外部，……非展期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至此，沙俄政府黔驴技穷，在限期满后，于4月6日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作罢论，中俄交收东北三省的谈判宣告破裂。沙俄交还东三省和撤兵一事，双方延至翌年4月8日才在北京签约。此前，李鸿章已死，由奕劻和王文韶主持谈判，张之洞一如既往，频频向朝廷上奏，揭露沙俄虽然没有取得条约根据，却仍保持非法占领，以“静候时机”，阴谋独占东北的狼子野心，提醒奕劻“此事关系重大，俄以后必有阴谋，似宜格外周妥，不可稍有疏漏”，以免“堕俄奸计，自欺自愚，被俄人暗算”。<sup>③</sup>此时，英、日已结成同盟，对沙俄进行抵制，国际形势也对俄不利，加之1900年后，俄国国内经济危机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兵士哗变。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的态度因之软化，不得不同意撤兵，并于1902年4月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暂时收起它武装霸占东北，变我东北地区为其殖民地的侵略计划。

### 三

诚然，张之洞毕竟是行将灭亡的清政权中一名高级官僚，没落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存在的许多弱点在他身上程度不同地反

映出来。他反对与沙俄签订出卖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在许多奏折和电文里不乏慷慨激昂，不畏强暴的措辞，表现出反侵略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拿不出积极的御敌方案，阶级地位又决定他没能看到民众的力量，只好乞求英、日、美、德等国干预俄约，希望得到列强的同情，以依靠列强抑制沙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沙俄贪得无厌，妨碍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出于各自的利益，它们便联合起来“警告”、“劝阻”清政府拒签俄约。但它们只言画押之祸，不言帮助之法，根本不愿为清政府去和沙俄动武，所谓“令俄不向中国为难，只能持以公论，不能继以兵力”。张之洞企图依靠列强的支持摆脱危难的局面，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事态的发展很快就使张之洞的设想成为泡影。《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虽暂时遏止了沙俄吞并东北领土的野心，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却各怀鬼胎，加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最后终于导致了日俄战争，给东三省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痛苦和灾难。这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和深刻矛盾使列强无法就瓜分中国一事达成协议。为了击败自己的对手，列强纷纷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其意志的工具。因此，清政府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分野，李鸿章是亲俄派，久居湖广的张之洞在英、日等国的影响下反俄，主张联英亲日。而沙俄独霸东北的野心，无疑是对英、日远东政策的沉重打击。于是，英、日等国政府假手张之洞，力阻俄约。这样，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异常纷繁复杂的局面。张之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表现，其主观愿望还是积极的。他的作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相呼应。这和他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力主抵抗、反对投降的行为是一致的，具有进步的作用。不应该因为他曾经勾结外敌，在“东

# 从学术三民主义化到三民主义学术化

## ——孙中山研究在台湾 50 年（1949—1998）

□张军民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世人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其思想亦被称为国父思想。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义一直被国民党当作立党治国的根本精神。但与颂扬声相对立，近年来三民主义在台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有些民进党人士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与台湾无关，在台湾应该废除三民主义。前民进党主席甚至说三民主义是乱七八糟的东西。<sup>①</sup>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圣经时代正在悄然逝去。

大致说来，近 50 年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研究在台湾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繁荣，再到反思的过程。

发展阶段（50 年代—70 年代中）

1949 年，国民党政权败迁台湾后，蒋介石就开始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并强化三民主义教育。他不仅强调要加强

对国民党一般党员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而且强调用三民主义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钳制。当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不完全是孙中山思想的本义，实际上包含着蒋介石添加的一些内容。

首先，蒋介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旗号，极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要求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就能达到“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目的。表面上，他将孙中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其潜台词则是：蒋介石是孙中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这种强调“道统”的作法于无形中加强了他的一般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和正统地位。

其次，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也就是他的力行哲学。

南互保”这幕丑剧中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而否定他后来捍卫主权、扶危御侮的爱国表现。历史的复杂性造就了张之洞的复杂政治品格，他往往把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集于一身。纵观他的一生，在对待外国侵略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爱国的；但其勾结外敌，镇压革命的反动立场也是无可否认的。对于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仅仅从某种道德意识或者政治观念出发，对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对他符合民族利益的爱国表现予以充分的肯定，又要对他身上存在的反动性和阶级局限性进行历史的分析和批判。

<sup>①②⑥⑦⑧⑨⑩⑪⑬⑭⑯⑰⑱⑲⑳</sup>《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第 1 卷，1 页，11 页，8 页，11 页，29—30 页，12 页，16 页，20 页，10—11 页，26 页，11 页，11—12 页，11 页，11 页。

<sup>③④⑫</sup>《杨儒庚幸存稿》，第 8 页，87 页，95 页。

<sup>⑤</sup>《李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八，第 25 页。

<sup>②⑳</sup>《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七十二，电牍五十一。

<sup>②</sup>杨儒辑：《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会钞》，第 81 页。

作者钟康模，广东省委党校教授（510053）

责任编辑：郭秀文

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一文中，他斥责一般党员缺少“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共产党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sup>②</sup>并要求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一旦外援断绝”，“就认为前途无望”消极情绪的蔓延，<sup>③</sup>做到一旦和中共交战，“不成功，便成仁”。

第三，“万分惭愧”地增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25年戴季陶就有所归纳，此后胡汉民、周佛海亦涉及到此一问题。在此基础上，1939年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践程序》，用“民生哲学”对抗当时颇为流行的唯物史观。50年代，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体系论得到注经般的阐扬，如罗刚的《三民主义的体系与原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就是根据蒋所概括的程序内容展开的。蒋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增补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1953年国民党七届中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众所周知，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皆有六讲，而后的民生主义由于局势恶化，只讲了食、衣、住、行四讲。蒋介石认为还有“育”和“乐”两个问题有待研究，说“如不把育乐这两个问题，和衣食住行这四个问题，一并提出研究，就不能概括总理民生主义的全部精神与目的所在。”<sup>④</sup>《两篇补述》中，除了个别对大陆的攻击之外，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的。如关于人口的质与量、教育上的升学主义，以及文艺、宗教、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意见，还是有很多精辟见解的。从补述中，我们也隐约发现此后“台湾奇迹”的影子。

除了加强对国民党党员和台湾民众的三民主义灌输外，蒋介石还极力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提出“要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sup>⑤</sup>“三民主义教育”的趋向，一方面是为台湾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加

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以免在利用学校教育这枚双刃剑时，一不小心斫伤自己。为了贯彻此一“三民主义教育救国方针”，1950年6月，台湾“教育部”颁发了《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26条，对加强三民主义教育做了详细的规定。于是，在台湾，孙中山思想遂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自1956年台湾“大专联考”（高中毕业会考暨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考试）开始，三民主义又成了不可缺少的考核科目。

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霸道”专控中，台湾孙中山研究一直扮演着政治生活的奴婢角色。除了陶希圣、陈立夫、孙科等老牌政客忙于为一些孙中山研究著作作序外，其他学者，如崔书琴、张其昀、任卓宣、崔载阳、张铁君、罗时实、崔垂言、叶守乾、叶祖灏、罗刚、傅启学等人成为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与《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两书为时所重。任卓宣（又名叶青）所著的《三民主义新解》一书，获取1966年首届中山学术奖。在大专教材方面，除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完全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观的扩版外，其它如秦孝仪的《三民主义基本教材》、唐振楚的《三民主义要义》及《民族主义要义》更干脆变成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选集合编。

以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台湾孙中山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除国父纪念馆、阳明山中山楼等硬件纪念设施相继于1961年和1966年竣工外，一大批研究著作也纷纷“借光”推出。仅1965年台北各界就出版了12种纪念丛书，如《国父全集》、《国父年谱》、《国父墨迹》、《国父画传》等。其中《国父全集》为“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增订而成，故又称为《会本》，凡三册，2293篇；而《国父年谱》由国民党党史会编订，罗家伦任主编。此二者为以后多次增订的《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之蓝本。由张铁君主编、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国父百年诞辰

纪念丛书》二辑二十四本亦于此时推出，⑥用主编者的话说，这套丛书对孙中山的“心物一元学论、民生重心的历史论、仁爱基础的社会论、济危扶倾的民族论、权能分开的政治论、五权分立的宪法论、社会价值的经济论、手脑合一的教育论、知难行易的实践论”等学说思想，“均请专家研究执笔”阐发，堪称前所未有之创举。⑦由程天放、罗时实、崔载阳等人编著的《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也是一个大部头，全书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五个方面对孙中山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由阳明山政工干部学校编印的《思想战线丛书》中也包括一些孙中山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林桂圃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徐梅邻的《国父与组织战》、王修浩的《国父与群众战》、林大椿的《国父与心理战》、马璧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哲学思想》、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曾守汤的《三民主义新世纪》、薛纯德的《国父思想与现代伦理思想》、曾松友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田炯锦的《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吴演南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赵振宇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军事思想》、周世辅的《国父思想与中国文化》、张维松的《国父思想》、崔载阳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等。

1966年11月12日，阳明山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蒋介石发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再次强调“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⑧此后，在孙科、王云五、张知本等1500多人联名建议下，台湾行政院规定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先生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1967年7月，台湾各界在中山楼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在台湾及海外开始推行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声称“三民主义以承继中华民族大道德行和传统为己任”，“使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又一次发射

出光辉灿烂的光彩”。⑨从主观上讲，蒋介石大谈三民主义和中华文化绝非仅仅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要给人一个三民主义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三民主义的印象，把自己装扮成民族文化的“保护者”，达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为自己“正统”地位辩解的目的。因此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股阐述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文章热”。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篇地论述“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是一部三民主义”这句现存的结论。⑩1967年三民主义研究所“不失时机”地推出《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专题丛书》6本，包括李霜青的《三民主义与理学修养思想》、张铁君的《三民主义与儒墨正名思想》、周开庆的《三民主义与管子经济思想》、姜汉卿的《三民主义与学庸天人思想》、柳岳生的《三民主义与春秋民族思想》、郭寿华的《三民主义与孙子军事思想》。客观地讲，这些作品著作者皆学有专长，但由于强调与“三民主义”挂钩，致使书中牵强附会之处不少。

当然，对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不能全盘否定。当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对付五六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的理论武器主要是伴随美援而入的西方民主思潮，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而言，当然是一种反动，但它同时又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尽管主观上是为国民党“法统”请命的，但客观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提升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惜的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从文化角度出发评价孙中山思想，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把孙中山思想说成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大本大经，在学术思想领域中，没有出此大经、离此大本的，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如此，自然科学莫不如此；不如此的，则必非世界人类所需要，亦必非宇宙自然的真理。”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有些自视过高，把中国文化说成是人类



的指导文化，认为欧美人有“原子时代就是人类自己毁灭的时代”的恐惧，就是缺少了中国的文化精神。还说“自然科学是要发掘宇宙奥秘的，中国文化就能把握宇宙自然的最高奥秘，只不过中国人不屑如西洋人的钻牛角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肯如孩提之于水沟里玩小水车，在马路玩纸风筝罢了。”<sup>⑪</sup>颇有点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味道。

#### 繁荣阶段（70年代中期—80年代）

1975年蒋介石病逝，严家淦继任挂名总统。1978年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就职当日下午，蒋经国即发表“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万岁”的指示。<sup>⑫</sup>在国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蒋经国再次指出，“在领袖、党魂感召下，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凭藉，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人性的指标，二十世纪人类的共同归向。”<sup>⑬</sup>

蒋经国对三民主义“不改初衷”，主要体现在也要“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地“实现三民主义于全国”，<sup>⑭</sup>即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经国的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故其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也是很卖力的，并且把对三民主义的无限信仰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无限“谴责”上。蒋经国的这种“嗜好”得到了台湾学术界一些人的极力迎合。1979年出版的刘珍《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胡一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的比较》、任卓宣《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三部著作便是证明。1966年开始蒋介石曾把台湾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带上一个高潮，但彼时的比较多限于部分文章或部分章节，像这样的以三部巨著出现的比较还是首次。这三部书皆是在1979年及时出版，个中因由除了“前人（蒋介石）栽树，后人（蒋经国）乘凉”效应外，恐怕更多是受了蒋经国的“十一全会”报告精神的“感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部书中，以任卓宣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影响最大。任卓宣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30年代后改

信三民主义，并以研究三民主义为终身事业，著述甚丰，是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序言中他就说：“共产主义无论在哲学基础、科学基础、主义本身及斗争策略方面，处处均不及三民主义，而处于劣势。这说明它比较不过三民主义，换言之，它在思想战中破绽百出，甘拜下风。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在反共战争中将‘弃甲曳兵而走’的信号，那么三民主义的胜利便可预卜了。”<sup>⑮</sup>这个结论是先于“比较”早已现存的，尽管打着“比较研究”的学术幌子，但显然是不合学术规范的。因此，与其说此书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政治宣言书。

尽管蒋经国依旧钟情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在“中华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态度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个人权威不及蒋介石，另一方面是他更加明了民主化是时代之潮流，而不得不做出“维新”的姿态。蒋经国这种既新又旧、不新不旧的政治态度，对台湾三民主义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三民主义学术化”与“学术三民主义化”的争论正是在此时出现的。“三民主义学术化”要求“以比较的方法，窥探出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学术三民主义化”则要求“政治学者研究三民主义政治学，经济学者研究三民主义经济学，社会学者研究三民主义社会学，”<sup>⑯</sup>即学术研究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这种新旧思维的大碰撞，为台湾三民主义研究提供了湿润的气候，是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此一时期台湾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述浩繁，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书特别多。据我们了解，至少有六种丛书——《三民主义学术理论丛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青年理论丛书》、《民族精神教育丛书》、《励进丛书》、《中华文化丛书》。其中以《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影响最大。由于手头掌握的材料有限，我们

不能对这六套丛书作进一步的考察，只是粗略地形成了两点印象：其一，这些丛书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如《青年理论丛书》从70年代开始，每年一辑，每辑10本，1979年为第九辑，1980年为第十辑（以后是否继续“辑”下去，不得知）。《三研所奖助丛书》从80年代开始，每年一辑，每辑10多本，一直“辑”到90年代。其二，有些丛书的内容已经突破三民主义文本，把三民主义同现实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但又不同于以往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叫嚣，而是遍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是百花齐放，甚至出现用数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孙中山思想。总的来说，此一时期台湾的年轻一代学者已经突破上一代学者对孙中山思想的狭隘理解，视野更加开阔，立论亦较持平。三民主义研究在台湾不仅开始“学术化”，而且开始“社会化”了。

另外，此一时期台湾关于孙中山研究还有三项成果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孙逸仙先生传》、《国父年谱》和《国父全集》。

《孙逸仙先生传》是台湾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吴相湘先生的一部力作。在此之前，台湾有关孙中山的传记不少。据“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李云汉先生介绍，在台湾关于孙中山传记之撰述和翻译，为数在30种以上，其中以罗香林、黄季陆、郑彦芬、傅启学和吴相湘等人的贡献为多。<sup>①7</sup>但这些作品皆不及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的内容翔实。早在1953年和1965年，吴相湘即有《孙中山》、《孙逸仙先生——中华民国国父》两书问世，1982年出版的《孙逸仙先生传》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搜集。《孙逸仙先生传》厚达100多万字，资料详实，常为后学者所称道和引征。该书之特点可用梁家溎在书后《跋》中的一段话来表述：“此书名为国父立传，实为近代写史，凡读是书者，不但对于国父思想悉得津梁，即有清末造土崩瓦解局势之所由来，北洋军阀隆替之所自起，乃至国际方面英日同盟、华盛顿九国公约、西太

平洋互不设防协定，以迄于苏俄第三国际之如何操纵国共，皆可由此机倪，寻出端绪。”<sup>①8</sup>全书立论颇具个人意气，甚至有不少“开罪”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地方。

《国父年谱》为国民党党史会历经四次增订而成，“为目前海内外最精细最完整之孙中山年谱”，<sup>①9</sup>可与大陆陈锡祺先生主编之《孙中山年谱长编》相媲美，二者可相互补充印证使用。

《国父全集》亦是由国民党党史会多次编订而成的。1950年至1952年间台湾陆续出版的《总理全书》十二册，1957年在《总理全书》的基础上，正式改名为《国父全集》并出版。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复由秦孝仪主持增补改编成十六开本《国父全集》三巨册。1973年党史会根据此前出版之全书、全集，又搜罗早年出版的《中山全书》、《总理全集》等，尽发库藏重新编次，勒成十六开本《国父全集》六册。1981年复详加校正再版，并将其中第四册析为上下册，全集遂为七册。1984年党史会为纪念孙中山建党革命90周年，将继续征集之著述与文件，辑为《国父全集补编》一册，这样全集成八册。1989年国民党建党95周年，《国父全集》再版，收录逾八百多万字，十六开本共十二册，实为目前海内外最完备的孙中山全集之版本。

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开始注重对外交流。1985年11月在“国立”中山大学召开了“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美、英、法、日等国家或地区学者50人，台湾专家学者90人，为台湾当时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此次大会有三项使命：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同盟会创世80周年以及对日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40周年。大会共宣读论文59篇，“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论文15篇。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是政治性与学术性兼容。前“总统”严家淦和副“总统”李登辉亲自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们在讲词中都认为“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方针

和理想，确实是控中国发展的方向”，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 反思阶段（90年代）

1988年李登辉登上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台湾民主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两岸关系也开始有所缓和。尤其是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以及1991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得以加强。在此条件下，台湾三民主义的“官定意识形态”权威开始松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孙中山形象日趋淡漠。台湾学者普遍面临着“国父思想”、“三民主义”废教和废考的困惑。

这种困惑表征之一是，继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相继有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中山学术研究所”，政治大学三研所改名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大学三研所的改名之议也一直在进行之中，有可能改名为“亚太研究所”，其名称与职能均与孙中山研究无直接关系。目前坚持使用三民主义研究所原名的，只有台湾师范大学一家。表征之二是，大学的三民主义课目改为讲授“中华民国宪法及立国精神”，内容或讲授孙中山思想，或联系孙中山思想讲解三民主义，或讲授与三民主义完全无关的宪法内容，皆不受限制。高普考已经废考“国父遗教”及三民主义，至于大学联招是否废考三民主义亦在议论之中。种种迹象表明，过去三民主义那种作为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现在已经开始动摇得厉害了。

面对困惑，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的反应不一。大致说来，包括左、中、右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三民主义固然带有“救国主义”的实用色彩，但它的终极目标不仅定位于“以建民国”，更在“以进大同”，它超越中国一时一地的问题，具有前瞻性与全面性，因而能够历久弥新，放居四海而皆准。<sup>②</sup>他们承认三民主义在台湾民众中间的影响力的确是日益式微，但原因不在三民主义本身，而在于宣传上的不

力。因此要做的事只能是“改善三民主义课程教学之道”，具体包括：编排选择适当的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充实图书设备以及视听教学；经常主办研习、参观及实习等。<sup>②</sup>

第二种观点认为，三民主义还有教学研究的价值，回归学术是三民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必须尽量摒除政治因素的考虑，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三民主义作客观的检查。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周继祥教授即认为：台湾“大学国父思想改为‘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高普考废考国父遗教及三民主义，大学联招废考三民主义及高中取消三民主义课程等一连串事件，说明三民主义解除多年政治力的桎梏，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是必然的趋势。”此派观点认为政治与学术各有其领域，学术的价值要在学术的领域中去决定，而不是在政治领域中去决定，在此信念之下，日后台湾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新党执政，三民主义仍可自恃其原始之学术本质，在教学及研究上，继续开创发展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应中国现代化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以孙中山思想为文本，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统观点作为诠释基础的三民主义，已经难以解决21世纪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应予以废除。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数为台独分子，他们或直接叫嚷取消三民主义，或藉学术化为名，对三民主义实施攻击。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馆讯第十四期（1997年9月30日出版）发表的台湾大学三研所博士生曾建元《以台湾为思想本位的三民主义》一文即表露出浓厚的台独色彩。该文认为“正统三民主义”纵然有救世主义的淑世性格，但“孙中山思想及其革命事业，则当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历史经验，而不应当要将之视为金科玉律”，因此“必须重新定位”。定位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台独——民族主义立场“不是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民族中的立场，而是以中华民国所处的台湾省为中心的文化多元主义台湾民族国家立场”。在

民生主义方面，则应“避免被吸卷入大中华经济分工体系而形成另一类型的依赖经济。”<sup>②</sup>此种论调实际上是为李登辉“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作喇叭。

从以上归纳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尽管台湾“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但是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思想学说过去那种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台湾民主化日益加强，民众对三民主义强化教育所造成的刻板现象，一旦遭受到民主自由气候的浸润，就会转变于另一极端，极易形成对三民主义的反感。而且作为引导台湾民主化的三民主义在民主化之后，成为民主市场上众多的竞争性意识形态之一，愈有被分化、掏空之趋势，其“鸟尽弓藏”的难堪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台独分子的有为之举，他们攻击三民主义，就是变相攻击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将台独与否定三民主义勾连起来。

与三民主义的“官定意识形态”日渐式微相比较，进入90年代之后，孙中山思想与事功的学术研究在台湾仍呈旺盛执着势头。

首先是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主要有：张绪心的《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思想》、林初曜的《孙中山先生容共经纬之研究》、周阳山、周世辅的《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方义》及《中山思想新诠——民权主义与中华民国宪法》、朱谌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孙中山思想》、彭坚波的《孙中山政治发展模式与经验之研究——兼论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困境与策略》、蒋一安的《孙学阐微》、陈建荣的《国父思想：孙中山思想释论与台湾宪政经验》、邵铭煌的《孙中山先生与蒋中正先生》、李云汉的《中国国民党史述》、孙穗芳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庄政的《孙中山的大学生涯》、郭恒钰的《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张益弘的《问学解蔽》。与繁荣时期相比，此一时期孙学著作在数量上并无辉煌可言，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个

事实：良莠不齐的孙学狂热正在逝去，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时代开始来临，孙学研究在台湾正悄然从变态走向常态。

其次，值一些大学三研所纷纷改名，以及国民党有关孙中山研究单位日益不景气之际，一些民间学术团体如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和逸仙文教基金会等对孙中山的研究却日趋活跃。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系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而创设，王云五为首任董事长，现任董事长为刘真。其对孙中山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资助奖励优良学术著作的出版。前面提到的任卓宣的《三民主义新解》和傅启学的《孙中山先生传》均系该基金会奖助出版之著作。近年来，该会工作更趋积极，如不定期举办中山思想研讨会，出版孙中山研究专著，推动出版“中山文库”的计划。从1992年1月起，该会与台北《中央日报》合作，开辟“中山学术论坛”双周专栏，发表了大量研究孙中山的文章。1995年10月，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还编印了《中山先生研究书目》，收录1912年至1995年间中外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研究书籍3731种，学者称便，可与大陆1990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总目》相互印证。

逸仙文教基金会成立较晚，其财力支持者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现任董事长为马树礼。对于孙中山研究，该会的主要工作是促进海峡两岸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1995年1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中山思想学术研讨会”就是由该会主办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学术团体都如同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和逸仙文教基金会般的红火，成立有年的国父遗教研究会，就因人才凋零，财源匮乏，已近于难以为继的局面。至于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如党史会和文化工作会，更是因为人力财力问题，面临“死火”的危险。

第三，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仍持续发展。举其大要者，90年代以来台湾有关孙中山的研讨活动有以下几种

(见表):

研讨会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备注
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1年8月11—15日	台北市圆山大饭店	党史会、国史馆、台北近代史所、“教育部”国立故宫博物院、国史学会(台北)	论文集出版,《中华民国八十周年讨论集》,共四册
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1994年11月19—23日	台北市国立中央图书馆	党史会、国史馆、台北近代史所、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国历史学会	《国父建党革命百年学术讨论集》出版,共四册
中山思想学术研讨会	从1994年起,每年一次	台北市国立国父纪念馆	国立国父纪念馆	
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	1995年1月9—10日	台北市国立中央图书馆	私立东吴大学、逸仙文教基金会	全部论文集由教专及逸仙基金会出版
孙中山先生思想与前途座谈会	1995年11月12日	台北市福华大酒店	《近代中国》杂志社	座谈会记录分发给《近代中国》第110—111期
孙中山先生思想与台湾经验研讨会	1995年11月12日	台北市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山学术基金会	
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	1996年8月24—25日		台湾侨协总会、中研院近代史所	论文已经结集出版
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1998年1月3—6日	国立国父纪念馆	国立国父纪念馆、逸仙文教基金会	

上表所列的八次会议中,以“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最具影响。17位大陆学者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的带领下,应邀出席,实为两岸学术界共同参与的一次空前盛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尽管两岸学者因缺乏交流准备,造成认知上的差距,但是大家都能秉持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讨论,求同存异,为以后的类似研讨会树下了良好的典范。

此一时期台湾“孙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除上述“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外,逸仙文教基金会还于1995年初举办了“中山

先生思想与中国之未来研讨会”,大陆孙学研究专家张磊、黄彦等人应邀与会。另外还有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多次赴大陆举办“孙中山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促进两岸孙学研究之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于台湾大学三研所则更是自1991年起,每年定期举办“国父史迹学术观摩团”,赴澳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访问考察,既促进了两岸孙学交流,又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台湾学术界已普遍比较理性地认识到,过去两岸间的“敌对意识”浓厚,且各自以自居“正统”作为评价历史的“合理化”依据,对孙中山的研究,不免偏向于“稳定政权”与“各自表述”的结果,即均以孙中山为合法政权的“图腾”象征,对孙中山学术价值的斩伤甚大。他们表示要抛弃过去那种对孙中山的肤浅、片面的理解,从更深层次更全面地把握孙中山思想和精神的合理内核,为两岸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寻求一个共同的话题。

进入90年代以来,孙学研究的学术气息日渐浓厚,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信息。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对于孙中山这样首先以政治家面目出现的人物来说,对于台湾这样目前尚以三民主义为官定意识形态的地区来说,孙中山研究要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子是不太现实的。举例来说,近段时间台湾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研究成果特别多,究其原因不仅是台湾民主化为一帮孙学研究者提供了所谓的“灵感”,而且其中也包含着“托孙改制”的意蕴——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寻求民主化的理由和发展轨迹。据李云汉在《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之进展》一文中所附录的159篇论文中,就有24篇是有关民权主义研究的,约占1/7。<sup>②</sup>这种“托孙改制”的作法,其用意不在要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寻求到多少可以直接运用的东西,而是在于把握其中的精神。台湾学者对孙中山思想和事功的学术研究,台湾民众对孙中山形象的消化容纳,更多的是从光大其精神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同大



陆学者的用心是一样的。的确，孙中山作为一位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历史伟人，其精神具有超越时空而不朽的魅力。

①郎裕宪等：《孙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前途座谈会纪录》（上），《近代中国》第110期，1995年12月25日。

②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蒋总统革命思想》第95页。

③蒋介石：《军校学生的求学目的及成功要道》，《蒋总统集》第2册，第1763页。

④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国父全集》1974年版，第1册249页。

⑤蒋介石：《救国教育》，转自《台湾30年》第110页。

⑥包括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张铁君的《国父元学思想发微》、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杨幼炯的《国父的政治学说》、廖枢的《国父社会安全制度研究》、梁寒操的《国父思想与人格》、林桂圃的《国父遗教与蒋总统》、李焕的《国父与青年》、崔垂言的《国父思想申论》、罗刚的《国父思想之研究》、曾虚白的《国父思想对时代的贡献》、胡秋原的《国父思想与时代思潮》、邱有珍的《国父、杜威、马克思》、涂子麟的《国父人口论》、黄少游的《国父五权宪法与现行宪法》、袁世斌的《五权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史振鼎的《国父外交政策》、周开庆的《国父的经济学说》、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杨希震的《国父教育思想》。

⑦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序》，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

⑧⑨⑩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1, 3, 3页，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1976年出版。

⑪程天放等编《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跋》，1975年再版。

⑫香港《星岛日报》1978年5月30日，转自《台湾30年》第297页。

⑬⑭蒋经国：《蒋主席十一大政治报告》，张铁君：《国父思想》，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79年再版，第496—497页。

⑮任卓宣：《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序言》，台北，帕米尔书店1979年版。

⑯邬昆如：《三民主义哲学》第3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⑰⑱李云汉：《台海两岸研究孙中山思想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现状与展望》，《近代中国》第106期，1995年4月。

⑲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跋》，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

⑳宋楚瑜：《国父思想感情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近代中国》第91期，1992年12月1日。

㉑庄政：《改善三民主义课程教学之道》，《中央日报》1996年10月26日。

㉒曾建元：《以台湾为思想本位的三民主义论纲》，《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4期，1997年9月30日版。

㉓参见李云汉：《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之进展》，《近代中国》第114期，1996年8月。

作者张军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所助理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郭秀文

# 从《无心眼集》谈到 澳门文学形象

□黄修己

澳门文学是十分年青的。12年前，澳门文学界提出了塑造“澳门文学形象”的任务。12年后的今天，在澳门文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以为澳门文学的形象已经初步树立起来了。目前，澳门的诗歌、散文都已有了较好的成绩，澳门甚至被称为“诗城”、“诗乡”。相对而言，小说戏剧的成就差一些。这种状况正好与我国古今文学史的“青春期”现象相吻合；因此，不妨说今日澳门文学的形象是“青春期形象”，或曰“青春期形象”。澳门文学来日方长，前程远大。

青春期里的诗和文，对于我们民族文学的发展，曾经产生过深刻的、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古代诗歌的成就，不仅使我国成为真正诗的国度，而且对千百年后的新文学仍然发生着有形的、无形的影响。白话诗取代旧体诗词后，仍然有不少人在写旧诗，创造出好作品。正因如此，我们在讨论澳门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时，就不能不注意剖析当前澳门诗文的特征，从中发现澳门文学的基因，寻找出启示澳门文学未来发展的重要之处。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选择了苇鸣先生的《无心眼集》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自选诗集，相信其中所选的诗是他比较满意的。

这部诗集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又是澳门诗歌中成就较高、有代表性的一部，所以诗集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评论者甚多。苇鸣先生（原名郑炜明）是位全才，以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比较年轻，对澳门文学的未来会有他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无心眼集》在当前澳门文学中有其重要性。

一

《无心眼集》（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当是诗形式的无定格。为此诗集写序的羁

我国的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头的；我国的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头的也是诗歌和散文。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其发展历程与汉文学不尽相同，但其起初阶段往往也有一个诗的时代，诗歌（包括史诗）的成就非常突出。根据这样的历史事实，我把诗歌的繁荣而其它品种尚待发展的时期，叫做文学发展的“青春期”。但是无论哪个民族，只有当小说、戏剧成熟了，才能说整个民族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才进到“成熟期”。

魂认为，此集中的诗“毫无定格的形式”，勇于探索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大拓展了诗体的畛域”，“他那果敢大胆的尝试，揭示了诗的无限可能”。①用“诗无定格”来概括苇鸣诗集的形象，相信已是评论者的共识。他的创作实践不仅仅创造了自己诗艺的独特个性，而且是对传统的诗歌观念的又一阵猛烈的冲击，使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是诗”。这是在新历史背景下一次新的“诗体大解放”的勇敢行动。

“五四”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大胆地提出“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有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②这一主张对推动新诗取代旧诗，起了极大作用。然而，胡适和他的同道、同伴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主张抛弃一切格式，一方面又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并紧接着大讲“语气的自然节奏”、“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③等等。说到底，胡适并未能脱出传统的“韵散之分”的观念；既然诗歌仍然属于韵文的范畴，就必然在音节、韵脚、格律上有所要求。

这在当时和后来许多新诗作者的主张中同样得到体现。如宗白华1920年就提出文字的两种作用：“音乐的作用”和“绘画的作用”，前者就是指“音乐式的节奏与谐和”，欲使新诗“不显韵而有韵，不显格而有格。”④陆志韦还依据心理学原理提出，以强度、长短、高低来制定新诗的格律。到了闻一多、徐志摩，更明确提出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闻一多认为格律虽如镣铐，但戴着镣铐跳舞能跳得好，才是真正的好诗；只有不会跳舞的才责怪镣铐碍事。新格律诗虽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来，但追求格律的实践不断，有九言诗、十一言诗、方块诗、十四行诗等的尝试。人们虽然承认有韵的不一定是诗，但又认为诗必是有韵的。从这种“韵散之分”的观念可以看出，我国格律诗传统与西洋格律诗的双重影响。

但“五四”后在自由体诗占了主导地位条件下，还有另一种主张，即打破一切格律。如郑振铎反对“非韵不为诗”的传统观念，认为“诗的主要条件，决不是韵不韵的问题，有韵的文辞不一定是诗。”“诗的要害，在于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的有无，而决不在于韵的有无。”⑤30年代提倡现代诗的施蛰存，也以不必有韵，不必整齐，作为现代诗的一个特征。稍晚一些写现代诗的郑敏，提出“诗的内在结构”之说，即诗之为诗，不在于文字的、句法的结构，而在于特殊的内在结构，如意念、意象的安排，这才是诗的灵魂。这一类主张，已打破诗必韵文的观念，将诗的本质定在情绪、想象、意象、诗心、“内在结构”之上。

从诗歌观念演变的简单回顾可知，“五四”后在“诗无定格”的观念下已有诗形的自由化、多样化，有散文诗这新品种的诞生。苇鸣先生的诗歌，是沿着这一条历史线索发展而来的。《无心眼集》在艺术上引人瞩目，不在它开创了无定格，而在于它的无定格诗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用艺术实践再次证明了诗可以无定格，而且可以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这些诗如果和那些讲究音韵格律，音乐性很强的优秀诗篇摆在一起，是毫无愧色的。

## 二

且看《无心眼集》中这些置字数、顿数、音尺、音步、行数、韵脚于不顾的诗，这些用格律诗的眼光来看真正是荒诞不经的诗，这些图形诗、数字诗、诗报告、诗政论、诗杂感、诗广告乃至诗的电影，是怎样地充盈着诗情，表现着作者的诗心。

《组诗：镜意象十首》之一的《创世纪》，表现了大幅度跨时空的联想力。诗里表现的是上帝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形象，从而表现出作者对这世界的主体情绪。这首图形诗开头均有“黑暗、哭泣、呻吟”，接连着排成了六行诗，其图形仿佛构成了一幅画。最后一行诗“世界有了形相”，好

比中国画上的一句题词，是点题的。那六行接连不断的“黑暗、哭泣、呻吟”，看上去像倾盆大雨，或如鹅毛大雪，给人以四周空间充满着“黑暗、哭泣、呻吟”之感，还可以联想到泪泉、血雨……。因此，你感到这世界触目惊心。

第二首《之间—献给所有会讲话的人》和第三首《薄》，都是写人际关系的，表现作者对世间险恶，人情淡薄的感叹，同样有图形诗的特征。第二首各用三行表现嘴与嘴、唇与唇、颚与噪声、咽喉与咽喉的关系。最后讲牙齿与牙齿的关系。然而不分行，直溜溜一行共计 27 个字。其实这 27 个字是可以仿照前面的写法排成五行的。但是突然变换了图形，特别突出了牙的作用。牙与牙的争斗比别的部位都要厉害、严重些，所以“以牙还牙”与“以血还血”几乎同义。这就是变换图形的意义。而《薄》讲人情薄如纸，然而，人们对同样是纸的钞票，情感却不薄。诗的最后是：

薄薄的钞票  
更不薄了  
世  
间  
也  
不  
再  
薄  
了

这最后的每行一字诗，恰好连起来像一张薄薄的纸，在半空中飘飘荡荡。从这个图形不难看出作者对世情的讽刺、揶揄之情。

正如韵脚是感情的着落点，诗的音乐性能够制造出某种情调气氛，有力地烘托出情感；图形则通过文字形象来帮助感情的表达，尽管没有一定的格式，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其作用与韵脚是一样的。不过，一是诉诸听觉，一是诉诸视觉。

诗还可以不分段，甚至标点也不用，写成了一个大板块，这时连图形、数字也没有了。如《有关灯塔的情思及其它》、《树之秋后的童话》等，形式的作用几乎全已消解，诗情全靠内容来制作。写于 1988

年的《有关灯塔的情思及其它·后记》注明：“日间澳门总督文礼治于东亚大学毕业典礼上之发言久久不能挥去。”因此诗中的“1865 年以来的一座哲思”，隐喻的是葡萄牙人的统治。那位总督那天说了什么倒不必考证，因为这是诗，作者希望表达的不是实事，而是情感。在描述中夹着写出抒情主人公“怕住在那儿的一群有西洋血统的番狗”，他的情感倾向已经够清楚了。这座象征殖民统治的“古老的灯塔在阴阴嘴笑”，同时“另一座古老的灯塔开始建立。它的工程师也在阴阴嘴笑”，便把 1988 年前后澳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过去、今日、未来的情感波动，既是含蓄、隐晦，又可说是比较明朗地传达出来了。写于同年的《杂记》有相近的情感色彩，用了五段文字，前四段都是描述，从香港立法局选举、澳门基金会人物，到拉萨、老山直到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失利。这使人想起鲁迅的杂文《双十怀古》，那是报纸标题的剪贴，把 1930 年“双十节”前几日的社会新闻拼贴起来，便巧妙地成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批判性的杂文。但苇鸣的《杂记》是诗，其第五段说：“只不过幸好这一切一切都与我无关”。既“与我无关”，又何必唠唠叨叨说上几段，显出了那排遣不开又感无奈的心境和情绪。《双十怀古》的要点是那些实事以及从选择、剪裁中显露的批判。《杂记》的要点则不是实事，而是透过选择、剪裁所表达的心境和情绪——也即诗心，所以它是诗，是诗杂感。

分析苇鸣诗艺术的文章已有不少，故这里只是举例性地解剖几篇，以显其“诗无定格”的特征。必须说明的是，《无心眼集》的社会批判色彩很浓，这在澳门诗歌中比较特殊，集子中相当比重的诗具有讽刺性，不妨就称之为讽刺诗。因此，此集抒情性稍欠。最具抒情性的有《不是》等，却是非常整齐的。

“诗无定格”扩展了诗的形式畛域，但不能说诗只有这一条路，对诗的音乐性的追求，仍然是新诗作者一项不应稍懈的任务。

### 三

“诗无定格”的主张和实践，无论在内地或台港的诗界，都不是新鲜的事；但出现在澳门便特别引人瞩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是苇鸣个人的艺术个性的表现，不仅是《无心眼集》一部诗集的艺术特征，同时也代表着澳门文学的性格和特征。广义的“诗无定格”，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当今澳门文学的“青春期”的特色。就诗而言，澳门诗坛上的旧体诗词还占着一定的比重，然而同时就有《无心眼集》这样非常有先锋性的现代诗，苇明先生自己还把它定位于后现代主义之列。在诗人群中，同一个诗人既可以写旧诗词，又可以写新诗，还可以写出相当不错的现代派诗，可以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于一身。我读过澳门诗人陶里、云力、冯刚毅、江思扬、高戈等的诗，他们既有优秀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也有够得上地道的现代派诗。而且很难给他们找个创作方法上的“转化”、“转折”的时间，所以很难说他们应归入哪一派。本来，澳门诗歌以浪漫抒情诗为主，但也能出现苇鸣这样的社会批判、讽刺性的诗，而且不止他一人。这些充分说明，澳门文学也具有“诗无定格”的特点。

澳门文学这个特点，它的文化性格，是由它的特殊的历史、地理诸条件造成的。同样是祖国南海边的有相同历史命运、操同一方言的香港和澳门，在生活风貌、精

神氛围、人文景观上有多么鲜明的不同啊！澳门在某些方面也许比香港更开放，然而，社会生活又相对显得平静，使它拥有一份难得的自由与潇洒。这使得青春期中澳门文学可以兼收并取，融汇古今中外，不拘一格，自由选择，自由创造。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特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接纳八面来风，抒发一己情怀”。这样的特性，在苇鸣的《无心眼集》，在澳门文学的总体形象中，都可以找到。

以上我对澳门文学特性的表述，半为对其过去、现在的概括，半为对其未来的希望。这个青春少年将有怎样的发展，这一要看澳门文化的历史底蕴，二要看今后现实条件的保持、变化。人们与其从外部用一个什么严格标准来规定澳门文学的前景，不如顺其内部规律，为它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它继续自由自在地生长。我愿为它的第二个12年祝福！

---

① 羁魂《集·眼·心·无——苇鸣诗集〈无心眼集〉序》。

②③ 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

④ 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卷8期，1920年2月出版。

⑤ 郑振铎《论散文诗》，《文学旬刊》第24期，1922年1月出版。

作者黄修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读《爱情与小脚趾》

□ 郑炜明

## 翻译上的一点问题

要是想从小说中更深入地窥探土生葡人的文化特性，必须先梳理一下翻译所带来的阅读上的不便，因为我们不懂葡文的话，就必须倚靠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译本。

书中一些地名与专有名词的翻译，就算不是误译也略嫌不够地道，有些甚至有前后不符的现象。例如：圣·米迦尔墓地或圣·米迦尔公墓或米迦尔墓地，应作圣美基坟场或圣味基坟场或旧西坟场；拉法艾尔医院或圣·拉发艾尔医院，本地话通称白马行医院；中央街应作龙嵩正街或龙嵩街；圣·安东尼教堂前地就作花王堂前地；圣·安东尼教堂或圣·安东尼奥教堂应作圣安多尼堂或花王堂；圣·底亚哥炮台应作圣地牙哥炮台；巴萨尔应称康公庙前地；沙拱应作沙岗；慈善堂应作仁慈堂；雀仔吴应作雀仔园；红窗的街应为红窗门街；琵琶钗应作琵琶仔；蓝、白花瓷器应作青花瓷器；等等。据悉，译者喻慧娟并非澳门人，出现一些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机构似乎并没有安排熟悉澳门的人员来把关，以致翻译效果未能尽善，实在可惜。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难度，除了要熟悉主题外，还应尽量保留原作的真实背景和风貌，还须注意两种语文间的文法和语意差距，不能硬译。例如：

维克托利娜精心照顾著母亲。（第 261 页）

托雷斯大夫，非说我在家不能精心治疗，坚持让我住院。（第 266 页）

（女主角）又去楼梯底下的小隔间取出精心保存的外祖父遗留下来的玻璃药瓶。（第 324 页）

以上三例“精心”，如果头一个译成细心，第二、三个译作专心及小心，是否更恰当？大概是因为葡文用的是同一个词，才突显了硬译的弊病。唯有希望读者能灵活地理解这个中译本，这样才不致糟塌了作者的原意和我们阅读的兴味。

## 怀旧气氛

读飞历奇的《爱情与小脚趾》，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怀旧气氛。作者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带我们回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澳门，探视当年的事事物物，以及当时土生葡人的思想感情。随着故事的发展及主角所到之处，作者总爱把昔日澳门的景物一一重现。这到底是飞历奇刻意铺排的地方色彩，还是他对古老澳门眷恋之情的自然流露？无论如何，若你是一个爱怀旧的读者，类似的描述是不会嫌多的。

那是个“一盏盏煤油灯照亮的屋子”的遥远年代，当年“高楼街上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到现在还剩多少？“警卫队的乐队在华士古花园或加思栏花园的园台上演奏”的排场，你想象得到吗？还有康公庙前地的“庙会”、福隆新街一带的“高级青楼”和在“塔石空地上演出的德国马戏团”、昔日的白马行医院、望厦山脚和龙田村的菜地、绿树成荫的偏僻的青洲、南湾马路一直延至加思栏花园的海岸线、黑沙环斜路尽头“一个接著一个”的海滩……，显然仍在作者和许多老澳门居民的心里萦绕不去，让人怀缅。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飞历奇：在他笔下的怀旧气氛，其实就象征了他个人以至他的族人对澳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除此之外，我

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当然，作者想表达的远不止于怀旧气氛这一点。

### 保守主义的传统

透过飞历奇的小说，我意外地发现，原来20世纪初的人们比我更加讨厌现代文明和抗拒新事物。那时澳门刚要筹建电力公司，人力车也渐渐流行起来，男主角西科起初对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抱有怀疑态度，在侄儿打算乘人力车去求婚时就坚持说：

人力车是有急事的商人用的。办这种重要严肃的事情坐轿子才合适。（第436页）

这类固执在人们坚拒请西医治病方面更为明显，以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作者于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揭露部分人极无知的一面。例如，男主角的姑姑病了，他“正像过去所有的澳门人一样，先是在家里用药治病，但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她请来了中医大夫，江湖医生和草药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有到了病入膏肓时才去医院，最终在医院死去。飞历奇生怕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把同样悲伤的结局安排在女主角的十岁弟弟身上。孩子的父亲自小受纯葡式教育，完全不相信中医，可是专横的（草药）“医生”岳父却坚持以自制的草药给孩子治病，最后也是在病入膏肓时才送医院，自然是回天乏术。

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对中医能治好某些奇难杂症的神奇力量是毫不怀疑的（请注意在作者或土生葡人的概念中，中医大夫、江湖医生和草药师是有分别的），而且故事说到西科的皮肤病最终也有赖于女主角的家传中药秘方而痊愈。作者还借女主角的话来替中国医术辩解：

“（我）非常相信（中医）。只要听到有人嘲笑它，说它是什么无知、迷信或骗人，我就要生气。这些人忘了，这可是有了几千年实践历史的。如果像他们说的那么坏，就不会存在中国人了。”（第275页）

受到保守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上流社会的女孩子就好像只有待嫁的份儿，一旦上了年纪仍待字闺中的话，便得忍受“老

姑娘”这等称号，要不就得到修道院去。在维克托利娜开设一家当时“澳门还未有”的时装缝纫店的初期，“时装店不但没有生意，而且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题材”。作者还补充说：

“（女孩子）接受的基本上是家庭式教育，未成年时留在家里，长大后结婚嫁人。在那个没有任何正经女人外出谋职的年代……只能顺从习俗，不能去干任何工作。”（第256页）

维克托利娜的两位姨母在事业上遭到的障碍更大，她们梦想以一流的烹饪技术来赚钱，但父亲一直不允许她们那样做，他认为：“那些女人是专门侍候他的，是专门负责料理家务事的……如果她们也去挣钱，那他的脸往哪儿搁呢？他绝对不能允许他家的女人们变成独立的女人。”（第220页）当时社会的保守风气，由此可见。对于现代文明和新观念，澳门人（包括土生葡人）的接受速度似乎要比想象中慢得多。也许，我该为当年的澳门人尤其是土生葡人的极端保守态度作一注脚：吃过现代化很大亏的人们也许会特别讨厌新事物。这一点，飞历奇可能不同意，可是他在小说里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鸦片战争的爆发、香港政权的建立以及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迅速发展，……英国人所拥有的炮舰、巡洋舰和双桅帆船具有较好的装备和更高的效益。它们取代了澳门土生葡人速度慢、装备差的三桅船，成了当时中国海上不可抵御的力量。三桅船从此一落千丈。（第10页）

三桅船一向是土生葡人的象征，是他们的荣耀，却无奈地因时移世易而不复当年之勇了。而小说的男主角正是一个三桅船船主家族的后代。这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相继离开澳门，迁移到葡萄牙的新属地去，留下来的便“目睹了澳门的衰败”。

今日常常有人将港澳两地加以比较，认为澳门有所不如。这在许多领域里也许是事实，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其实是两地在对待人生、现实生活等方面态度

上不同的取向而已。要真正了解澳门和澳门人，必须先认识并接受这一点。

### 中国城和基督城

书的封底介绍基督城和中国城“在这个小的空间联结在一起的两个世界”，“既互相疏远又浑然一体”。可是，“两个世界”并非作者的主要话题，其重点描述落在澳门土生葡人的生活圈子上。正如作者所说：“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澳门土生葡人，故事情节也主要是围绕他们展开的。”对中国城的描写只是次要的。然而，土生葡人至少是中上阶层的土生葡人，对华人社会的疏离，倒可以在小说中感受得到。

书中所见，他们的社交场合，不是充满“土生葡人的社会精英、政府的高级官员及外国人士”的聚会，就是与宗教生活有关的如洗礼、婚礼等等的聚会，极少有华人的影子。以男主角西科为例，在未曾落难时就算偶尔与华人社会有接触，都不外是请中国大夫看病或是在福隆新街的花街柳巷寻欢。后来在落难的时候，西科才迫不得已地在华人区住下，“只能在那些渔民、船工及装运工人出入的简陋的饭馆吃饭”，偶尔才去一趟玫瑰围召妓。再后来，与一位粗鲁的中国卖菜妇人同居，为中国酒馆老板献计买了青洲的中国少女作妾，更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染上了烂脚病。若不是潦倒穷困得被基督城的人所厌弃，恐怕他亦不会有在中国城的种种经历。最后，他得到女主角的帮助，才得以摆脱华人区的贫困生活，并重返基督城。当时土生葡人与华人社会之间的距离，可以从中想见。

### 文化归属感

对大部分澳门土生葡人来说，就算是葡萄牙也是十分陌生的。20世纪初期，葡萄牙正在蕴酿推翻帝制的力量，民主派的言论渐渐传到了澳门，从小说中我们看见不同人的不同反应。有些人认同民主派的论点，“对君主制度非常不满，梦想有朝一日能推翻布拉干萨的统治者，挽救葡萄牙，使其兴旺发达，站在进步国家之前列，”（第398页）西科重新振作后居住的公寓的老板便是一例，但他只在澳门住了10年，

算不上土生葡人。另一个极端的人物则是拥护君主制、像西科的叔叔，当叔叔知道西科就住在被称为“革命者的巢穴”的那家公寓时，便要求他立即迁出。他说：

“我不喜欢什么君主派和共和派人们之间的斗争。……弗隆达利亚家族的人从来都忠于陛下的。”（第432页）

而西科，虽然日夕与公寓里向往共和国的人们相见，却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他因为不懂和没有兴趣而从不参加这类政治讨论，当然，这还受了家庭教育的影响。小说写道：

“西科不明白什么是民主派，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民主派是指那些说国王不好的人。因为他听人们这样说的。他对政治一窍不通。过去，他感兴趣的只是有一张床、洗干净的衣服、美味佳肴、漂亮女人、放荡生活、狂欢节、玩耍取乐以及恶作剧。……什么政治和政党是博士们和文人们的事。他的文化水平到不了那么高，也不为此自寻烦恼。他的世界是澳门，葡萄牙的事情离他很遥远，他对那事情非常淡漠。”（第388页）

这段描述十分重要，它不但道出了故事主人翁的心态，而且也是大部分澳门土生葡人政治意识甚至社会意识的写照——葡萄牙在欧洲太遥远了，只有澳门才是他们的世界。

可是，澳门土生葡人对葡国政治的冷淡，并未影响他们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倾向。他们的祖先都来自葡国，而且较早期土生葡人的母系来源很复杂，有来自非洲、印度甚至是东南亚地区的。像西科的老祖母便是有一半南亚血统一半葡国血统的土生葡人，而土生葡人与华人通婚的只属少数。无论如何，拥有葡萄牙血统，是土生葡人与生俱来的事实。他们一般交谈时，多数用澳门土话，这是葡语在澳门发展成的一种独特的方言。飞历奇形容它是“一种极妙的语言——听起来比写出来的更加显得优美动听”，而且“无法摆脱它的诱惑，在本书的不少地方使用了Patois的一

些句子……也引用了澳门土生葡人习惯运用的葡语句型。”（第2页）但那些受过较高等教育的土生葡人，都不忘送子侄去学好纯正的葡语，使他们在社会上较受尊重，像西科的叔叔和女主角的祖父等等。加上他们信奉天主教，宗教习俗都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在语言与宗教两大力量的维系下，澳门土生葡人对葡国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只是长期与华人共处，他们不免会受到华人的生活习惯影响，例如喜欢使用中式家具摆设，抽鸦片和鼻烟，信任中医大夫等等。但这些现象只是土生葡人向象征中国的某些事物单向靠拢的个别例子，严格来说，只属物质上的爱好，算不上是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 阶级观念

在葡萄牙人的传统里，血统和阶级观念似乎比中国人还要强。飞历奇用了大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男女主角的家世和成长背景，不但丰富了故事的内容，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土生葡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西科是从前“无论在中国各港口商业活动中还是在同海盗的斗争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三桅船主弗隆利达利亚家族的直系后代。弗隆达利亚这个姓氏在古老的澳门象征荣誉和财富。成员更竭力掩饰第一代在这块土地落籍的老水手平凡的出身。等到三桅船生意渐渐式微，社会地位也就日渐下降。原来尊贵的姓氏、荣誉和尊严，必须以财富来烘托。即使家道中落，某些家族成员仍保留着自命不凡的傲慢，就像西科的叔叔：

“梦想娶一位南湾的姑娘或者老楞左区的贵族之女为妻。但随着光阴的流逝，他只能违心地与大堂区的一位正直温顺但没有家谱的姑娘结婚。”（第14页）

除了姓氏和财富之外，所住的堂区和家谱也成为量度身份地位的客观标准。西科的母亲，由于本身“笨头笨脑”，又是一位“极其平常”的警员的女儿，两母子便一直受到歧视。西科成了孤儿后，叔叔顾念他是“家族在澳门唯一能传宗接代的人”而

接纳了他。当叔叔知道西科因身体无法适应海上生活而不可能继承家业时，他只归究于西科的另一半血统：“这是他母亲的不良遗传！坏了弗隆达利亚家族的种，真是耻辱！”（第19页）他高傲的性格，使侄子在他面前不敢讲澳门方言（土话）而只能以纯正的葡萄牙语交谈；甚至姐姐去世，他还强忍着眼泪，教导侄儿：“哭，也要拿出弗隆达利亚家庭的尊严和高贵的身份。”（第33页）西科后来变得荒唐乖戾，叔叔就嫌他丢尽家族的脸而索性弃之不顾。直到西科认识了女主角，爱情的力量令他回复自信，辗转间才得到叔叔的原谅。叔叔好意劝他向女主角求婚（其实是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侄媳妇）时，又流露出一贯的血统意识：

“当然，她不可能有弗隆达利亚家族的那种血缘。她继承了维达尔家族（即女主角父家）的遗传。可帕蒂拉家族（即女主角母家）的血缘是劣等的。……不过，维托利娜·维达尔继承的全是她父亲的东西，是她父亲表现良好的一面。”（第428页）看来，飞历奇是刻意塑造一个固执、保守和对自己的尊贵“身份优越感”还要厉害十倍的人物。他是“住在美丽街上的著名大律师”，他和家人极力反对儿子依波利多（即维克托利娜的父亲）与“澳门最低下不过”的帕蒂拉一家来往。后来儿子被揭发与帕蒂拉家的三小姐有肉体关系，他便为着面子而断绝父子关系。就算维克托利娜和弟弟小保罗相继出生，祖父家也没有人来参加洗礼；甚至是小保罗去世，他们依然支持不闻不问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竟支持了30多年，连作者后来也禁不住要让老人自责一番：

“这类伤人的傲慢已经够了！就因为他们，我失去了儿子，永远没有能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值得吗？如果我们当时冷静地处理，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大大的不同。”（第441页）

至于维克利娜的外祖父帕蒂拉，妄想女儿嫁入豪门便可提高自家的地位；他的

攀附权贵、亟欲进身贵族阶级的心态，与其亲家的阶级观念实际上是并无二致的。

全书反映出当时土生葡人普遍严重存在的阶级观念。也许，唯一例外的只是心地极好的女主角和性情淡薄的教父贡萨罗。

### 宗教信仰

澳门土生葡人的社会生活及习俗和他们宗教信仰是息息相关的。葡萄牙人的传统信奉天主教，他们在这块殖民地上的子民也不例外。单看澳门被冠以“基督城”这个名字即可见一斑。

和一般天主教徒一样，土生葡人的孩子刚出世不久便要接受洗礼，以至领第一顿圣餐，都是社群中的大事，往往在弥撒之后开茶会庆祝。至于婚葬之礼，当然要在教堂举行了。很多信徒都在家里设立祭台，以洋烛和鲜花供奉。星期天到教堂去做礼拜自然少不了。这些宗教生活，在小说中常有提及。

在故事中，天主不但是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信仰，教会更时常提供各种帮助。例如办学校、医院，组织慈善活动等等。作者时常提到的圣若瑟神学院、圣罗撒女子学校、白马行医院、仁慈堂、圣味基坟场和其它一些慈善服务机构，都是由教会开办的。除此之外，教区的神父也是落难羔羊的依靠。西科流落中国城的时候，圣安多尼堂的赛拉芬神父便是（除了女主角之外）基督城里唯一曾帮助他舒缓困境的人。对神父来说，“尽管对面前的这个人感到非常失望，可也不能连拯救其灵魂的信心都没有”（第111页）。

天主教的教规，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澳门土生葡人的传统道德标准。仁慈、善良和虔诚的人往往受人尊敬。好象西科那样荒唐、恶作剧以至伤害别人声誉的人，便受到基督城的唾弃。维克托利娜应当不同，她是教区长眼中的虔诚教徒；因此，当她留西科在家治病而遭受流言蜚语困扰时，教区长便亲往了解情况。据作者叙述，那时的澳门，“人们都要遵守一定的礼教，按照一定的清规戒律。”（第358页）而神父

或教区长，便是为背离清规礼教的人洁净心灵而工作的。

其实，这些道德规范早已深入土生葡人的民心，社群也成了庞大的监察力量。只要你做了一些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事，便会挨上传遍基督城的指责。像维克托利娜的父亲，为了要脱离岳父一家的精神折磨而撇下妻子和女儿，便受到人们的非议，他的旧同学亦即西科的叔叔更“对他违背基督精神的做法不能理解。”（第428页）无疑，西科的叔叔在小说中代表卫道之士，他要求“尊重声誉、尊重神圣的婚姻、尊重人的贞洁，”（第430页）这不同样是他所信仰的宗教对信众们的要求吗？

### 余论

飞历奇以他对澳门浓厚的感情为基础，以纯熟的写实技巧，细致地描写了故事中几乎每一个细节，更利用生动而富真实感的对白来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总的来说，他写出了当时的一些土生葡人现实的生命力。

《爱情与小脚趾》的价值又不止于文学。它切实地保留了极为丰富的20世纪初澳门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土生葡人社群的生活、风俗和习惯的资料，可供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事实上，像《爱情与小脚趾》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可作多角度研究的。飞历奇在小说开头部分曾说过：

“这是一部小说，但取材于一则古老的故事。在我的孩提时代，奶奶的旧宅院里常常举行传统的，让人怀旧的晚会。那则古老的故事，便是我在某个晚会上从人们饶有风趣的叙说中听来的。”（第1页）

可见，故事的真实性极高——虽然不能就把它当成是一部反映历史事实的著作，但小说里的一些背景资料，绝对是珍贵和可信的。若进一步将同类作品作综合研究，所归纳出的史料必会更全面和可靠。

作者郑炜明，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古代小说中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及民俗价值

□ 纪德君

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与民俗的关系甚为密切，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不仅为故事、人物提供了富于特定色彩和情调的环境氛围，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生活实感，而且还保存了不少生动、可感的民俗学资料。研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文本，又可以增进我们对彼时彼地风俗人情的认识 and 了解。有鉴于此，本文选取被通俗小说描写最多的民俗——元宵灯节，作为这一研究的起点。

在各种题材类型的通俗小说中，我们几乎都能发现一些善于围绕元宵灯节来作文章的长篇短什，如英雄传奇《水浒传》、《水浒后传》、《隋史遗文》、《禅真遗史》，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话本小说“三言”、《鼓掌绝尘》，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艳情小说《灯月缘》、《春灯谜史》等。这些小说为何对元宵灯节情有独钟呢？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即元宵灯节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日常生活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但元宵灯节却大不相同，它灯火辉煌，百戏竞陈，惊奇刺激，热闹非凡。所以，自唐代开设灯节以来，人们一直对之满怀热情和喜爱，并用多姿多彩的笔墨为它留下了生动的剪影。

如唐张萧远《观灯》诗即云长安灯市是“十万人家火独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生香。”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亦云：“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闻。”宋曾巩《将行陪贰车观灯》云

汴京元宵是“行歌红粉满城欢”。秦观的《念奴娇》亦云：“花灯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一些宋人笔记对此更有动人的记述，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说，正月十五，汴京不仅华灯火树，争奇斗艳，而且“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南渡之后，也未曾因偏安局势而影响灯节娱乐。如周密《武林旧事》载，临安元宵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而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辛弃疾词《青玉案·元宵》亦赞云：“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一夜鱼龙舞。”可见，元宵灯节确实是人们一年之中难得一次的狂欢节日，是人们精神娱乐生活的极重要组成部分，越办越兴旺。如唐代的元宵灯节是三夜灯，北宋增加至五夜，南宋是六夜，而明朝则延长至十夜。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元宵放灯”条，曾引录了明成祖于永乐七年下达的圣旨：“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放假……永为定例。”因为有此定例，明时的元宵灯火就较前代更为繁盛。如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八记龙山元宵放灯盛况云：“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连小地方都如此热闹，大都市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宵灯节既然是唐宋以降人们所欣见乐逢的盛大节日，而这个节日又十分热闹、刺激，颇多新奇有趣的人物、故事，那么，作为以娱众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小说从元宵

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感性素材，营造充满生气的艺术世界，就自在情理之中了。而从接受效果上说，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首先便为虚构的人物、故事设置了一个让读者大众备感亲切、可近的民俗文化氛围，从而为更好地启动故事情节，猎取读者的注意和兴趣，增强他们对人物、故事的信任感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其次，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还在于它能为故事情节的产生、发展提供真实、可信的逻辑依据。由于元宵灯节各城皆“通宵不禁”，任从官民游赏玩乐，所以各种社会禁律便都暂时退居到了第二位，就连平时受礼教羁缚最严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们，也都获得了走桥步月的机会。如明张瀚《松窗梦语》在叙及杭州灯节时即云，城里“灯火相连，金鼓相闻，一时男女塞途，竞相追逐”。张岱《陶庵梦忆》卷八亦云，龙山灯市上“拾妇女鞋挂树上，如秋叶”；又云“有美妇六七人买酒”，“可四斗许，出袖中瓜果，顷刻罄尽而去”。这足证灯节中的妇女们也与男子一样沉醉在酒神的狂欢里。或许正因灯节里青年男女们接触比较自由吧，所以各种风流韵事也才会应运而生；而小说家也为此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和结构故事情节的现实依据。如小说《隋史遗文》第二十二回对灯节中男女心态、行为的传神摹绘。它说，长安城中的妇女在灯节来临之际，一个个“心神荡漾，一双脚趾头只管向外生”，“有衣服首饰的，妆扮了出来卖俏，没有的东央西借，要出来走桥步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婆，赵氏亲娘约了钱铺妈妈，嬉嬉哈哈，如痴如醉，郁捺不住”；而王孙公子、游侠少年则“都在灯市里穿来插去，寻香哄气，追踪觅影，调情绰趣。那些风骚妇女，明知有此种光景，在家坐得不耐烦，又喜欢出来布施，与少年们抠挖，结识得两个清标的汉子，也趁此一番机会，就是被人干打哄，寡称赞，也好燥脾”。《喻世明言》卷二十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的人话诗亦云：“多少王孙并少女，绮罗丛里竞怀春。”小说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现实逻辑来生

发并发展故事情节的。如怀春的刘素香出外游灯节时就已经备好了情诗藏在同心方胜里，一遇到可意的郎君张舜美，就急忙丢给了他，结果引出了一段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鼓掌绝尘》中的杜开先与相府侍妾韩玉姿两情相悦，无由相聚，后来也是借元宵灯节得遂良缘的。《灯月缘》中的才子楚玉与蕙娘、翠薇、娇凤等几个美女的奇遇，也都发生在元宵灯夜。而《百家公案》第四十八回中的美妇刘都赛，则因观灯为赵王逼迫行奸，引出了包公断案斩赵王的故事。第六十二回王月英与郭华也因元宵幽会，引出了郭吞绣鞋，死而复生的风流公案。《红楼梦》中的英莲，也是在元夕看灯时被人抱走的；而“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也是借了元妃元宵节省亲这个由头建立起来的。可见，小说家们是多么善于利用元宵灯节来生发故事情节。

不仅如此，一些英雄传奇小说家还特别爱借元宵灯节这一特定的叙事时空，用以营造人物命运突转的契机，或藉以铺写精彩纷呈的攻城夺池斗争。如《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在清风镇看灯被抓，就直接导致了大闹青州道，率众上梁山的激烈行动，使他在造反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第六十六回梁山好汉也正是利用元宵灯节混入大名府，里应外合，打破城池，救出卢俊义的。可以说，没有对元宵灯节的描绘、渲染，《水浒传》的精彩程度肯定会受到某些影响。

第三，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更在于它能为人物思想性格的展示，创设极为有利的条件。例如《金瓶梅》第十五回，就借狮子楼赏灯，把潘金莲的某些性格侧面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撙着，显他那遍地金袄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

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虾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刮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个不了。

这段文字即活画出潘金莲轻佻、虚荣，却又不乏顽皮、可爱的个性风采。它使我们看出，潘金莲也有她爱美、爱生活和天真、烂漫的一面，并非生来就那么淫邪无耻，她的堕落是由那个社会直接造成的。因此，这样的描写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把握人物性格就不无启迪意义。又如第二十四回写“天上元宵，人间灯夕”之日，西门庆家饮合欢酒，宋惠莲忘了自己的身份，“仗着西门庆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里”，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小厮指手划脚；出门“走百病”，她又对着陈经济，一回叫：“姑夫，你放个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个元宵炮燎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掉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来右去，只和经济嘲戏。宋惠莲这种不知高低、轻浮、放浪的性格，正是借元宵灯火的映照，才纤毫毕现的，而这也为她后来遭人打击、妒害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高明的作家是很善于将灯节的描绘和人物性格的摹画融合而为一个交流感应的整体的。惟其如此，人物形象也才显得那么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第四，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有时还隐伏着人物性格发展的现实动因，一旦遇到外界因素的有力触发，人物性格便会发生激变，并在刹那间放射出耀眼的光华。如《隋史遗文》中的秦叔宝本来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可在元宵节观灯时，目睹花花太岁宇文惠及强抢民女，不禁义愤填膺，拔铜打得宇文“脑浆迸万朵桃花”，初步显示了他嫉恶如仇的侠烈气概。有时候，小说对灯节习俗的描写，还可以起到预示人

物命运归宿的作用。如《红楼梦》第22回写贾府元宵节制灯谜，其中元春的灯谜“炮竹”，就是她得宠和短寿的形象写照；探春的灯谜“风筝”，则暗示了她将来会远嫁不归；惜春的灯谜“海灯”，隐寓了她以后出家为尼的归宿；宝钗的灯谜“更香”，也隐含了她以后孤凄寡居的结局。

第五，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还有助于揭示人物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由小及大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习。如《金瓶梅》即通过西门庆家大张旗鼓闹元宵的描写，凸现了他铺张侈糜、纵情声色的基本生活特征；而灯市中那光怪陆离的花灯、璀璨绚丽的烟火、喧嚣繁闹的笙箫歌舞、饮酒作乐的红男绿女，形象地表露了明代中晚期“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时代风尚。至于《红楼梦》写贾府为迎接元妃元宵节省亲，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大张灯火，极尽奢华，也同样表现了封建贵族阶级宁可走向败落，也决不放弃其奢侈浮华生活的本质特点。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小说中的元宵灯节描写是具有多方面的叙事功能和审美意义的，理应得到我们的研究和重视。

## 二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民俗都是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之中的，都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元宵灯节亦如此。它的设立，大约始于唐代，据讲史平话《宣和遗事》上讲：“盖自唐元宗开元年间，谓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上元时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从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灯烛。至宋朝开宝年间，有两浙钱王献了两夜浙灯，展了十七八两夜，谓之五夜元宵。”这是民间的说法。按《唐书·严挺之传》，知唐设灯节，缘起于睿宗之好音律。这说明小说所言并非无据。至于北宋何以将灯节延至五夜，洪迈《容斋三笔》卷一曾有考辨：“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寓义安，令开封

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但洪氏所论，似也不够审慎，焉知“圣上”不是因钱氏献灯，又加上天下初定，而触起延长灯节之念的呢？但是，不管出于何因，灯节的设立和宗旨，似乎都在于庆祝天下太平无事，统治者与民同乐，所以元宵灯节实际上是国泰民安的外在表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和平、安乐的民族心理；而这也是所有写元宵灯节的小说，都极力称赞“太平年岁，元宵佳节，与民同乐”的根本原因。每当元宵灯节到来之际，整个朝野上下都要闹花灯、放烟火、走百病、办社火、吃元宵、猜灯谜……，举行各种各样的歌舞娱乐活动。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递相沿袭的民族传统。所以通俗小说所描写的元宵灯节，也都大致相同。

不过，细察起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乃至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元宵灯节习俗，还是各有特点的。比如北宋时汴京的元宵灯节就有声有色，不少小说都对之津津乐道，其中尤以宋元话本《宣和遗事》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所记最为生动详尽。其大致情形是：皇宫大内前，自冬至起，即开始架造鳌山（灯山）。山高16丈，阔365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24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个龙口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街照；正当中立一牌，长3.6丈，阔2.4丈，金书8个大字：“宣和綵山，与民同乐。”正月初五至二十，禁城城门不闭。十四这一天，徽宗幸五岳观，辇前打红纱贴金灯笼二百对，兼以琉璃玉柱掌扇，至晚还内。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唱《随竿媚》，御辇旋转一周，谓之鹑鸽旋。接着驾登宣德楼，游人皆赴露台下，旨令杨戩等贵官撒金钱银钱，让百姓争抢。十五夜，又令光禄寺于端门下以金碗赐御酒，凡看灯百姓，不问富贵贫贱，人均一杯。十六晨，帝又登楼卷帘，着红袍小帽独坐，让百姓瞻其仪表。彼时，王孙公子皆“子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裹肚，妆着神仙；佳人都是弹肩冠儿，插禁苑瑶花”，才子佳人

手儿厮挽，有五千来对。除了看灯，便是歌舞笙箫，彻夜狂欢。话本《戒指儿记》，写一年少郎君阮华，就集一伙兄弟，在灯夜歌笑赏灯，直吹唱到深夜方散。像这些描写，多是《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宋人笔记所不曾细载的，其史料价值不言自明。而小说《水浒传》则较为具体地记载了彼时地方市镇闹元宵的盛况，这一点更是宋人笔记所阙而不载的。如它说清风镇人闹元宵，大家先是凑钱，然后去土地大王庙前扎个小鳌山，山虽不大，却也挂有五七百盏灯，有金莲、玉梅、芙蓉、牡丹等各色花灯。花灯影里，庙门内外，皆是村歌社火，如舞鲍老等。而大名府就更加热闹了，灯节到来时，富豪之家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里之外，更有客商年年拿灯到城里卖。诸路做生意的，云屯雾集。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鳌山上挂灯上千余盏，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耍和尚的，踏竹马的，舞鲍老的，唱词曲的，演傀儡戏的……，终日鼓乐喧天，笙歌聒耳。而金人领地燕山的元宵灯节，则又别具一番风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上说是“胡笳聒耳”，“汉儿谁负一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可见，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元宵灯节，是各臻其妙，相映而生辉。

与宋代相比，明代的元宵灯节更长，前后达十天。灯之品类，也更为繁多。《水浒传》在写宋代的花灯时，列举的灯都是以花作为造型的，这是宋代的特点。而《金瓶梅》所写的明代花灯，除了以花为造型以外，还有动物造型的，如猿猴灯、白象灯；以人为造型的，如秀才灯、师婆灯；以人物故事为造型的，如和尚灯寓月明和尚度柳翠故事，刘海灯寓刘海戏金蟾故事，钟馗灯寓钟馗嫁妹故事。并且，花灯的摆放似也有讲究。如《隋史遗文》介绍说，京城兵部衙门挂的灯都是兽灯，有獬豸灯、狮子灯、青熊灯、猛虎灯、锦豹灯、骆驼灯等；而相府门口挂的则是各色鸟灯，有仙鹤灯、锦鸡灯、黄鹂灯、孔雀灯、鸚鵡

灯等。我们在前面说过，灯节是自唐时才设立的，因此《隋史遗文》所写的实际上是明代的灯市胜景。《禅真逸史》有关灯节的描写，也是如此。此书第五回还具体地写了妙相寺的一所船灯（寓普渡众生之意），说船面五彩油漆，外边俱雕小小人物，撑篙驾橹，掌号执旗，吹打乐器，枪刀剑戟悉具，四周悬挂结彩珠灯，船里供养伽蓝神像，两边排列从人。船灯之前，又结一座鳌山，灯上将绢帛结成多般故事，“张异域之屏围，挂名人之手笔”，可谓“行行技艺尽标能，物物雕镂俱极巧”，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明代手工制灯技艺的精湛、高明与发达。如果我们以之对读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四所记述的“世美堂灯”和明徐燉《徐氏笔精》卷四所记的“墨纱灯”、卷八所记的“料丝灯”，则可知小说所写并不夸张。

明代的花灯不仅穷工极巧，而且还配有灯词。这里所说的灯词主要不是指写在灯上的，而是指人们在赏灯时，歌之以娱情的。如《金瓶梅》第二十四回，金莲等人在赏灯时，韩嫂儿就唱了一首《耍孩儿》（太平时节元宵夜）。第四十二回西门庆同应伯爵饮酒赏灯时，乐工李铭、吴惠也在席前弹唱了一套灯词《双调·新水令》。兹略举一段，其词云：“花灯儿两边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则见绣带风飘，宝盖微摇，鳌山上灯光照耀，剪春蛾头上挑。”由此可以想见，明代灯节吟唱灯词之风的盛行。

明代的灯节自然也少不了社火（指歌舞、百戏、杂耍之类的娱乐活动），而且社火的名堂也较宋时为多，仅《隋史遗文》中描写的就有踢气毬、跳鬼判、踏高竿、舞翠盘、骑骆驼、斗龙灯、走马撮戏、舞枪弄棒、做鬼妆神等等。而五彩斑斓的烟火，则更为灯节平添了几多热烈、欢闹的

气氛。如《金瓶梅》第四十二回，西门庆家放的烟火就颇为奇丽壮观，什么紫葡萄、霸王鞭、地老鼠、黄烟儿、一丈菊、火梨花、八仙过海、七圣降妖、五鬼闹判、十面埋伏等等，不仅名堂不同，声响各异，而且奇彩纷呈，变幻多姿，真令人叹为观止！这在那些描写宋代灯节的小说当中是很少见到的。当然，这并非说宋代灯夜不放烟火，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宋代的高门大户也是放烟火的，并且那时还有专门从事烟火制作和施放的工匠，可惜所言未详，使人难以窥测其工艺水平和施放胜景。不过，推想起来，宋代放烟火似还不够普遍和壮观，否则小说不会只详写灯市而于烟火不涉一语的。明代的文人笔记如《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等，也曾谈及当时的烟火施放情况，但均不及《金瓶梅》所写形象具体，因此《金瓶梅》实际上也为今人考察明代的烟火技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走百病”也是元宵灯节的一种习俗，宋元小说、笔记较少提及。《金瓶梅》上说，正月十六之夜，潘金莲、孟玉楼、宋惠莲等跟着众人走百病，月色之下，恍如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隋史遗文》第二十二回也提到婉儿母女走百病。按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或云终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帝京景物略》亦云：“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两书所言与小说描写基本吻合，此又为通俗小说具有民俗学参考价值之一证。

作者纪德君，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5104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 程贤章长篇小说与客家文化传统

□陈利群

20年来,程贤章创作、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作于90年代的《云彩国》、《神仙·老虎·狗》、《青春无悔》、《围龙》,作于80年代的《彩色的大地》、《胭脂河》,作于70年代的《樟田河》。除个别外,这批小说以几近同步的姿态反映时代生活,演奏时代旋律,以近距离、大跨度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为世人称道。

许多评论文章在论述“小说”的特色时,都提到了它们的客家文化内涵,只是未作深究,多限于三言两语,或停留于民俗风情、饮食服饰、方言俚语等方面的一些相对表面的层次上。这不能不说是忽略。

按古远清的看法,程贤章的长篇小说乃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当代文坛唯一影响较大的“典型的客家文学”。所谓客家文学,是“在中国客家族群生活的土地上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学”。客家文学的重要标志是“客家意识”和“客家生活题材”。他曾不无遗憾地说,“在大陆,典型的客家作品(含评论)是很难找到的”“属于典型客家文学的民间流传的客家民俗故事和民间文人创作的客家山歌及山歌剧,在大陆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地位,而“现今活跃在岭南文坛的当代作家程贤章的作品是个例外。”<sup>①</sup>程贤章是正宗的客家梅县人,几十年来一直浸润在客家文化氛围中。他的长篇小说题材均取自客家区域生活,作品的深层蕴含着丰富的客家文化。因此,离开这一特定之“根”,似乎很难更深刻、全面、立体地认识、把握他的作品。而文学与文化的渊源、血缘关系,又注定了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因而,本文拟从民族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文化核心问题的视角出发,对程贤章长篇小说的某些客家

文化特点作一粗略的扫描。

一、其小说以紧贴现实、把握时代、忧国忧民为特征的、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客家民系爱国保族传统民族意识的当代传承与阐释。

“近距离地表现生活,是程贤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时代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极为强烈,揭示的社会矛盾,反映的生活情景几乎与生活原态同步。”<sup>②</sup>广东省长卢瑞华一语道出了广大读者普遍而突出的印象。其小说的选材、思想内容,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是源于作家心灵深处岩溶的喷发,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其特征特别体现在以下两点:

1、观照角度。作家的观照角度常常是意识、观念、思想、情感诸种因素合力的指向。他的小说着眼于大范围、大背景,截取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交汇点上的现实生活,抓住促进社会发展的矛盾、事件挥洒笔墨。《神仙·老虎·狗》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腾飞为背景,正面描述了客家人聚居的A市振兴经济、起步发展之艰辛而壮阔的一幕,展示了时代生活的画卷,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整部作品贯穿着“改革开放中工业发展与农业基础、超前意识与传统观念、现实问题、年轻知识分子与老革命、思想路线方针与个人品德干劲”等尖锐的时代矛盾的交织、绞扭。《云彩国》写90年代初期粤东某地级市属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在建设发展中所遇到的风风雨雨,展示了改革开放特定阶段的时代风云,和一代人物的风采际遇。作品紧扣“有专业知识、懂市场经济规律的年轻一代与有光荣传统、有奉

献精神而缺专业知识，难于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老干部”、“不同社会体制下青年之间的价值观念”等矛盾冲突，作为情节展开的内驱力。《彩色的大地》写改革开放初期，个别富裕起来的客家农民在精神上走向堕落的故事。作品以“显露的经济发展端倪与潜伏的精神文明危机”的矛盾，向社会发出预警。《青春无悔》，通过50年代畸型的政治与婚姻爱情的尖锐冲突，从某个侧面深刻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本质特征。《樟田河》写70年代初粤东某县委书记带领群众移河造田。那独具时代特征的两种观念的斗争，记录了一段历史的真实……作品这样切中时代脉搏，宏观审视社会，必定要求作家首先应具备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宽广胸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深刻的思想、敏锐的眼光。

2、情绪情感。现代心理美学指出，作品的符号或意象活动附丽着主体的情绪情感，艺术冲动受着创作心理中情绪情感定势的控制和支配。托尔斯泰说，艺术不过是艺术家把自己心中曾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借助种种媒介表达出来。<sup>③</sup>在程贤章的小说中，作家的情绪情感甚为强烈、鲜明。其总体特征可归结为激越、热切、爽直、坦露。无论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命运安排方面，还是在情节构思、价值取向、观念评判等方面，作家的情绪情感涌动都极具声色。小说的人物类型非常明晰。《云》的璨烂，很明显就是有专业知识、懂市场经济规律、有理想、有责任心的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化身；疆域，一望而知是那种有光荣传统、富于奉献精神，可惜欠缺专业理论，不熟悉市场经济规律的老干部形象之代表。其小说的人物，性格是疏朗的，命运也不难推测，理念、漫画色彩较浓。比如，所有人物的姓名都寓意直白。龙种，真龙之子；诚，希望之所在；牛皋（羔），牛犊也，古典传奇小说中的英雄，冲劲中夹着鲁莽，非完美的理想；谷米，活命的食粮，此人只认“以粮为纲”（《神仙·老虎·狗》）。借助名字，作家向读者提示各色人物的方方面面：社会角色、性格命运、作

家的价值评判等。塑造人物形象时，作家较急切地表白、渲泄自己的主观意识、情绪情感。小说由此显露出一种焦灼感。这正是作家对祖国、民族前途命运忧患意识的一种个性化表达。爱之愈深、情之愈切。当前文坛虽不时兴“政治色彩鲜明”之类的提法，但文学还是无法真正远离时代和政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文学的基本主题。充满赤诚的急切之情增强了其小说的思想震撼力和某种艺术感染力。诚然，在小说这种文体中，作家一般不便直抒胸臆。主体意识、情感如何才能表达得更具艺术效果，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作家对时代、现实高潮的热情，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曾令评论家们惊讶和迷惑不解。对此，展锋见解独到，认为程贤章“的视点是人们所关切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他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能较好地驾驭烙印在他身上的古老民族的优良传统……”<sup>④</sup>其实，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特色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天资、家庭、经历、时代、民族等等。程贤章的成长过程，经历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特定历史阶段，长时期的记者生涯形成了某种职业敏感；长期到区、县、市领导部门挂职。几十年身处国家政治生活的激流中，磨炼了他对政治大事的敏锐触角与眼光，培养了他从宏观着眼思考社会问题的思维方法。

深一层看，作家为什么能生成这些体验，则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文化的底蕴。现代心理美学认为，艺术家的体验生成，一是艺术家在特定时期与所处的外部环境联系，一是与艺术家个人经历中早期经历、教育所形成的心理反应图式相联系，“童年经验生成并建构了艺术家一生体验的意向结构，”<sup>⑤</sup>它引导和制约着作家的思维、情感、言行、认知方式、注意向度等。程贤章受父母的影响很深，在浸润着客家传统的文化氛围中渡过了自己的童年。六岁时他随父母从南洋回到老家梅县定居。经商的父亲骨子里是个典型的文人，人生

充满传奇色彩。父亲爱好文学，爱看书报，关心国事时局，相当崇拜抗日将领。抗战时曾收藏国民党党旗，预备抗战胜利时悬挂。后来看到国民党屡战屡败，一气之下，将旗子做了小孩的尿布。母亲虽一字不识，却很会讲故事，语言极生动、丰富。她秉承客家人的传统，教育孩子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严格地督促儿子读书。程贤章 11 岁那年，曾为一顿饱饭卖给邻人，几天后实在受不了虐待才跑回家来。少年时代令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屈辱，连同以父母为直接媒介的客家文化，深深地渗入程贤章的心灵之中，对他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既是主体自身的体验，同时亦是群体意识、传统观念、文化内涵的折射与张扬。作为汉民族的一支，客家民系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继承了华夏民族的爱国保族传统，并赋予其独特的民系、地域色彩。经过代代相传，这种意识逐渐积淀、升华为客家人民族意识中的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具体的内涵。从历史上的反清复明，到近、现代的抗日救国，都可见到客家人爱国保族传统的时代表现。客家地理环境恶劣，造成他们以读书求仕为最大出路的传统。对于读书做官、服务朝政的人来说，国家的兴衰与个人的命运更为直接相关。客家地区艰苦的生活，严峻的生存问题，迫使客家人多方寻求出路，格外关注国计民生。史实昭示，近代中国以降，每次社会变革都涌现出大批客籍贤哲。洪秀全发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丁日昌鼎力倡导民族兵工事业，陈宝箴积极推行维新改革措施，黄遵宪致力思想启蒙，丘逢甲奋起抗击日寇，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更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廖仲恺、叶剑英等，仁人志士难计其数。客家先贤的事迹、精神激励着后人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力抗争。这样看来，其小说强烈的政治意识乃是文化传统在当代文学作品的展现和承传。爱国保族精神在程贤章的创作中突出地体现为高度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

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小说的客家文化特色，不仅在于它们写了客家人的饮食服饰、风土人情，更主要的还在于它折射、张扬了客家人文精神中的某些本质。

二、“小说”将知识分子定位于社会变革之谋士与导演的价值取向，乃客家民系崇文重教传统的潜在记录和时代折射。

关于读书人的价值观，是客家人独特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出读书人，崇文重教是他们的传统。作于 90 年代初期的《神》《云》是程贤章自己较满意的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它们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被赋予“社会变革的谋士与导演”的角色。龙种（《神》）的身份是当地报社记者，但实际上是 A 市代市长的智囊人物、镜子和护身符，是作家心目中领导干部的理想化身。代市长掌管全局却重工轻农，对城乡建设布局发出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而龙种却很清楚（第五章）；在洪水袭击 A 市的紧急关头，代市长慌乱了，工作车不知该开向何方。龙种却早有预料，跑到代市长的车上指挥若定。关键时刻，龙种总是略胜一筹。两人甚至在爱情观上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见贪图美色的浅薄，后者显爱情至上的圣洁。牛、龙关系意味着作家对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作用的充分肯定，显示出布衣书生之依附政权有利于实现其最大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这个观念不仅延续到《云》，而且进一步发展。如果说，《神》的知识分子与依附对象尚为两相映衬，至《云》则两种形象已溶为一体。主人公璨烂为经济系金融专业高材生，经济开发区书记和主任，集专业知识与领导权力于一身，更兼品德、才华、相貌的超群脱俗，其引人注目，前景辉煌，自不待言。这体现了作家意识中知识分子的理想模式。在开发区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中，璨烂的制胜法宝源于他在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生发的睿智、胆略和韧劲。另一人物疆域，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六县一区、300 多万人的党委书记。吃过糠、扛过枪。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驾航因缺乏必要的知识

而显得观念陈旧，力不从心。在行政关系上，“无论璨烂走得有多远，都是疆域麾下的主要智囊人物”。他们实际上代表着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两种势力，是“两匹不太能合力驾辕的马”。璨烂身为“诸侯”、学生，区区经济开发区头目，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地级市委书记指指点点。在该市的发展进程中，璨烂肩负着救世主式的使命。这些表明了作家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判断。在其特别急切、鲜明的态度中，隐藏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90年代的中国社会，对知识的呼唤吁求更加迫切，程贤章的小说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地位变化的轨迹。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员”，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路。作家本人在文革中曾受非人待遇。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结，凝聚了作家的情感、思考，寄托着一种美好的理想，还潜藏着客家民系文化教育发达的社会传统和崇文重教的社会心理。

客家人身居山区，自然条件、生存环境险恶，最好的出路惟有读书。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方渐（闽人）知梅州，曾说“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客家人聚居的中心梅州，“自古学风浓郁，人文极盛，……登科榜首者不胜枚举”。⑥客家民谚曰“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童谣亦唱“蟾蜍婆，咯咯咯。唔（不）读书，么（无）老婆。”客家地区的文教事业，在不同的时期，地方其规模、水平或许很不相同，但读书为上，崇文重教的社会心理却十分普遍、强烈、持久地驻存于客家人的意识之中，甚至化而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程贤章儿时就是在母亲无言的威严监护下，饿着肚子，凑着松脂火灯盏读书的。由于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心理内化为作家的一种“读书人情结”，其作品透露出该传统的神髓便不足为奇。这样看来，“小说”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理想人生模式之文化渊源，实乃客家民系崇文重教传统的文学潜在记录和时代折射。

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三方面的意义：

1、透过其小说中某些看似不太合理的情节及主体意识较为外露的叙述，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作家，更准确地理解、把握作品，进而窥见客家独特文化传统之一斑，感受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神韵。

2、他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潜在而相对系统、典型地描述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心理，并不自觉地将其理想化、模式化，这不仅对客家文学是个贡献，实际上还对我国地域文学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3、其文化蕴涵成为人们了解客家文化的历史传统、观照其现实社会和建设客家民系（区域）文化的一个参照系。小说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独特表达，隐含了与客家文化历史传统及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今天的客家文化建设，亦将更加明确继承优良传统，振兴文化之乡的历史责任。

三、程贤章的长篇小说展示的领导层“否定封闭、保守、僵化，张扬开放、进取、发展”之思维模式，是客家民系传统思维特征的本质体现和当代概括。

反映改革开放时期客家社会生活的《云》《神》，以市、经济开发区等颇能代表，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单元为观照对象，抓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带根本性的因素——地方领导的治政观念、思路，施政纲领、实施办法及其过程、效果等，并以此为作品的深层线索，展开客家地区的社会生活画卷。作品涉及了以领导层为中心的多层复杂的人际关系，采录了行业运作、伦理道德、习俗民情等社会风景，展示时代变革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变化。在作家笔下，很少见到老一辈人以前的那种封闭、守旧、静止的生活，一切都在更新着、变化着。作品的思维内容涵盖了当代客家人普遍经历的生活、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惑、怀有的愿望。

方法与内容是互涵的。当人们对于对象世界作特定的认识理解，同时也就包含着对于某种方法的运用。《云》《神》写领导层各式人物从不同的观念出发，产生不同的工作思路，导致不同的结果，在对比、衬托中，以否定不合时宜、倡导顺应潮流

为准则，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地方领导层的思维方法特征。《神》通过地级市 A 市的代市长及其同僚们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工农业关系，处理发展经济与农业基础及交通建设、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矛盾，充分肯定了代市长的锐意改革、勇于开拓、渴求发展、乐于奉献；肯定了牧村等市主要领导干部了解国情、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工作。在牛皋等市领导的努力下，决定 A 市发展前途的十大工程蓝图草就。经过一系列的整治，交通问题终于开始得到解决，华侨投资办厂，个体经济崭露头角，城乡经济活跃起来，A 市腾飞风生水起。然而，牛皋的改革壮举却以悲剧告终，主要是因为他片面理解国策、国情，偏重工业忽视农业。究其实质为思维方法僵化所致。《云》中的璨烂领导经济开发区，一开始就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致力于开拓发展。从制定“以工业作经济支柱发展旅游业的”基本策略，到赴港招商引资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学习外商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开发区年轻的躯体始终充溢着进取向上的生机活力。市委书记疆域，有过光荣的历史，富有领导工作经验，对事业十分热忱。其致命的弱点是思想意识、思维方法尚停留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的水平阶段上，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以致在巨额贷款问题上差点栽跟斗。借助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性格，作品反映、肯定了领导层以积极、开拓、科学为主流的思维方法，实质上亦集中概括了当代客家民众的思维方法特征。

任何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又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纵观客家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形成、演变过程，并以此作为背景和参照，有助于理解其小说中当代客家人思维方式的特征和意义。不少研究者认为，客家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拓”和“保守”两重性。“开拓”是传统的、理念的。它伴随着民系的形成、发展而诞生，

广泛得到族群民众的积极认可，并在文化的延伸中成为其传统。客家人看不起安守家中、不愿出外闯天下的男人，将其鄙视为“灶下鸡”，故历来有“过南洋”的风气，有外出读书的习惯。另一方面，“保守”性则是在民系形成之后，迁徙劳顿的生活安定下来、受特殊的生活环境影响而渐次萌生的。相对而言，这种保守性多体现于局部的、具体的方面。如在日常生活中视野不够开阔，社交意识能力较弱，易于偏狭短浅。改革开放为客家民系弘扬优良传统、改进不良思维方式，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以地方党政领导集体为代表的客家人，紧跟时代节拍，吸纳八方气息，摈弃陈旧陋习，锐意改革开拓，成就一番事业。这体现了客家民系思维方式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积极变革。程贤章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了客家文化传统在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予以形象化、典型化、理想化。从这一点看，他不愧为真正的客家作家。《云》《神》从本质上反映了客家民系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否定了其负面内容，筑构了其发展变化的理想模式。这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客家民系思维方式本质的思考也许不无启迪。

---

①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2期。

②卢瑞华《时代交响乐——〈程贤章长篇小说选〉序》，珠海出版社1994年版。

③⑤参见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第232—233、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④展锋《程贤章论》第35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⑥见潘先伟《客家文化价值观念的继承与现代转》，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黄绿清主编《客家研究辑刊》1993年2期第72页。

作者陈利群，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610633)

责任编辑：陶原珂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两个效益的统一

□姜玉玲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的转变：图书正从过去的计划性产品，逐渐转化为一种市场化的商品；过去单纯按照计划出书，逐渐转化为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和需要出书。这种转变已使出版社再也不能躺在旧模式上过日子，不思进取，不管盈亏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出版社效益下降，经营亏损，难以为继；有的出版社把赚钱作为唯一目的，迷失政治方向，忽视社会效益，造成“查处”、“停业整顿”、甚至“撤销社号”的严重后果。以上情况虽然极为个别，但已引起我国出版界的警醒与重视。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确立，如何处理图书出版中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出版业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 一、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图书出版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决定图书出版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首先，我国的出版机构都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我国的出版业，必须在政治上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维护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其次，出版单位是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宣传舆论阵地，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出版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方针。

第三，出版业是一种产业，但它不同于一般产业；出版物是一种商品，但它不同于一般商品，它是有思想内容的特殊商品，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出版物承担着思想教育、知识传播、人格塑造、舆论导向等社会职能。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这种文化“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支柱”。我国的出版事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必然要求图书出版业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必须强调思想性，有利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四有”公民的培育，有利于全社会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形成。十分清楚，这就是说，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决定了出版工作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工作者自觉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多出好书，不能出坏书；更不能牺牲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 二、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

强调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不要经济效益。这个道理其实也很清楚，首先，不讲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难以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作为文化商品，要通过市场渠道售予消费者。再好的出版物，只有被消费者所接受，才能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实现图书社会效益的过程，也是实现其经济效益的过程。如果没有经济效益的图书，也就是销售不出去的图书，其社会效益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把出版社推向了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生产经营企业。不讲经济效益，出版社就不能生存发展，多出书、出好书，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应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的统一，体现在社会效益要有经济效益做保障，同时也体现在经济效益要有社会效益来驾驭。出版工作者的责任，是要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好这么几个方面：

（一）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

讲政治、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在图书的策划、编审、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都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严格把关，保证所出的书是一本好书，而不是坏书。“利”就是经济效益，我们搞出版不是不讲利，而是不能见利忘义，更不能因小利而失大义。正确处理“义”与“利”这一对矛盾，一是坚持先“义”后“利”原则，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必须舍“利”取“义”，绝不能毁“义”牟“利”；二是坚持见“利”思“义”原则，凡是有经济效益的选题，必须同时考虑和评估其社会效益；三是坚持“义”、“利”并举原则，努力实现“义”、“利”双兴，也就是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二）树立繁荣意识，正确处理质与量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应有繁荣的经济，同时，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只讲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以多种优秀的、丰富多彩的、适应社会发展各方面需要的出版物，提供给广大读者，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

繁荣是需要数量的，但如果没有质量的数量，也就失去图书出版的积极意义，甚至变成有害。因此，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中，质量是主要矛盾，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数量。质量意识对出版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把关意识，就是不能让错误的东西从我们手里传向读者，贻害社会。质量是一个不断追求的目标，是无止境的。就出版物整体而言，要追求主旋律突出，思想

性、艺术性强，结构合理，适应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就一本而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出版物，追求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追求文化品位、群众喜闻乐见。提出“优质高效”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其实也就是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 （三）树立群众意识，正确把握和引导图书市场

出版事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树立群众意识，就是要使我们的出版物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不断向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意识在一定情况下也等同于市场意识。因为消费者接受就是群众接受。而事实上，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但是，市场又是复杂的，出版者如果仅仅被市场牵着走，是没有前途的。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既不能为市场所左右，也不能违背市场法则。正确把握和引导图书市场，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导地位，就要善于把市场机制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服务，调动多种发行手段，用优秀的、新颖的出版物占领市场、开拓市场、引导市场、营造市场，富有成效地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 三、采取切实措施，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必须要有切实措施。

### （一）抓改革，增强出版工作的活力

出版业只能在改革中发展。出版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反映出版工作自身规律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包括：建立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的各种岗位责任制，实行工效挂钩的改革；改革编辑制度，建立选题策划出书机

制；改革图书发行环节，在通过国有书店主渠道发行的同时，探索建立批发代理发行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建立聘任、聘用和用工合同制等等。判断出版改革的成效与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出版产业的实力，是否有利于满足人们对出版物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标准。无疑，出版改革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把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相背性、对立性转化为相向性、同一性，焕发出体制的活力，需要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但不能人为地把改革和坚持正确方向对立起来，也不能以假设或逻辑推理设置思想障碍。这里，关键是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尊重实践。实践证明，改革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已是毫无疑问的。

### （二）抓管理，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工作的新秩序

加强管理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出版社的两个效益也必须要有管理的配合和保证，管理决定着出版社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决定着出版社的优劣成败。改革的成果，亦需要通过管理制度的建立而巩固。因此，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应是出版工作总的工作方针。许多较好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出版社，大都建立选题审查论证制度、审查和编辑加工书稿三审制度、图书付印发行批准制度、书号审批管理制度、委托印刷发行制度、成本核算和效益评估制度、定期查库清库制度、行政后勤管理制度、评比奖励制度等等。建立和健全这些制度，为出版管理工作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 （三）抓队伍，提高出版业务人员素质

出版事业能不能办好，能不能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关键在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市场竞争，说到底也是一个人才的竞争。所谓抓队伍，就是抓出版队伍的建设。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使出版业和出版队伍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思想观念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化；机构管理由行政管理型、生产管理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知识机构由单纯的专业型向一专多能、多学科复合型转化；图书销售从被动闭塞型、单一渠道型向开放型、主辅渠道结合型转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的出版队伍，必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出版队伍的建设，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要求，着重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

提高政治素质，就是要使出版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正确导向。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清现实社会中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限。职业道德素质要求我们的队伍遵纪守法、敬业乐业，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没有市侩气和铜臭气。提高业务素质，包括提高专业能力、提高编辑能力、提高经营能力，达到精通业务的要求。要按照这些要求把出版队伍建设成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队伍。

（四）抓政策，以激励机制鼓励多出好书

应当承认，两个效益在有些情况下是难以统一的，特别是出版一些重要的学术

著作是赔钱的。出版社作为一个经营单位，既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又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包括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经费补贴等。因此，很有必要采取一些政策倾斜的措施扶持、补贴、资助一些重点图书的出版，并通过建立奖励和约束机制，鼓励多出好书。

从自我发展和实现良性循环的角度和要求来考虑，扶持、补贴、资助重点图书出版的一个好办法，是建立出版基金。建立专项类图书出版基金，重点资助列入国家和省的规划、“五个一工程”和年度重点选题图书，资助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充分体现了出版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为出版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强出版基金的管理，用活用好出版基金，有利于在选题策划上，提高“抓重点”、“抓精品”的积极性，促进“上重点”、“出精品”的竞争局面的形成，从制度、措施、资金上保障社会效益的优先地位。

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是出版工作面对的新课题。在这里既有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实践的问题。总之，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多出好书，朝着优质高效的目标前进，就一定能够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一对矛盾统一起来。

作者姜玉玲，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510100）

责任编辑：童 轩

# 综合与创新

## ——读李翀的《新经济学》

□朱正国

2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政策，并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期间，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依靠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功底。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出发，将两大经济体系进行综合创新，创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最近，笔者有幸拜读到中山大学副校长、李翀教授的新著《新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可谓是这种创新的杰出代表作。

### 一、综合和创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在一些青年学者当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企图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等等，并将西方经济学推崇为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但《新经济学》的作者能保持冷静态度和清醒的头脑，既不盲目推崇，也不简单地排斥西方经济学。我想，可能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使得他能完成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综合在一起的创新。

《新经济学》的作者李翀博士认为，由于时代的需要，当年马克思本人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合理的，它提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但是，一方面，在这以后的百多年间，

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没有遇到过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而这些现象和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已有所反映，我们应当吸收其中有价值的见解，去概括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问题，这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责任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就需要从生产关系扩展到生产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中对一般劳动过程和一般的市场经济的分析等等是与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共性的，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和报告里，在我们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分析经济问题时，都经常和大量地使用到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术语，我们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也可以从西方经济学找到理论依据。因此，如果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完全割裂开来，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这就是说，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与西方经济学进行综合。

在如何综合西方经济学问题上，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代表和反映着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回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矛盾，掩盖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两者的综合就不可能是调和，而是以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分析为前提的。

综合是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完善马克思经济学中某些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吸收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力和一般经济现象分析中的合理因素，舍弃西方经济学掩盖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庸俗因素，构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它本质上与西方经济学仍然是对立的，它没有结束两大体系本质上相对立的局面。总之这种综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

## 二、综合和创新要运用本质——现象方法

《新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方法，如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分析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个量和总量的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等。但我认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贡献，这就是本质——现象法。本质——现象法本身不能说是一种新的方法，但对于《新经济学》来讲，可以说，没有本质——现象法的全面运用就没有《新经济学》。因此，将本质——现象法的作用发挥到用它来建造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高度的，是《新经济学》的首创。作者很清楚，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学说的综合是一个综合过程，它必须以前后一致的逻辑来构造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而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结合点是进行两大理论体系综合的要点和难点。作者明确表示，《新经济学》主要从本质与现象的角度切入寻找结合点。具体地说，这种分析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为基础，再结合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以更具体、更完整地、层次分明地阐明经济规律和解释经济现象。这种“结合点”广泛地分布着，在有关“价值和市场价格”、“生产成

本和利润的最大化”、“规模收益在一定阶段的递增现象”、“垄断价格和市场价格”、“再生产的投入产出分析”、“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周期的原因”等等内容的分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三、《新经济学》新在体系

《新经济学》作者坦言，所谓新不在于内容而在于体系。过去，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将两者并列在一起的著作，但真正按照一致的逻辑将两者综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著作，《新经济学》则是首次。

一般地说，经济关系不妨分为信息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两大类，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就是反映信息控制关系的类型的，而公有制和私有制则是反映财产利益关系的，这两方面共同决定经济运行。而经济运行又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这样，经济学就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而信息控制关系和财产利益关系渗透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处理的，《新经济学》也是如此。

《新经济学》全书共21章，前10章是微观经济学部分，又分为4个部分，从价值层次、生产价格层次和垄断价格层次进行分析，最后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后11章是宏观经济学部分，首先从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出发并结合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讨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和社会产值的决定问题，为整个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接着探讨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四大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最后1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高度总结，概括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先进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等几个标题看就一目了然。

当然，正如《新经济学》作者所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是

# 学问中国？中国学问！

## ——评《学问中国》

□曹念明

《学问中国》是本多人文集，内容遍及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历史、生态等众多领域，作者都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国内学术新锐，分别对自己专攻的学术发表心得，可以称得上是对当前中国学界前沿成就的一次集中显示。全书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写出了作者的新见，尽管其思想资源有中有西，然而都经过中国学人的深思熟虑，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加以表述，表达了对中国现状及学术的真知，所以，编者在封面上标上了这么一句介绍：“凸显中国话语。”

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努力中，时常可遇到一个困惑：能不能够、应不应该、需不需要提出下述课题：建设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可能多数学者不赞成这个提法。他们

的理由很充足：科学无国界。科学追求的是普适性，不能用国家的界限来扭曲科学的原理。更有不少人担心这个提法不利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会加强闭关锁国、坐井观天的心态。

这些看法都有理。但是，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除了他们强调的理由，也存在另外一些因素，并非完全不用考虑。

我们的科学知识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知成果。它不等于客观对象本身。任何人都都是有局限的。所以，人的知识，包括任何科学知识，也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和客观对象完全划等号。人的局限性有各种各样。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思想资源、思维模式、话语系统，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不同的人群集团有其本身的局限，也有比其他人群集团的

一个过程，它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此，《新经济学》的综合也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就前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内容来说，马克思的论述中包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析，这种分析便于明确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但西方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缺乏这样的分析功能。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即能否将不变与可变资本的分析坐标加进投入产出的分析模型中以便使这个“结合点”更完善呢？另外，该书的内容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是比较经典的成熟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近发展。我想，作者可能有自己的考虑，例如，这些内容留待以后再作专门的研究。因此，我期待着《新经济学》的两大续篇：经济学新近发展的综合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综合

研究。但是，在我看来，《新经济学》为两大经济学体系的大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框架，也为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与这相比，它的不完善也许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我看《新经济学》在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是不可多得和不可不读的，它独树一帜，以经济学的研究富有启发意义。近年，教育部已将教材改革和建设列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这种形势下，《新经济学》对于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调整和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经济学专业则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作者朱正国，广东云浮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5273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相对优势。让各个人群各展所长、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促进全人类科学百花园的繁荣是有益无害的。这就是不同学派的发展，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是学术繁荣强大动力的原因所在。

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是个较广泛的概念。严格区分起来，可分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类。社会科学虽和自然科学相似，以追求普适性的知识为目的，但其研究对象不是没有意志、思想的自然界，而是有思想、意志的人群。既然自然科学研究中尚且可能产生“哥本哈根学派”之类的学术群体，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难道以人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就不能产生中国学派吗？至于人文学，在英语中没有“科学 science”这个成分，标志着它本身追求的不是普适性的知识，而是个独性的知识，其研究方法更带人的色彩，其特色更加突出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如此看来，至少，多出些带中国味（色彩）的学术成果并不算错，只要它不拒绝全人类的优秀成果，不自外于人类文明的主流就行了。而在个别人文学术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也未必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退一步说，在某些学科中建立“中国学派”，总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体系、原则、方法，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青年经济学家盛洪的文章标题赫然写着：《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出乎许多人的意外，盛洪把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中国古代“黄老之学”联系起来，从中国古代哲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学”，再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梳理出了一条有案可稽的思想线索。作者再结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一世界独特的重大

经济现象，阐述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轮廓，从而论述了形成“中国学派”经济学的合理性。

该书八篇论文各自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充分吸收中西优秀思想资源，达到学科前沿水平，完全不存在拒斥外国先进学术文化的问题。他们所含的“中国味”的色彩、程度也不相同，但都出自学者本人的独立思考，针对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所以，这本以学术追问中国问题的著作在建立“中国学问”的宏大努力中占有其一席之地。

从建立“中国学问”的角度看，此书存在一个不小的缺憾：缺乏对中国文字学的论述。笔者多次提出：最有基础、条件、优势建立的中国学问之一是中国文字学。别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都是全球性的，全世界有共同性，首先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思想学术成果。而汉字是中国特有的，不但汉字的造字法、演进规律是独特的，汉字的功、汉字与思维、语言、文化的关系也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情况迥然不同。其中大有深入探索的文章可做。而由于研究的难度很大，特别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的深度受到很大限制。只有我们中国学者才具有深入研究汉字学术的优势。中国古代有许多学术资源，现代又有唐兰、陈梦家等大学者建立了新的学术体系。前几十年，由于学术领域的不正常气氛，它的发展举步维艰。时至今日，学术环境有大的改善，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障碍已难以逞威，既解放思想、又能吸取中国以及世界优秀成果的新锐学者已经出现。在社会的重视、鼓励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字学的学术前景是光辉灿烂的。

作者曹念明，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研究员（510070）

责任编辑：童 轩

# 角度的选定与嬗变的探寻

——评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

□张智华

《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是程国赋的博士论文，他对此课题不惮繁难，执志数载，终结硕果。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角度新颖。对唐人小说的研究，前贤多以史学家的实录观来看待唐人小说，重视史料的考证，其论述大多数为片言只语，具有零散性特点。“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多偏重于考证、分类论述、思想艺术分析、注释赏析及辑佚等。有关唐代小说的嬗变即它在后世文学体裁中的演变情况却不够重视，仅有少数零散的文章，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考论。以唐人小说嬗变为专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一直未曾有过，这是新的学术景观，顺应了 80、90 年代中国小说史专题性研究这一学术新气象。唐人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令人瞩目的，而作者对唐人小说嬗变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戏曲史上的独特地位的认识，更是促发他去填补这一学术空白的动力。

第二，对小说嬗变的社会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学史意义挖掘深入。唐代小说嬗变丰富复杂，代有新变。如何实事求是地梳理出唐代小说嬗变的演进历程，是一项相当繁难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嬗变本身的意义。作者把它理解为在历史进程中融汇着特定时代人们的人生际遇、生命感悟、精神向往和社会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研究已经上升到文化精神、时代思潮的层面，立于研究唐人小说嬗变的制高点上。

此书把唐代小说嬗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在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上去看，不

仅可以准确定位、绘形，找出嬗变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内涵，也能把握演进的规律。例如，他通过对唐代小说嬗变现象的分析，进一步挖掘出元明清与唐代在婚恋观、科举观、宗教观、商业观等很多方面存在的差异，以求增进对于不同朝代文化背景的认识。又如，作者在分析元杂剧与唐人小说的渊源关系时，注意到杂剧作家借助于对唐传奇的改编，表达他们怀才不遇的心理状态。透过这些改编作品，可以看出元代文士对于科举及第的羡慕，等等。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将唐代小说与后世相应的小说，戏曲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在语言、体制、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的异同点。程国赋博士试图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此加以概括、总结，以求勾勒出唐代小说在后世的演变轨迹，进而了解中国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之间的渗透与融合，了解中国文学史流变的历史进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例如，第十一章“明清戏曲与唐代小说”，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指出：明清戏曲在改编之际，增加了“情”的成分。由唐传奇到明清戏曲，男性主人公的形象发生很大变化，这说明南、北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笔法不同。北方作家在唐传奇人物性格中添加刚猛、冷酷乃至绝情的因素，其作品呈现阳刚之美；而南方明清戏曲作家注重轻柔、热烈而多情的性格塑造，其作品呈现阴柔之美。

第三，五分法的科学性。对唐代小说的分类，前人与当代学者提出三分法、四分法等等，他们或者没有把所有唐代小说拿来排比分析，或者从某一特定角度对唐

传奇进行分类，因而这些分法不能包括唐代小说的全部内容。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经全面排比后，分为神怪、爱情、逸事、佛道、侠义五大类，这就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唐代小说的内容。

郭箴一《中国小说史》把唐代小说分为神怪、恋爱、豪侠三类。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小说概论》将唐代小说分为别传（史外的逸闻）、剑侠（武侠男女的勇谈）、艳情（佳人才子的艳话）和神怪（神仙、道释、妖怪谈）四类。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则区分为：“恋爱和婚姻问题”、“通过‘梦幻’来写‘人生经历’的故事”，“以当时历史事迹为素材、加工写成的故事”、“豪侠故事”等多种类型。事实上，这几种分类法都不够准确。因为，第一，这些分类方法难以概括唐代小说的整体风貌。例如，唐代佛道二教盛行，很多小说受此影响，公开宣扬因果报应，成仙得道等佛道理论，其主旨与描写鬼神、怪魅的神怪类小说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而盐谷温、郭箴一有人在分类过程中却将佛道、神怪两者混为一谈，归作同类作品，这是不妥当的。第二，关于不同类型的小说之间如何界定的问题，盐谷温的四分法对别传类与其他三类作品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因此在划分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时，容易出现重复、交叉的现象。第三，对于一些具体篇目，盐谷温将宋人传奇《梅妃传》、《杨太真外传》定为唐代作品，归入“别传类”，这是对作品的写作年代认识不清。他将《周秦行纪》坐实为牛僧孺所作，也显然是错误的。

程国赋认为，描写名人轶事、琐记逸闻的逸事类小说和宣扬宿命论、因果报应、成仙得道等佛道理论的佛道类小说，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却没有引起前人足够的重视，总是将它们归入神怪小说或者其他类型的小说中进行研究。有鉴于此，他将上述两类作品划分开来，这在以前的唐人小说研究中是没有过的。这样，他在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从唐传奇创作的全局入手，将唐代小说分为上述五种类

型，显得十分科学而合理。

第四，系统性与整体性强。程国赋博士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是一部系统而又全面探索唐人小说嬗变的力作。此书不仅清晰地梳理、阐述了唐人小说嬗变的源与流，而且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特点及历史背景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纵览全局的基础上他还对一些代表作品作了典型解剖与评价，从而将唐人小说的嬗变历程勾勒得既全面而又线索分明。

作者穷搜尽讨，力求从全局上把握研究对象。此书共分12章。第一章“唐代小说研究概览”，主要着眼于唐代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对于唐代小说的成因、分类、结构、创作方法等进行重点论述，提出一些新鲜看法。第二章至第六章，他在力求完备的基础上，经过爬梳、抉剔、比较、鉴别，择取110篇较有代表性的唐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他指出这110篇作品在后世的嬗变出现两种类型：一是直接根据唐传奇原有的人物、情节加以改编的作品，其人物、情节与唐传奇几乎完全相同。二是人物形象、性格及故事情节构成与唐传奇十分相似，这些作品间接地受到唐传奇的影响。上述两种情况皆为唐传奇的嬗变。他从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五个方面，探讨各类小说的时代背景以及嬗变规律。第七章“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将唐代小说的嬗变成因归纳为三个方面：欣赏者审美心理的认同；文学创作领域复古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改编者创作心态的变迁。第八章“文言小说与唐传奇”，分析宋、元、明、清文言作品与其对应的唐人小说之间的差异性，对《剪灯新话》、《聊斋志异》作了重点考察。第九章“白话小说与唐传奇”，就唐代小说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明清长篇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加以论述，并且从体制、语言风格、情节结构、艺术形象塑造四个层面，对白话小说与唐传奇在艺术上的差异加以总结。第十章“元杂剧与唐代小说”，从科举观、婚恋观、市民观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十一章“明清戏曲与唐代小说”，对明清杂剧、



传奇与唐代小说的关系加以论述。第十二章“从唐代小说到元明清戏曲艺术上嬗变的特质”，将唐代小说与后世戏曲之间艺术上嬗变的特质归为五个方面：叙事视角的转换、结构原则的差异、情节的“幻”与“真”、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的不同、才子佳人戏曲创作格局的出现。附录《唐代小说嬗变一览表》，主要介绍 110 篇唐代小说在宋、元、明、清诸时代所出现的嬗变作品。

•学术动态•

这种构架与作者所选取的研究角度相适应，是有主有次的，灵活而务实，突出每一阶段的嬗变动因与成果。这种构架系统而全面地显示出唐代小说嬗变的脉络，也有效地揭示出唐代小说嬗变的社会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学史意义。

作者张智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我省社科联系统举行 “学习邓小平理论，促进社科工作改革 发展汇报交流会”

10月29日至30日，省社科联召开了省、市、县社科联系统的学习邓小平理论汇报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社科联和个别县社科联的负责同志和省社科联各处室的负责同志共40多人。

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精神，和省委关于深入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增创广东改革发展新优势的要求，通过汇报交流，进一步推动我省社会科学界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促进社科联工作和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改革发展，更好地为党、政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交流我省各级社科联如何发挥自身的特点和功能，密切联系实际，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做法和经验，以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推动社科工作改革发展的做法和经验。

在会议上，省社科联和广州市社科联、深圳市社科联等十几个市社科联以及端州区社科联、电白县社科联的负责同志作了交流汇报发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本钧到会指导并作了讲话。（学文）

## “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 建设辩证法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社会科学大学等单位发起和主办的“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研讨会”于1998年11月9日至12日在武汉市召开。来自全国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50余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来的辉煌成就和经验，研讨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与会者认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境界，他阐发的关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辩证法思想，不但指导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将引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更大的胜利，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运用。

（陈善光）